

#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13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 中共党史资料

第十三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封面题字：舒 同

封面设计：马少展

## 中共党史资料

第十三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印张 162千字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01-100,000册

书号11310·20 定价1.25元

内 部 发 行

# 目 录

## 回 忆 录

- 中央干部教育部与延安干部教育 .....李维汉 ( 1 )
- 从百色到湘赣 .....袁任远 ( 49 )
- 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遵义会议 .....陈伯钧 ( 80 )
-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的  
    关系 .....黄火青 ( 100 )
- 开辟辽东根据地 .....肖 华 ( 113 )
- 老航校诞生前后 .....黄乃一 ( 151 )

## 中共中央南方局党史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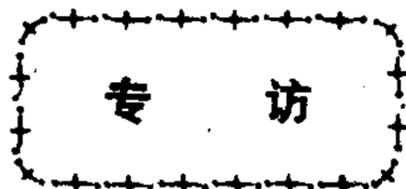
- 回忆南方局文委——文化组 .....张 颖 ( 190 )
- 我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营救行动  
    .....中共惠州市委党史研究办公室 ( 212 )

关于胡世合事件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工运组 ( 228 )  
重庆市工人运动史编写组

南方局领导下的青年工作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青年组 ( 246 )



屈武谈周恩来敦促张治中释放被关押

在新疆的一批共产党员的情况 .....欧阳如华 ( 272 )

来函摘登 ..... ( 280 )

本刊征稿启事 ..... ( 282 )

# 中央干部教育部与 延安干部教育

李 维 汉

**编者按：**李维汉同志生前嘱我们转告读者，对他的回忆录“敬请提出批评建议”。意见请寄本刊编辑部。

## （一）中央干部教育部的成立

1. 成立时间。一九三八年十月，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干部教育部，同年十二月底通知我去延安任干部教育部副部长，当时我在陕北公学分校任校长。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我从关中栒邑看花宫出发，同行的还有孙力余、何定华等。他们到延安以后，也在干部教育部任职。

从栒邑到延安六、七百里地，我们走了一个多星期。到延安以后，同党中央，主要是洛甫（他是干部教育部部长，同时又是中宣部部长）进行联系，研究干部教育部的成立工作，并决定在中央宣传部右侧（南边）山沟口设立干部教育部机构。

2. 成立原因。首先是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革命形

势带来的迅速变化，需要我们共产党人重新学习。尤其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给了我们很大启示，使我们懂得了王明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和抗战时期的右倾，从思想根源上说，都是不懂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原则，都是教条主义。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了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的号召。毛泽东强调说：“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毛泽东又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教育。六届六中全会就全党的学习问题作了相应的决议。中央干部教育部就是在

这种全党开展学习运动的形势下产生的。

其次，延安干部学校的迅速发展，也要求我们党进一步加强统一领导。在延安，除了陕甘宁边区系统的干部学校以外，直属党中央各部门的干部学校就不少。党中央到陕北以后，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瓦窑堡恢复了中央党校，接着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创办了红军学校（即红军大学）。在抗战即将开始，国共两党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前夕，党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新形势，于一九三七年三月，把红军学校改编成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校长林彪），为抗战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一九三七年九月一日，成立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招收来延安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培养抗战的干部。同年十月，创立了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冯文彬、胡乔木负责）。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培养从事抗日文艺运动的干部。同年五月五日，创立了马列学院（院长洛甫，副院长王学文），专门培养从事党的理论工作的干部。以后又成立了自然科学学院（院长徐特立）、延安女子大学（校长王明）和工人运动学校（张浩负责）。这些干部学校分属于党中央的各个部门。为了加强统一的领导，成立了中央干部教育部。

第三，干部队伍不断扩大，也带来了不少新的问题。抗战以前的老干部不多，绝大部分是抗战以来的新干部；老干部一般说文化水平不高，甚至还有文盲，都需要进行

教育、学习。

3. 工作任务。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的通知明确指出：“中央为着（一）统一领导中央直属各学校的教育方针、教育与教学方法；（二）适当地调剂各学校的教员、教材、课程；（三）有计划地进行招收新生工作；（四）领导党政军民各机关的干部教育；（五）总结各学校、机关干部教育的经验教训等，特决定组织干部教育部，以洛甫同志兼任部长，罗迈同志为副部长。现已在中央驻地附近设立机关，并开始工作。今后各学校各机关凡有关于干部教育的计划、教材与工作报告、检查工作总结等，请随时送交中央干部教育部。”这个通知明确了中央干部教育部的工作任务和职责范围。我们以后在干部教育部所做的工作，就是通知所规定的内容，即统管干部教育，包括干部学校和在职干部教育。中央以后又在《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中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中的比重，又应是第一位的。”因此我们在短时期内实际所做的，最主要的也就是在职干部的教育工作。

4. 机构演变。中央干部教育部成立时的机构很简单，下设两个科：党内干部教育科，科长曹轶欧、副科长章夷白；国民教育科，科长何定华。部秘书陶希晋，兼管行政工作。洛甫不住在部里，我同大家住在一起，一共十

几个人。

一九四〇年六月，中央干部教育部与中央宣传部合并，改称中央宣传教育部。同年十月，又改称中央宣传部，部长、副部长还是我们两个人。原干部教育部的党内干部教育科和国民教育科统归宣传部建制，人员略有变动，许之桢任国民教育科科长。

## （二）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发展的三个阶段和中央干部教育部的工作

延安的干部教育是在党中央、毛泽东亲自指导下开展起来的。毛泽东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发出开展学习竞赛的号召以后，同年十二月十三日，又在由组织部召集的关于党政军民检查工作的干部晚会上，提出“加紧学习，学习马列主义、革命运动及中国的历史，从中央委员会各级干部研究较高深的理论起，一直到各机关事务人员学习文化止。”这里所说的学习，不仅是指干部学校的学习，更重要的是指在职干部的学习，也就是从中央委员会领导干部的理论学习到各机关事务人员的文化学习。

中央干部教育部实际所做的最主要的工作正是在职干部教育。因此，我着重回顾在职干部教育，同时兼及干部学校教育。

延安的在职干部教育大致经历三个阶段：

1. 第一阶段。从一九三九年二、三月制订并公布《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五月二十日召开干部学习动员大会到一九四〇年六月进行年度总结，历时约一年余。主要进行如下工作：

第一，制订并公布教育计划。我们从一九三九年一月回到延安就开始制订《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第一期计划），二月初即完成，三月正式公布。但是由于进行生产突击，绝大多数单位实际未执行。

第二，召开动员大会。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日，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了干部学习动员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的代表一千多人。党中央非常重视，毛泽东亲自出席了大会。会上，毛泽东讲话，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意义，指明了学习的方法，要求大家克服可能发生的困难，并号召大家“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问题的了解与深入。”洛甫也讲了话，强调在职干部学习须有持久性和恒心。我在会上作了在职干部学习的动员报告，主要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强调干部学习的重要性。当我引用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话时，坐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欣慰地笑了。关于教育方针，我说：“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的原则，无疑的是教育事业中最基本的原则。这个根本原则的具体了解，对我们来说，就是马列主义的中国化。”“要

做到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就首先要深刻地研究马列主义；在研究的时候，注意学习它的内容和意思，学习它的立场和方法，而不是把它当作教条。”“要做到马列主义中国化，就需要善于灵活地运用它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来；在运用它的时候，必须查清自己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环境，从这个具体的环境出发。”

在动员报告中，我还提出了对在职干部学习的希望。我说：“学习，要有恒心，有经常性。就是要经常地学，不间断地学。只要有恒心，每天学一点，日积月累，就会有可观的成绩。譬如每天读五页书，一个月就可读一百五十页，一年就可读一、二千页。有些同志看轻每天五页的成绩，认为要读书，就只有进学校去，读它一年半载。且不讲我们有没有可能使所有在职干部都进学校，就是能够这样做的话，一年半载的时光也只能获得入门的知识。古人有言‘做到老，学不了’，要真正学些东西，仍不能不靠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最靠得住的学校，仍是‘在职干部学校’。当然在职干部是以工作为主，学习只能占小部分时间。但是，在职干部学校是一个长期的学校，而且是最能把学习与实际密切联系起来的学校。所以，只要有经常性，有恒心，真正的学问一定可以从这里磨炼出来。”

这次学习动员大会以后，延安的在职干部学习运动就广泛开展起来了。全延安在职干部参加学习的约有二千多人。可以说，在职干部学校是一个学员最多，师资最省，

设备最简单，但可以取得理论联系实际最有成效的大学校。

第三，建立学习制度。一是建立了在职干部平均每日两小时的学习制度。一九四〇年一月三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规定“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肯定了干部教育的教学程序及其课程，指出“各级组织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的领导与提倡其他干部的学习。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的制度，并保持其持久性与经常性。”这是一个重要的规定，因为如果把在职干部的学习完全放到业余来进行，则在职干部学习的持久性与经常性是难以做到的。二是进行了教育和课程的安排以及人员的编组。在进行具体的教育和课程安排时，实行以“少而精”为原则，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由近到远，由中国到外国的原则，定出学习和研究的程序，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类课程。初级课程为：党的建设、中国问题（包括现代革命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三民主义）、游击战争（包括军事常识）和社会科学常识（主要是社会发展史）。中级课程为：近代世界革命史、联共党史与马列主义，以及军队政治工作。高级课程为：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共产国际纲领和军事理论。对于初、中、高级课程，如是干部学校可依次分期进行；如是在职干部，则依干部的具体

情况，参照初、中、高级的课程，学习和研究其中一种，最多两种课程。把参加在职干部学习的人员分为三类：甲类，主要是担负领导工作且有较高文化水平的老干部，学习联共党史。乙类，主要是文化水平较高，但党龄较短的新干部（当时新老干部的区分以抗战爆发前后参加革命为标准），学习党的建设（以《共产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为教本）。丙类，主要是政治、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多数是从事事务工作的同志，学习文化为主，兼学党的建设。因为这是第一年的学习，对在职干部来说，是一个打基础的学习，所以，这一年对所有的干部都没有安排学习高级课程的内容。

三月二十四日，党中央又专门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作为对《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的补充。在这个指示里，进一步把在职干部按文化、理论程度分为四类：一、二类是文化理论水准较高和较低的老干部，三、四类是有相当文化水准和工农出身的两类新干部，并按类规定了不同的课程和共同的课目。指示还规定凡环境许可的地方，可依类编成学习小组。学习小组每月开讨论会一次。学习小组的讨论会应采用生动的座谈会的方式，相互间应采取同志的友谊的讨论态度，不可采取“斗争”及“戴大帽子”的方式。“学习的成效，主要靠自己努力，因此努力自习是基本的方法”。为了推动在职干部的学习运动，指示决定五月五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总结每年的经

验，并举行奖励（奖励以集体为主）。

从中央干部教育部成立到党中央连发的两个指示，延安在职干部的学习制度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第四，编审干部学习教材。在干部学习中，教师和教材的需求特别迫切。一九四〇年六月朱德在延安干部学习周年总结大会上讲话，讲得十分具体，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说：“前方学习中的困难，首先是缺乏教师。去年（指一九三九年）邓小平同志带了两个马列学院毕业的同志到前方去，走到半途，便被别人从后面把那两个同志留下了；于是乎打官司，打了整整半年；结果还是从总司令部抽了两个能教书的同志去替他们‘顶赎’回来。”“我们的第二个困难便是书本子。最近延安给山东送去一、二百本联共党史，但是他们只收到了七本。为什么呢？半途上你一本我一本地被抢光了。为了解决这个困难，我们办了规模不下于延安的印刷局，延安出了一本新书，我们马上就翻印，但还是‘供不应求’。”延安的情况，比起前方来当然好得多，但是，当时延安的印刷出版条件也很差，只有一个解放社，一个中央印刷厂，纸张缺乏，任务很紧，要出版几千名干部的教材，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也要克服很大的困难，才能办到。

延安干部学习教材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翻译马恩列斯的著作和苏联的教科书。例如，作为高级课程的《哲学选辑》，就是马列原著的辑录，而《联共（布）党史简明

教程》和《政治经济学》（列昂节夫著）等都是翻译的。二是我们自己编写，例如，党的建设教材，中国问题教材，中国历史教材等等。最早编了一本《共产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后来又编了一本《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这就是《毛泽东选集》中的那一篇。该文题释对起草经过作了说明。关于第三章《党的建设》，我曾写过两节，都送毛泽东看过，记得在第一节里曾说到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好比鱼和水的关系，毛泽东作了顶批：水可以没有鱼，鱼不能没有水。我在讲课时还宣读了这个顶批。第二节是写的民主集中制。后来，因情况变化中止了，第三章未完全写完，所以《毛选》中只有两章。）当时，中央干部教育部约请一些同志或组织专人编写教材，初级课程中的《政治读本》、《国文读本》等都是干部教育部的同志与专家共同编写的。经过大家的艰苦努力还是搞了不少东西，基本上满足了当时的需要。

第五，加强干部学习指导。干部学习虽然主要靠自学，但给予适当的辅导是完全必要的。我们采用的办法，一是为各单位配备一定的指导员或教员帮助干部进行学习。为了培养和提高指导员或教员的水平，又特别组织了马列主义、中国问题、党的建设、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会，各学校各机关担任或准备上课的教员一律参加。这些研究会的任务是指导延安的干部学习，包括编写教材或参考材料，组织专题报告会等。这些研究会在在职干部的学习中

起了很好的指导和推动作用，所以，后来又成立了哲学研究会、时事问题研究会等。二是聘请老同志和专家指导和解答干部学习中提出的疑难问题，如学习党的建设，我们就聘请陈云为总指导。三是请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和各根据地来的负责同志作报告。这些报告的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很受大家欢迎。请党中央领导同志和从敌后抗日根据地来延安的负责同志为在职干部作报告的倡议也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毛泽东以身作则，多次为延安的干部作报告，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四日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演讲就是其中之一。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的演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是中央干部教育部组织的，演讲在七月八日和十二日接连讲了两个下午。王震（从前线回延安以后）、张鼎丞也应邀给干部作过报告。这类报告从动员大会以后到一九四〇年六月的一年时间里一共作了八次。至于时事政治性的报告，则平均每月有两次。

第六，检查和总结。我们从一九三九年五月到一九四〇年五月一年时间中，对延安的在职干部学习情况进行过三次大的检查。每次检查以后，我们都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用以指导全延安的学习。第一次检查是在一九三九年八月进行的。检查以后，我写了一个《怎样展开延安在职干部的学习》的总结，刊登在《解放》第八十六期上。第三次检查是在一九四〇年四月进行的。同年六月六日，在中

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周年总结大会，有上千人参加。大会由王首道主持，朱德、任弼时等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我在会上作了题为《延安在职干部一年来学习经验总结》（见附件一）的报告。在会上，还奖励了三十九个由各类干部组成的模范学习小组。

经过第一阶段一年的努力，在职干部学习基本上普及了，在延安及延安附近（远至八十里）的学校、团体、机关、部队中，干事、科员、班长以上的干部都参加了学习，中央负责同志也参加了学习，总数达四千零六十人，其中甲类八百三十七人，乙类二千二百五十五人，丙类九百六十八人。各类干部基本上学了一门课，甲类学完了联共党史，乙类学完了党建，丙类差一些，有的学了党建的大部分，有的学了一半。在学习文化上，识字多的达一千二百字，最少的也有二百字。还建立了学习制度，许多同志养成了学习的好习惯，收获是不小的。

2. 第二阶段。从一九四〇年六月举行在职干部教育周年总结大会以后，到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前，历时约一年，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学习质量。主要进行了如下工作：

第一，加强策略教育。这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毛泽东在一次报告中指出：“党内至今还有许多干部不懂得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他们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各种错误

便从此发生。因此，全党必须加强进行策略教育，克服干部把问题简单化的现象，党应当把这种策略教育列入干部教育的正式课程，并作为成绩考核的重要标准。”随后，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三日，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加强党内策略教育的一些具体决定》，规定“在全党的在职干部教育中，党校和党的训练班中，及党领导的各种干部学校中，把党的策略教育列入正式教育计划之内，并作为成绩考察的重要标准。”此外，还对延安干部的策略教育作了具体布置，主要是有计划地组织各种关于策略教育的报告会或演讲。后来延安还专门组织了“策略教育干部会”，吸收全延安党与宣传教育的领导干部参加，组织研究和讲授党的策略及其具体运用的有关问题。仅几个月就作了十几次报告，提高了在职干部学习的热情。

第二，培养和提高干部的阅读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日，中央宣传部又发了一个《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这个决定除了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加强策略教育的指示以外，强调参加学习的干部必须养成细心阅读和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决定指出，为了提高学习的质量，以求学习的深入，“必须在学习上力求嚼得烂，懂得透。”决定还规定了为提高干部学习质量所必须采取的一些措施，例如，充实和加强对学习的指导；及时地解答疑难问题和有争议的问题；研究和总结各门功课的教授方法、研究方法和学习方法；加强对

延安在职干部教育的检查，这种检查应着重于教学质量和研究方法的改进；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学习与干部担任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等。这个决定对于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和干部学校教育的影响是很大的。

在这一阶段，因为采取了这些措施，干部学习的质量是有很大提高的。

3. 第三阶段。从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起，到一九四二年二月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号召全党普遍开展整风运动止。历时不足一年。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改革延安的干部教育，包括在职干部教育和干部学校教育。

《改造我们的学习》是毛泽东在中宣部组织的干部学习会上的报告。这个报告，第一，肯定了党的干部教育和研究工作的成绩。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抗日战争以来，我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研究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是进一步了，研究中国历史也有某些开始。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第二，指出了干部教育和研究工作中的缺点，这就是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毛泽东列举了一些坏典型后说：“当然，上面我所说的是我们党里的极坏的典型，

不是说普遍如此。但是确实存在着这种典型，而且为数相当多，为害相当大，不可等闲视之的。”第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主观主义两种态度的对立和区别。第四，提出了改造学习的三点建议：一、“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二、研究近百年的中国史。三、“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

在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以后，党中央发出了一系列相应的指示，其中包括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发布的《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这个决定指出：“在职干部教育，自六中全会以来，已经引起党内相当的注意，在许多地方与许多部门的在职干部中引起了学习的热潮，这是极好的现象。但忽视的现象还是存在着，在有些地方与有些部门中，甚至还没有开始。没有强调业务教育，而大多数在职干部要求学习业务与精通业务的热情则是很高的。政治教育虽一般地注意了，但或则不得其法，或则轻重不分，或则没有经常性。文化教育，是我党多数工农出身的干部所迫切需要的，但也没有引起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充分注意。高级干部的理论教育，或则至今没有引起注意，或则脱离实用，成了教条主义的东西；而理论教育的成败则是革命成败的第一个关键。所有

这些，都是必须改革，或必须加强的。”决定指出：“在职干部教育，应以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四种为范围”，并分别指出了四种范围的内容和教学措施。关于理论教育，决定指出：“高级及中级干部之具有学习理论资格（文化程度理解力与学习兴趣等）者，于业务学习与政治学习之外，均须学习理论。其学习范围分为政治科学、思想科学、经济科学、历史科学等项，依次逐步学习之。其学习方法，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原则。例如政治科学以马列主义论战略策略的著述为理论材料，以我党二十年奋斗史为实际材料；思想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为实际材料；经济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为实际材料；历史科学则研究外国革命史与中国革命史。”这些指示都是十分正确的。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就是根据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建议和这一决定的精神，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开始了崭新的阶段。

### （三）延安干部学校教育的三个阶段

1. 第一阶段。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初，这一阶段的干部学校全属训练班性质。为了满足抗日战争特别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迫切需要，学习时间短，大多只有三个

月、半年、最多一年，就结业分配工作。因此，这个阶段的课程内容一般都是符合实际工作需要的。也教授一些理论课如中国问题，马列主义等，但只是启蒙性质。当时的学员现在回忆起来还认为这种启蒙教育对他们是很有好处的。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日，在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纪念大会上，我作了一个题为《鲁艺的教育方针与怎样实施教育方针》（附件二）的报告。在那个报告中，我着重阐述了党中央为鲁艺规定的教育方针，提出了怎样实施党的这个方针的意见。当时，党中央为鲁艺规定的教育方针是：“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材，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和核心。”这个教育方针虽然是为鲁艺规定的，但它反映了党在那个时期干部教育的基本特点：首先是从抗战的实际需要出发；其次，要求有一定的理论水准和实际技能；第三，带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的特征，无论是鲁艺，还是其他的干部学校，都是在党的领导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来培养人材和进行学科的研究。

由于当时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思想体系，在短期训练班内也不可能不受到影响。但由于上述情况，这种毛病的影响一般说是轻微的。

2. 第二阶段。一九四〇年下半年以后，转到干部学校正规化阶段。延长学制，确立比较正规的学习制度。学习时间一般改为一年、二年甚至三年。要求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的基础理论知识，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伴随着正规化而来的，是教条主义习气的复活和滋长。这在马列学院的部分课程的教学表现得尤为突出，陕公高级班也有这种情况。教学和研究马列主义基础理论是十分重要的，决不可少的，但教条主义的方法却是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根本相违背的，是十分有害的。

3. 第三阶段。根据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精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央发布《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严肃指出：“目前延安干部学校的基本缺点，在于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脱节，存在着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严重的毛病。这种毛病，主要表现在使学生学习一大堆马列主义的抽象原则，而不注意或几乎不注意领会其实质及如何应用于具体的中国环境。为了纠正这种毛病，必须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使能够正确的应用这种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书本上各项原则的死记与背诵。第一，必须使学生区别马列主义的字句与马列主义的实质；第二，必须使学生领会这种实质（不是望文生义，而是心知其意）；第三，必须使学生学会善于应用这种实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而抛弃一切形式的空洞的学习。为了这个目的，除了

正确地教授马列主义的理论之外，同时必须增加中国历史与中国情况及党的历史与党的政策的教育，使学生既学得理论，又学得实际，并把二者生动的联系起来。党地委以上，军队团级以上的干部（在解决了文化问题之后），应以联共党史为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材，特别应注意具体应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不是其大堆的抽象原则）的学习，借以克服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这种极端恶劣的毛病。”决定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改革的措施。这些指示也是十分正确的。延安干部学校根据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建议和这一决定的精神，进行了若干改革。

为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干部教育的两个决定和检查自己的工作，我在一九四二年三月写了一篇文章《要清算干部教育中的教条主义》，检查了毛泽东在党的六中全会上提出“教条主义必须休息”的号召以后，干部教育工作中教条主义的各种表现，并且指出：“教条主义在党内有长期的传统，而在教育工作中尤有深固的根基。要执行中央关于干部教育的决定，要实行干部教育上的革命，主要地就是要肃清教条主义；而要肃清它，就首先要揭露它和批评它，一次不会揭露得干净和批评得透彻的，要坚持地去揭露和批评。否则，无论对于工作，对于个人，真正的彻底转变是困难的。”这是文章的基本精神。鉴于教条主义曾经给党的事业造成十分严重的危害，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又在干部学校复活和滋长，当时延安整风正在开始，想

借此给以推动。但文中没有抓住“实事求是”这个毛泽东思想的核心，这是最大的缺点。同时，对于延安干部学校前期的成绩和后期教条主义复活的错误也未作必要的分析，存在着否定过多和笼统化的缺点。

#### (四) 党内教条主义思想体系的发生、滋长和被改造

八七会议后的瞿秋白盲动主义和李立三冒险主义错误都包含着严重的教条主义的因素，但还未成系统。直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出现后，教条主义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才成为完整的登峰造极的东西。王明自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实际是百分之百的教条主义者和主观主义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核心人物是一个宗派集团。他们在取得了中央领导权之后，钦差大臣满天飞，所到之处，总是攫取首要职务，使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得以在全党占据统治地位。遵义会议和瓦窑堡会议以后，毛泽东和以他为代表的党中央，逐步地在全党基本上清算和纠正了军事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贯彻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但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是思想路线，属于世界观和方法论范围，是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左”右倾路线的思想根源。根源不消除，政治、军事、组织等方面的错误路

线，不论是“左”的或右的，得到纠正以后，一有机会还会反复。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在同年十二月和次年三月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反对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战日战争的正确路线，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主张，一度又模糊了党内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以致此后约半年时间内，毛泽东又处在少数甚至孤立的地位。有一次我去看望毛泽东，他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便是例证。毛泽东是革命天才。所谓天才就是比别人更聪明，更有远见。早在一九三〇年，他就通过中国革命实践，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他又大量研究哲学著作，一九三六、三七年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和《矛盾论》；在党内进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教育。一九三八年十月，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又号召全党，要结合中国的革命实践，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以后一有机会他就在文章里和指示中联系实际进行教育。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整个党的路线、纲领和政策能够比较顺利地推行，应该归功于这个教育的效益。但是要系统地、深入地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进行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的全党整风学习，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王明宗派集团的分化和克服，除王明等一二人至死不

改外，大抵也是经过这样一个曲折的路程的。一九四二年的整风学习，就成了我们党空前团结和走向胜利的标志，成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的标志，成了我们党自成立以来最好的一次代表大会——七大的前提条件。

由此可见，上述第二阶段（即一九四〇年下半年以后转到干部学校正规化的阶段）干部学校教条主义学风的滋长，是有历史根源的，不是偶然的。洛甫长期担任和兼任中央宣传部长，他有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他在遵义会议上功劳，以后又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方面是有显著成绩的；但是他的教条主义思想比较严重，在这方面，毛泽东对他是有过许多帮助的。他没有参加延安整风（延安整风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整风，后一阶段是审干，前一阶段他没有参加），而是作农村调查去了。经过一年多的农村调查研究工作，得到了教训，他的《出发归来记》，自我批评是深刻的。最近看到了他在“文化大革命”受迫害期间写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和《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两篇文章，深感这位老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和理论力量。他如没有去世，是会在思想路线上作出有益贡献的。

## （五）编辑《共产党人》

最后，我要提一下编辑《共产党人》的事。《共产党

人》杂志是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直接关怀下创刊的。《共产党人》的出版，不但同延安的干部教育以至整个党的干部教育密切相关，而且是我党建设中的一件大事。

1. 创办经过。《共产党人》创刊于一九三九年十月，它的任务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发刊词》中所说的，“帮助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我是编辑，负责编辑出版的实际工作。工作人员有陶希晋，后来又有马洪。洛甫是主编，每期稿件编好后，都送他审定。

《共产党人》是党内刊物，不仅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发行，也发行到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包括新四军抗日根据地，以及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发行总数在一千份以上。这在当时也算是发行量很大的了。

《共产党人》从一九三九年十月创刊，到一九四一年八月停刊，历时一年零十个月，一共出版了十九期。因为陕甘宁边区发生严重经济困难，纸张供应紧张，党中央决定收缩出版工作，停止了包括《解放》、《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文化》等一批期刊的出版，《共产党人》也同时停止出版。

2. 主要作用。《共产党人》出版时间不长，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主要有四点：

第一，传达中央有关党的建设的指示。我们的党当时

已是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党，十分需要及时地传达党中央的决议和指示，使它迅速地与广大群众见面，这对党的事业关系极大。我们在《共产党人》的编辑工作中，自觉地承担了这一政治任务，在《创刊号》上，我们就刊载了党中央于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发出的《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同时还刊载了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和《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其中只有少数几期没有登载中央的决议和指示。刊登指示最多的是第十九期，也就是最后一期，共刊登了九个有关的决议和指示，如《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关于地方及军队中各级党部取消、改正与停止党员处分手续的决定》，以及中宣部的《关于反敌伪宣传工作的指示》、《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报纸杂志的指示》、《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群众鼓动工作的指示》等。总计，先后共发表党中央及各部门的有关的决议、指示三十九篇。事实上成了党中央的机关刊物。

第二，传播经验。我们经常选登研究党的建设，总结党的组织工作经验的重要文章，其中，毛泽东写的《发刊词》是最重要的文章，为我们党确定了一个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的纲领，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发挥着巨大的指导作用。第十八期又刊载了毛泽东为他自己的《农村调查》写的序：《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也是我党思想建设

上的一个重要文献。《创刊号》刊载的刘少奇写的《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是我党在白区工作经验的总结。还有洛甫的《党的工作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了解具体情况》（载第四期）和《提倡朴素和切实的工作作风》（载第七期），杨尚昆的《华北党建设中的几个问题》（载第五期）等，都是有关党的建设的重要文章。我在延安，从中央党校，陕北公学直至中央干部教育部，一直在干部学校讲党的建设。部分讲稿经过整理，也发表在《共产党人》上。

第三，宣传政策。毛泽东十分重视党的政策和策略及其实施，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写过许多关于政策及策略的文章。仅在一九四〇年就写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和《论政策》两篇文章，总结了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主要政策和策略原则，强调党的政策对于争取抗战的胜利具有决定的意义。因此，《共产党人》十分重视党的政策和策略的宣传。

《共产党人》在刊载党的决议和指示的同时，经常约请一些负责同志撰写阐述中央政策和策略的文章，帮助大家正确理解和执行党的政策。比如《创刊号》上在发表《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的同时，还发表了王稼祥的《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巩固和坚强而斗争》的文章；第三期在发表《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的同时，还发表了赵毅敏的《反对恐惧和排斥知识分子的现象》、艾思

奇的《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文章。在发表《关于开除刘振球党籍的决定》的同时，还发表了胡耀邦的《拥护开除刘振球的党籍，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的文章等。我自己也写过一些。后来党中央还以《共产党人》为阵地，开展党的政策的讨论，如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政策（载第十五期）和劳动政策（载第十六期）的讨论。可见，《共产党人》在学习、宣传、研究和贯彻党的政策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是有成绩的。

第四，指导干部教育。《共产党人》是在干部教育部，后来在中宣部编辑出版的，同干部教育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关于干部教育的问题在《共产党人》中占有相当的地位。先后发表过许多中央关于干部教育的指示，如一九四〇年一月三日的《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载第五期）、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四日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载第六期）、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三日的《中央宣传教育部关于加强党内策略教育的一些具体决定》（载第十期）、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日的《中央宣传部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载第十二期）等。不仅如此，《共产党人》还为干部教育提供教材、各种参考材料以及各种具体的经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首先就是在《共产党人》上发表的（载第四、五期）。刊登在第六期上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参考书目，第七、八两期连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大纲

（初稿）》（王学文编写，以政治经济学研究会名义发表）都是为配合当时延安干部教育服务的。洛甫写过《提高干部学习质量》（载第十七期）、陆定一写过《军队中在职干部教育的经验》，章夷白、孙力余等也写过关于干部教育的专门文章，都在《共产党人》发表。所有这一切，都对当时的干部教育起过一定指导作用。有一次我同毛泽东谈话时，我说：我的工作太多，恐怕一事无成。毛泽东说，办好《共产党人》就是一事有成。这是毛泽东对《共产党人》编辑工作的重视和对我的勉励。至于我们的编辑工作，在整风前的指导思想的情况下，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错误，但现在我已无力重新审查。

## （六）小 结

延安大办干部教育，包括在职干部教育和干部学校教育，已经过了四十多个年头了。实践证明，四十多年前在延安大办干部教育获得了两个方面的成果，一是为当时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养了成千成万的革命战士，二是为全国解放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准备了成千成万的骨干力量。这是时代的产物，历史的创举。

1. 关于中央两个干部教育的决定，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和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

定》，如前所述，在干部教育的实践中发挥过重大指导作用。现在历史条件已经有了根本性变化，党对干部的要求更高了，就是说必须实现“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必须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党在干部教育上的任务也更大了。但是中央关于干部教育的这两个决定的基本精神和延安干部教育实践的基本经验，我觉得还是有重大参考价值的。

2. 关于在职干部教育。延安在职干部教育的特点，一是计划性强，它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而不是随心所欲盲目进行的。二是组织性好，它是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的，而不是各自为政自发进行的。因之，它的学习效果是好的，成绩是显著的。这方面的经验，仍有指导意义。

3. 关于干部学校教育。抗日战争时期，迫切需要大批干部，尤其是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参加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但我们的党和军队刚从残酷的内战前线撤下来，严重缺乏知识分子干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激奋了中国人民，迫切要求进行民族救亡斗争，正是此时，大批知识青年纷纷来到延安，投向共产党，参加革命，探求真理。我们党不失时机地创办了各种专业性的干部学校，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的指导下，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军事、组织上的启蒙教育和各种业务教育。他们学习后，绝大多数开赴前线参加战斗。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并曾发布《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明确指出“没有知识分

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党历史上大量吸收和培养知识分子，第一次是大革命时期，这是第二次。

延安大办干部学校教育起了样板作用。它推动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也克服一切困难，相继办起了各种军政干部学校，培养了数以万计的知识青年成为革命战士。这些知识青年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以后有些同志在抗战和内战前线或在敌人的刑场上英勇牺牲了，绝大多数同志经过长期斗争锻炼，成为社会主义时期的各级领导骨干。因此，延安干部学校教育是有重大成绩和意义的。

(郝宴华、宋金寿协助整理)

## 附件一：

### 延安在职干部一年来学习经验总结

(一九四〇年六月六日在延安在职  
干部教育周年总结大会上的报告)

#### 一、简单的经过

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是在党中央特别是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进

行的。

这个总结是从《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实施的时候起算。

“暂行计划”发布于去年三月，当时，因生产突击，将学习动员大会推迟至五月底举行；因此，这个计划在全体在职干部中的实行，实际是从去年六月开始，而到今天，刚好一年了。

延安及延安附近（远至八十里）的学校、团体、机关、部队中，干事、科员、班长以上的在职干部以至中央负责同志，都参加了学习。这是我们党内空前的创举。

“暂行计划”曾把学习的干部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类主要为担任负责工作的老干部，他们以联共党史为必修课；乙类主要为文化水平较高而党龄较短的新干部，他们以共产党的建设为必修课；丙类为政治、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他们同时学习文化课与党的建设。现在看来，这个计划是正确的。

现在，参加学习的有四千余人，计：甲类八百三十七人，乙类二千二百五十五人，丙类九百六十八人，合计起来，比“暂行计划”开始实施时增加了九百余人。人数的增多，不只是由于机关学校等的扩大，而且也由于学习运动的展开。这在今天，是延安最大的一个学校，又是物质上、人力上最少花费的学校。

从“暂行计划”发布后到现在，我们对这个大学校的教育工作作过三次总检查：去年八月第一次，今年一月第二次，这回的总结检查是第三次。每次检查，都采用了民主的方式，最后经过中央宣传部作出总结。每次检查，都发现了新的问题，作了解决，并在干部会上作了报告。

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在职干部教育，对于我们，原来是创举，没有现成的规律可资依从，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参考。“暂行计划”因此名曰“暂行……”。实际上，去年六、七两月间，我们的工作带着不少摸索性质，而六、七两月的实践，才给我们以

可能对此计划做出必要的补充和修改。这些补充和修改，就是去年八月检查的结论（请参看《解放》八十六期上的文章）。

过去两次检查所决定的办法，基本上都执行了，实际经验证明那些决定是正确的。

这次总结检查，各方面的同志都认真的进行了，比过去检查得更加深刻。中央宣传部将各方面的报告研究了，并且讨论了，认为还要向同志们说到以下的几个问题，并请到会同志回去转达到没有到会的同志。如果有什么不同的或补充的意见，请告诉我们。

## 二、学 习 的 成 绩

现在，让我们简单地检查一下一年来学习的成绩，这可从下列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关于计划实行的程度。联共党史和党的建设已经学完了。丙类，党的建设，有的学完了大部分，有的学完了一半，但有少数还未学到一半。他们的识字数目，最多的学得一千二百字，少的也有二百字。此外，个别的特别小组，如“资本论小组”和“哲学小组”，都有一定的成绩。时事政治性质问题的讲演，平均每月举行了两次，负责干部的报告会举行过八次。

其次，关于学习的成效。党史和党的建设的收效是相当大的。这次测验告诉我们，许多同志在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上，比以前提高了一步。而从各方面的总结报告又可以看出，许多同志对于党和党的工作的观点比以前不同了，自觉性提高了，不安心工作的现象和无原则的现象大大的减少了。有些同志受了党课的感动而回头寻找自己的弱点和错误，并力求克服它们。许多同志的对党和革命的认识提高了，工作积极性提高了，因而工作效能提高了。这些，就是我们学习成绩的主要表现。我们的学习，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是为了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些。

再其次，我们的成绩就在于：学习制度和学习方法有了初步的建立，学习的习惯有了初步的养成。平均每天两小时的学习，在大多数同志间有了保证。一部分同志对于挤时间，已经不需要用九牛二虎之力。一部分同志已经不大感觉到“读书苦”，而另一部分同志则觉得“读书乐”。许多同志已经体验到，进长期大学很可以学得些东西，不象过去一样，大家望着短期大学垂涎。这是一个不小的成绩。

最后，在我们的学习运动中，已经涌出来一些模范小组，它们在学习积极性上、学习方法上和学习成效上，都可作为大家的参考和揣摩。

关于成绩，只说到这些。

自然，这不是说，我们的学习运动中已经没有某些弱点和缺点了；不过，依现在的情况看来，主要的问题是怎样把学习运动更加推进，更加提高的问题。只要继续前进，弱点和缺点是容易克服的。

为了把学习运动更加推进，更加提高，我们提出下列几个问题。

### 三、认识问题

为什么必须学习呢？为什么党的中央把学习提高到这样重要的地位上来呢？对于这，许多同志都清楚的了解到了。可是，不是每个同志都了解的。因此，对于这，还有些问题需要说明一下。

“我革命多年了，从没有学习过，还不也是革命？”有同志这样气愤的说，当他被学习烦恼了的时候。

这样说，是错误的。

说这话的同志没有认识，革命并不是“蛮干”或“盲干”，革命并不是自发斗争。列宁告诉我们，工人的自发斗争，只能成为“工联主义”。只有在革命理论指导下的斗争，才是革命运动。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这个真理，是已经被世界工人运动历史完完全全证明了的。

至于我们的党，如果认真的要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国人民的政治领袖，那末，就必须用革命的理论把自己武装起来。否则，不但不能领导革命到胜利，相反的，会使革命走向失败，陈独秀主义、李立三路线等，不是严格的教训了我们吗？我们的党正在“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使之向着胜利，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实际运动的了解，就不能有胜利。”

（毛泽东）所以，“只有被先进理论所指导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列宁）

由此可见，一个被称为人类最先进政党——共产党的党员和干部，就丝毫没有理由轻视理论的学习。相反的，应当十分尊重革命理论并十分努力地学习它，才算不辜负党员和党的干部的称号。我们党的先锋作用与政治领导，要经过自己的干部和党员，才能实现的。

所以，“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该着重地研究这些东西。中央委员与高级干部尤应加紧研究。”（毛泽东）

有的同志把日常工作同学习对立起来。例如这样说：“我做的是日常工作。日常工作很忙，没有办法学习，只好做了事务主义。”似乎顾了日常工作，就再没有办法学习，就只好安心于事务主义，作一个事务主义者，这是不对的。第一，日常工作是党的革命工作的一部分，每个党员、每个干部、每个党的领袖都要亲身参加一定的日常工作。日常工作不等于事务主义，日常工作不等于事务主义者。党需要有很好的日常工作，才能实现自己的方针，才能使自己的总路线变成物质的力量。忽视或轻视日常

工作，是不对的。第二，怎样才把日常工作做得好些和做得更好些呢？这要靠理论的把握和指导。毛泽东同志说得好：“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错，但如果不加深一步地学习理论，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而只有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才有我们的胜利。”斯大林同志也说：“国家工作和党工作任何一部门中的工作者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高，则工作本身也愈高和愈有成效，工作的结果也愈有效力。”第三，什么是事务主义？怎样变成事务主义者的呢？事务主义就是迷惑于眼前的、日常的利益，就是日常的、部分的工作脱离了总的方向和前途，就是工作中的鼠目寸光。“工作者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低，则在工作中也就会发生延误和失败，则工作者本身也就愈会变为鼠目寸光的小人和堕落为只图眼前利益的事务主义者，则他们也愈会蜕化变节。”（斯大林）

由此可见，事务主义会把工作者引导到蜕化和变节。我们边区内党的和政府的工作中，已有若干实例证明了斯大林同志这个结论。

由此可见，要把日常工作做得更有成效和做得更好些，要不陷落到事务主义的泥坑，就只有加紧学习理论。

由此可见，把工作和学习对立起来，是不对的、错误的。

说到比较高级的负责干部，那末，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更应该加紧学习。因为，他们所负责任更大，更需要把握理论；因为，他们的责任，不仅是工作的领导者，且应该是学习的领导者。他们不仅要领导干部和党员的工作，他们还应该教育干部和党员，领导他们学习。可是，对于这一层，也不是每个同志都了解到的。如果要问一年来谁学习得最少，那末，实际情形是这样：除开丙类干部不论外，学习最少的是甲类中一小部分老的干部（我所说的是一小部分）。这种现象，开始在克服，我们希望很快地消灭它。

对于学习的认识，需要说的，就是这些。

#### 四、决心问题

对付事物，先要有明确的认识，才能谈得上适当的对付，所以，明确的认识是重要的。

但是，有了明确的认识以后，还必须有充分的决心，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对于工作是这样，对于学习也是这样。因此，要谈谈学习决心的问题。

没有时间，怎样办呢？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挤”便有时间。但是“挤”便要有决心。首先要决心建立一个工作的和学习的制度，并要有决心实行这个制度。有了制度，要做的事情还是如潮水一般的涌来，又怎样办呢？那就要有决心分一部分事情给别人做，不要只相信自己而不信任别人的工作能力；那就要有决心把次要的工作“挤”在后面，“天不会塌下来的”。这样可能吗？可能的。在这方面不是有许多好的榜样吗？他们能行，我们也应该能行！

读不进，怎样办呢？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钻”就能读得进。但是，“钻”便不能没有决心。“钻”几下就放手，不会成功的。“钻”的决心，就是洛甫同志经常说的，学习的坚持性和顽强性，就是要硬读苦读。职工委员会有一个姓赵的同志，他原是一个不识字的工人，去年要他学习时，他感觉得很苦，因此不大愿意；但后来，他下了决心去“钻”，“钻”到现在，据说已经能读《新中华报》了。这是一个“钻”而有成的例子。从前在中央苏区时，我也看见过与这同样的例子——中央妇女部一个姓傅的女同志。她是三十多岁的农妇，她初到中央妇女部时，只识几个字，但凭她两年（工作的两年）的努力，她能写上二十几页的书面报告。在我们这里，有许多努力“钻”并“钻”得很好的模范，我没有把他们当作例子举出来，而特意提出上面的两个例子，

是为了要给我们证明：工农出身，年龄大了，没有进过学校等等，都不能成为不能学习的借口。“檐水滴得石穿”，“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我们有决心“钻”，担保能够学得一些东西的。

其次，要有决心做别人的“学生”。在我们的周围，有许多学问高明的人，无论那一门学问，都可以找到比自己高明的人。利用别人的长处来作自己的教师，对于这一点，我们没有能好好的做。实际中还有这样的现象，个别的新干部，自恃自己水平高，看不起工农出身的老干部，不肯向他们学习；相反的，也有个别的老干部，觉得自己做的负责工作，是老前辈，不屑向有知识的“后生娃娃”学习。这类观点是错误的，应该改正。

最后，要有决心向学习最好的人看齐，向毛泽东等中央诸同志看齐。决心向他们看齐，并不就是说，自己在理论上、政治上一定能够赶上和达到他们所有的水平；而是说，要向他们的学习精神和方法看齐，向他们的前进精神看齐。这样，而且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前进，才不致落伍。至于那种“倚老卖老”、“得过且过”的派头，是很不好的，根本要不得的，有这种派头的人，应该断然去掉。

决心“挤”时间，决心的“钻”，决心向别人学习，和向先进者看齐，这是把我们学习运动更向前推进的重要条件。

## 五、方 法 问 题

有了认识，有了决心，还要有适当的方法，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一年来的在职干部教育，在学习方法上有许多经验。这里只谈谈主要的问题。

首先，是自习为主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原则上老早就解决了，但在实际上还没有完全解决。有的同志仍然轻视自习。他们听课是到的，讨论会也到的，但从来不发言或很少发言，也没有提出

过问题或很少提出问题。考查原因，就是他们只上了课，只参加了讨论会，但没有看书，换句话说，他们用了耳，却没有用眼。这是一类：他们能够看书，却没有看书，没有预习，更没有复习。还有这样的见解，认为丙类干部识字很少，他们不能看书，因此，他们的学习只有靠教员或主要靠教员。这种见解，不能认为是正确的。丙类干部自然需要更多的外来帮助，但他们主要的如果不是靠自己努力，则也很难学得东西。事实告诉我们，一样的不识字，一样的上课，但是有些人已识到千数字，能够慢慢地阅读《新中华报》，而另外有些人，还只识百数字，连个便条也看不懂。所以，识字也好，研究理论政治也好，主要的方法是自习。主要是自习，并不是看轻教授与指导的作用，并不是看轻互相推敲与互相辩论的作用，而是说，所有这些，都要以自习作基础。有人在强调自习的时候，觉得上课和讨论会都是多余的事，而不愿意参加，那也是不对的。

其次，是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习惯的问题。如果说学习要用耳听课，还要用眼看书，那末，把两者统一在自己指挥之下的却是脑。不但使用耳和眼，而且善于使用自己的脑，善于独立的思考问题，才是真正的“钻”，才是真正地发挥了自习的作用。自习不外看书和思考，“钻”进书本子里去，反复地耐心地读，这自然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还在于能够跳出书本子，抛开书本子，而独立地思考问题。我支配书，而不由书支配我，这就是学习上的主动，就是最有效的“钻”。缺乏这种主动性，很难学得好。现时学习运动中最主要而又最普遍的一个弱点，就在于缺乏这种主动性，换句话说，就在于缺乏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听得很多，看得很多，笔记也不少，但思考和研究太少，因此拿自己占有有的东西和所学过的东西比较起来，就有一个相当的距离。因此，我们要养成学习中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思考能力是人类的特质，虽然人与人之间在思考能力上有程度的差别，但能

力较低的人，如果经常使用思考，思考的能力可以发展起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比起“看”和“听”来，思考自然是困难些，因此，不惯思考的人总以思考为苦，但如果养成习惯也就自然了，所谓“习惯成自然”。要把学习的质量提高一步，则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便是问题的关键。

为要培养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我们以为学习方式中某些机械的东西，应该有所改变。譬如，集体自习，机械地每天自习两小时，强制性的结论，对敢于怀疑和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非友谊”的态度，以及庄严的讨论会使得有些同志不好意思或不敢提出问题等等方式，都是不适当的，应该改正的。这就是说，在我们的学习中，需要以民主的精神来培养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和习惯。

以自习为主，养成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与能力，这便是我们学习方法的基本原则。在此基本原则之下，应该允许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方法同时存在，不应该机械地限制同志们采取某一种方式和方法。在这方面，还需要更多的创造性。

让我们介绍两个实例吧！一个是陈云同志所领导的小组，一个是洛甫同志所领导的小组。这是两个模范的小组。但两个小组的方式与方法则各有不同。前一个小组的方式是：“就书论书”，每周读一章或半章，要求每句读懂，连读二、三遍，作笔记；开讨论会时，逐页质疑，质疑后，由报告人报告，然后讨论，然后由指导员作结论。他们用这样的方法，已读完《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与《哲学选辑》，现正读《唯物史观》。他们准备在两年内把联共党史、哲学选辑、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中国问题读完。这个方法，正如他们的报告中所说的，“为了保证每个干部在一、二年内能够将基本课程初步地读完，以便打下自我学习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是一个好的方法。这个方法，是“少到多，浅入深”这个原则的一种运用。

后一个小组的方法，按照它现在的情形说来，是：有研究提纲，有指定的参考材料，也有报告，有结论，也有指导员，但质疑不依一定的形式，而报告更是多样性的。除开简单的一般性的报告而外，有时插入专门性质的报告。例如，讨论“哲学是什么”时，有一个同志报告辩证唯物论发生的历史，另外有一个同志报告列宁关于“哲学周期”的指示。讨论时，也常有专门性质问题的发言。这个小组注重独立的思考和生动的辩证，很少形式上的拘束。这个方法，是倾向于把研究引导到展开和深入的方法。

这两个方法，在一定条件之下，都是好的方法，并且实际经验告诉我们，两个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可是，除这些方法之外，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方法。这方面，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创造。

此外，军事系统中某些小组，为了有好的指导员，为了互相观摩，而把几个小组联合起来开讨论会，也是一种好的方法，可以供参考的。

还有这次总检查的经验告诉我们，测验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在某课程研究到适当的段落时，暂时停止一下，出些有发展思考能力的题目，让大家回头去温习一下，把已学的东西重新整理和综合一下，是很有好处的。不过学习测验不要和学习一般检查同时进行，以免互相妨碍。

关于方法问题，说到这里为止。

## 六、要 加 强 指 导

加强指导，是指的加强学习的指导，而不是指的组织上的领导。关于组织上的领导，我们已做了不少，并且有了明确的制度，即党的支部和行政领导干部共同负责来组织与保证学习的纪律。对于这，自然应该坚持下去。在过去的时期中，由于许多同志还缺少学习的习惯，曾经不能不把组织学习提得很高，曾经不能不组织多于指导。可是，现在的情形比以前大大的不同了，在许多

同志中，学习习惯逐渐养成了，学习兴趣提高了，自习能力加强了，因此，对于他们所需要的不是多一些组织，而是多一些指导。

这并不是说，过去不需要指导，或者没有提出过指导的问题。“暂行计划”中曾经着重地提出指导员的选择及其任务的问题，然而，过去没有切实地解决这个问题，除开上述的原因外，还有经验的问题、能力的问题。现在我们有了些经验，能力也比以前多一些。因此，我们可能在学习的指导上，做更多的工作。

办法怎样呢？

办法可采取以下各项：

第一，改善大课的方法。预先发出提纲和参考书目（联共党史不要提纲）。要求教员有更充分的准备，更认真地教授。

第二，从甲类干部中选择一批联共党史和党建的指导员去指导乙、丙两类干部的学习。甲类干部已经学过联共党史，又补习过党建，他们有责任去帮助其他干部。同时，帮助也是更深入的研究，于己于人，都有好处。选择的责任由中央宣传部、八路军政治部的宣传部以及边区党委宣传部共同负责进行。对担任指导责任的同志，应该适当地减轻他的工作，使他能尽责指导，又不妨碍自我学习。

第三，由中央宣传部聘请各科学习顾问，组织各种顾问团，以便帮助指导员和学习者解答疑问。

第四，给离延安市较远的地区，设立巡回教授站。

第五，在《解放》、《中国青年》等刊物上，介绍学习方面的新的资料、新的经验和新的方法。

这些办法，就可实行。如果发现其他好的办法，马上采用。

## 七、要加紧时事政治的研究

研究时事政治的重要性，曾经多次地被指点出来，事实上也进行了一些，个别的部门（如敌区工作委员会、职工委员会、部

分军事机关)，也有好的成绩。但一般地说来，则没有做好。原因何在呢？依我看来，原因有两个：一是缺乏有计划的指导；二是缺乏坚强的组织工作。

为了把时事政治的研究提高一步，须采取以下的办法：

第一，加强时事研究会的工作。它必须按时地作出提纲，把它发布下去以供研究，或派出报告人，分途作报告。

第二，有计划地组织时事政治的讲演。

第三，党的支部（或小组）每月必须举行时事政治问题的讨论会。行政上负领导责任的同志必须分别出席指导。

第四，每个干部对于党报上关于时事政治的主要文章，必须阅读和研究。必要时，须经过支部的讨论（分别的或综合的）。

第五，检查学习，必须把研究时事政治的成绩放在重要地位上来。学习的测验，也须列入时事政治问题的课题。

第六，时事政治问题的讲演和研究，应插入战争的问题。

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去分析变化万端的时事政治，找出战略上、策略上的结论，这正是理论同实践的联系，正是每个干部迫切需要学得的本领。我们必须在这方面更加努力起来！

## 八、要加强对丙类干部的帮助

从各部门的总结报告看出：丙类干部的学习成绩，一般地比较差，有许多则很差。“比较差”或“很差”的原因何在呢？丙类干部事务工作大都繁忙，难于按时学习，这是一个原因。丙类干部文化水平太低，进步慢，这也是一个原因。丙类干部多半年龄大了，学不进，这又是一个原因。还有，丙类干部没有学习习惯，他们不爱“挤”，更不高兴“钻”。所有这些都是困难，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可说是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的原因，是在于对他们缺乏足够的帮助。

哪些事情上表现对他们的帮助不够，哪些方面应该具体地进

行帮助呢？

第一，行政上的主要负责人应该提高自己对于丙类干部学习的关心和帮助，不只应该以如何对待甲、乙二类干部的学习一样去对待丙类干部的学习，而且应该给他们以更多的关心和更多的帮助；这因为他们的生活比较特殊些，他们的工作更要繁杂些，而他们学习中的困难更要多些的缘故。

这是加强丙类干部学习的主要关键。

第二，过去一时期中，许多部门把丙类干部同勤务员等编在一起来进行学习，现在看来，这是不适当的。这种编制，无疑地会降低丙类干部的学习积极性，而不可能提高他们的积极性。

因此，今后必须让丙类干部单独组织起来学习。

第三，必须为他们选择适当的教员和指导员（党的建设改上大课，所以需要指导员）。教员和指导员必须是为他们所信仰所欢迎，而且真正能够切实帮助他们的人。因此，党建教员，应该由负责干部分别担任，指导员亦须选择适当的同志充任。这样，便能够保证理论同实际的一致，教授同指导的一致。至于文化课，则应该有比较专门的教员，因为文化课教员需要具备两个条件：懂得教授方法，并有时间指导复习。

个别部门对丙类干部的教员采取随便“拉夫”的态度，应该改正过来。

第四，由于丙类干部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的特殊性，对于甲、乙二类的干部是适合的工作制度与学习制度，对于他们则不完全适用。因此，应该重新考虑丙类干部的工作制度与学习制度，使之适合于他们的情况。譬如，他们之中，第一种人经常要担任出外勤务，第二种人则在午前七至九时之间必须处理当天的事务，还有第三种人，他们的情况又是别个样子。那末，对于这些问题，如果不想出适当的办法，学习自然不会有什么成绩。所以，适当的解决丙类干部学习中的许多困难，是重要的事情。

关于加强对丙类干部学习的帮助，就是这样。

## 九、继续前进

一年来的学习运动，不仅将我们自己提高了一步，而且在学习方法上也积累了相当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全党的干部教育事业是有意义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又由于有些问题曾经说过了，不必再提，所以总结报告中只说到以上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是我们实际经验中提出来的比较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将使我们的学习运动更加展开，更加提高。

无论从学习的成绩来讲，或是从学习的经验来讲，对于我们，还只算是有了初步的收获，还只算是刚才前进了一步。学问是无止境的，我们必须继续地努力和继续地前进。

努力吧！为着学习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而斗争！

为着掌握马列主义——引导革命到胜利的武器而斗争！

为着干部学习运动的普及与深入而斗争！

（原文载《解放》第一百一十期，一九四〇年七月一日出版。）

## 附件二：

### 鲁艺的教育方针与怎样实施 教育方针（节录）

二、什么是鲁艺的新的教育方针？

什么是鲁艺的新的教育方针？如果把它的内容规定起来，就

是：“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材，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这个方针是经中央宣传部讨论拟定，经中央书记处通过的，是完全正确的方针。

从鲁艺负责同志那里知道这个问题曾经向大家报告过，但我还是要向大家重新提到，因为这个方针鲁艺还在开始实施。现在正需要集中鲁艺全院的意见，来商确(定)一个具体实施的办法。

这个方针在鲁艺还没有完全明朗化，例如：有同学曾在会议上表示他对这个方针是模糊的，甚至有人还表示怀疑、失望。因此，正确、清楚、深刻地来认识与把握它就完全必要；否则，将使学的不知要学什么，教的不知怎样教，工作失去方向，不知如何去工作。

对于上述的教育方针，我们应该怎样来认识呢？

(一) 首先，这个方针的确定，是为了适合于今天抗战的需要。鲁艺是培养抗战艺术干部的学校，但过去鲁艺两次教育计划都是偏重于比较专门的干部的培养。这样的干部是需要的，但很难满足各个战线上的大量需要。从许多出去工作和实习的同志们的经验，更加证明：在抗战中需要成千成万的领导俱乐部与战地服务团等类文艺团体的人材。这些艺术团体的工作，是深入群众的工作。这些艺术团体的实际活动，对艺术要求大众化，而对艺术工作者的要求并不只是音乐或是美术，而是音乐、戏剧、美术、文学同时都需要。这类艺术团体与艺术活动，今天在前线在后方有广大的需要。这类艺术团体的团员不但难找到，而这类团体的领导人材也不容易获得。这样的领导干部不能单是有一种专长，而是要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技能有一个相当的水准。如果有了这样的领导干部，我们就可以到处组织大众艺术活动的团体。所以当前迫切的问题，便是要大批培养这样的艺术干部。

鲁艺今天要大批地培养这样的干部，以适合抗战的需要，这是教育方针的一个目的。

(二) 其次，新的教育方针还确定要“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的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艺术理论与实际”。中国新文艺运动的主流，过去与现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它和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密切地配合着，影响并且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它所走的路线基本上是随着中国共产党所指出的方向，是合于马列主义的要求的。因此，它对于民族解放事业，不仅有力量，并且有功绩。而一切反动的、保守的、落后的、狭隘的文艺活动，则从来没有舒展过自己的工作，也没有什么力量。

文艺运动走着正确的路线，与许多文艺工作者的努力和前进是不可分离的。自左翼文艺阵营（如创造社、左翼作家联盟等）建立以来，他们为了正确的文艺路线而斗争，是以作品和鲜血来换得自己的成绩的。从过去直到现在，他们保持并且发扬了这个优秀的传统。在座许多同志就是过去和现在的文艺阵线上优秀的战士。

过去的新文艺运动虽然有着一个新时代的方向，主流是正确的，但还没有建立起一个有系统的关于艺术各部门共同基础的文艺理论体系。因此，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立中华民族新时代的艺术理论与实际，已经是全中国的艺术家、文艺工作者最迫切的任务。一切艺术活动，正需要正确的有系统的文艺理论的指导，而这个任务，首先落在鲁艺和在座的同志们身上。有同志曾提出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来整理中国的艺术；有同志提出建立中国的工农音乐，这都是很对的，应该欢迎的。现在全中国的艺术界及艺术的爱好者，都在注视鲁艺和在座的诸位同志。他们在期望鲁艺拿出东西来。他们要什么？无疑的，他们是向我们要求文艺理论的指导，要求我们的创作，要求我们的工作经验，要求我们供给各种材料。

建立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正有待于鲁艺和在座的许多同志们的努力，也就是说中心的一环在于干部。因此，我们的教育方针确定着“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文艺人材”。这是建设新时代文艺运动的根本条件。

有的同志以为现行的教育方针只是注重于横的发展和量的增加，忽视纵的方面和质的提高，这显然是一个误会。很明显，鲁艺的现行教育方针，不仅要训练大批适合于今天抗战需要的一般艺术工作的干部，并且要培养许多新时代的文艺人材，许多专门家，不仅要有一般的艺术能力，并且要深研理论与实际。

鲁艺的现行教育方针，不仅要求量的收获，并且要求质的收获；不仅要适合今天抗战的需要，并且要适合于新时代的需要，为新时代而工作，展开新时代的文艺运动。

（三）再其次，新的教育方针确定，“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

鲁艺是中共领导下的一个培养艺术干部的学院。正因为鲁艺是中共领导下的一个学校，全国人民、全国艺术界就非常注意这个学校。许多人材（如在座的诸位教员、研究员），许多热心前进的艺术工作者和爱好者（如在座同学），便从各地方、各个战线到鲁艺来了，或是愿意来参加教育培养干部的工作；或是希望在中共的帮助下研究与从事于建设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或是来鲁艺学习文艺的理论与实际，准备从事于抗战的艺术工作。还有更多的人材和广大的青年，虽然没有到鲁艺来，但他们面朝着鲁艺，爱慕鲁艺，要求鲁艺帮助他们或是计划着要来鲁艺。

鲁艺为什么现在能够团聚着许多同志，为什么能影响到外面更多的人呢？我想，中国的新文艺运动一贯是在中共政策的指导与影响下的。因此，许多非党的、前进的、优秀的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他们都是信任中共，并且爱护中共的。他们在自己的工作走着和中共相同的路线，和许多共产党员在一起友爱地工作。

过去是这样，现在更是这样。现在情形比以前更不同，在中共的领导以及许多党的、非党的同志积极努力下，鲁艺创办起来了。这是过去所没有的。因此，鲁艺就被认为是中共实现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了。全国人士的这种期望，我想不但我们的党，就是鲁艺的人，一定乐于接受。

应该认清，“要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也就是使鲁艺成为中国文艺战线的堡垒与核心；要做到这点，就只有训练并团结更多的人材建设文艺的理论与实际，没有这些就得不到前面所说的结果。这个堡垒与核心的渐渐形成，依靠着鲁艺的工作，依靠着鲁艺许多艺术家的努力，依靠我们在正确理论指导之下艰苦奋斗地前进。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日

（录自延安革命纪念馆收藏的文献资料）

# 从百色到湘赣

袁任远

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俞作豫等同志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一九三〇年二月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一次规模较大的城市起义。这次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在广西西部地区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一九三〇年秋，红七军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转战桂黔粤湘等省，历时九个月，行程一万二千多里，最后进入江西，实现了与中央红军的汇合，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

## 邓小平同志到广西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在中国建立了新军阀的统治，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但是，蒋桂冯阎四大军阀联合战胜张作霖之后不久，这种统一就公开破裂了，形成了新军阀混战的局面。一九二九年三月，蒋介石集团与桂系

集团为了争夺两湖地盘，首先爆发了战争。在蒋桂战争中，桂系将领李明瑞、杨腾辉倒戈拥蒋，桂系失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被迫下野。蒋介石任命李明瑞为广西省绥靖司令，杨腾辉为副司令，俞作柏为广西省主席。

六月间，李明瑞、杨腾辉的部队离开湖北由陆路返回广西，李明瑞本人则由水路经上海、香港返回南宁。俞作柏、李明瑞过去曾受我党的影响，同情革命。他们主政广西后，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要求我党派干部到他们的部队工作。党中央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派遣一部分同志进入广西，到李明瑞的部队工作，为建立我们自己的武装力量和进行武装起义作准备。中央派邓小平（化名邓斌）同志为中央代表来广西负责领导，派张云逸、陈豪人（即陈明）、龚鹤村（即龚楚）来广西协助邓小平同志工作。另外，从中央和广东省委还陆续派了几十位同志到广西工作，我现在尚能记得名字的有叶季壮、许进（原名许甦魂）、李谦（李立三同志的弟弟，原名李龙光）、沈静斋、符斌、冯达飞、李朴、许卓（原名许崇清）、李干辉、阎伯衡、吴霖、黄一平、章健、王展、张翼、何莽、何畏、云广英、杨茂、杨成之、何世昌、袁振武（即袁也烈）、宛旦平等同志。

我是通过李明瑞的秘书姜组武的关系到广西工作的。这次李明瑞倒戈拥蒋，姜起了一定的作用，为李所器重。蒋桂战争结束后，姜随李明瑞由湖北返回南宁路经上海

时，曾来找我，约我去广西工作。当时我已在上海赤色总工会工作，于是将上述情况向党中央作了报告。不久，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找我谈话，认为这是开展兵运工作的好机会，同意我去广西李明瑞部进行工作，并发给五十元路费。我回机关向上海“赤总”的领导阿炳同志作了汇报，辞去了总工会的工作。经过几天的准备，就乘船去香港，到广东省委转组织关系。当时广西还是特委，属广东省委领导。

我到香港找到省委，换了介绍信，然后经梧州到了南宁，在李明瑞的督办署找到了姜组武，我就暂住在督办署。经姜组武的介绍，我认识了李明瑞。李是北伐名将，在北伐中立过战功，对下级能以礼相待，不摆架子，没有军阀习气。两天以后，我按照省委的指示，到教导总队找到了石澄洪队长，把省委的介绍信交给他，接上了组织关系。不久，陈豪人找我谈话，将我分配到教导总队，任政治教官。当时，党组织还是秘密的，党员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我到教导总队后，受陈豪人单线领导，直到百色起义时，党组织才公开。

教导总队是我们党通过俞作豫（共产党员，俞作柏的弟弟，李明瑞的表弟）向李明瑞建议而开办的，其任务是为李明瑞的部队培训初级军官。学员主要是从李明瑞部队中抽来的班、排干部，也有一部分是比较优秀的士兵和地方党组织选送来的工人和青年学生。他们经过几个月的教

育、训练后，到部队担任基层工作。我们党对教导总队的工作是很重视的，经过党的活动，张云逸同志担任了教导总队的负责人。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力量，从中央和广东省委派到广西来工作的同志，大部分分配到教导总队，有的担任教官，有的担任连队的领导。教导总队共有三个营九个连，一千多人。当时，连一级干部都是共产党员，排长也是挑选思想比较进步的人来担任。我们在连队还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发展党员，仅两个月的时间，就发展了三百多名新党员。我们重视对学员的教育工作。因教导总队成立不久，还没有统一的教材，除了对学员进行基本的军事知识教育外，着重进行阶级教育，提高学员的政治觉悟。这样，他们返回部队后，可以发挥作用，成为骨干力量。

李明瑞到广西后，为了扩充实力，收编了一些土匪、民团和散兵游勇，组成了几个警备大队。警备大队的成分很复杂，纪律很坏，没有战斗力，李明瑞遂请张云逸同志帮助改造警备第四大队。张云逸同志接受了李明瑞的邀请，并提议由李谦同志任副大队长。张兼任警备第四大队的大队长后，首先在组织上对第四大队进行了初步整顿。对一些反动军官，有的撤换，有的调离，又从教导总队调去一百多名党员和干部，并在连队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有的党员还担任了连、排干部。在部队的成分上也进行了初步改造，从工人、农民、青年学生中招收了一千多人，充实了部队，为部队增加了新鲜血液，使第四大队由一千多

人发展到二千多人。经过初步整顿和改造，我们基本上掌握了这支部队。

邓小平同志到广西后，一方面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另一方面利用半合法的地位，积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各地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也更加活跃起来了。

## 百色起义

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后，在我党的推动下，采取了一些比较进步的措施。释放了在“清党”中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开放了工农运动。如果俞、李政权能够延续一个时期，对我们进一步开展工农运动，逐步争取、改造李明瑞的旧部队，建立我们自己的武装力量都是有利的。但是，九月间，俞、李决定与张发奎联合，共同反蒋。我党清醒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时机不成熟。李明瑞只有三个主力师，兵力不足，而且来广西的时间不长，立足未稳，内部意见又不一致，成功的把握不大。我党曾劝说俞、李不要上当。但是，俞、李决心已定，没有采纳我党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我党遂向俞、李提出：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和教导总队没有训练好，不能配合作战，建议留在南宁担任守护后方的任务，由张云逸担任南宁警备司令。李明瑞同意了。我们利用南宁警备司令的名义接管了省军械库等机关。军械库里存有五、六千支步

枪，以及机枪、迫击炮、山炮、电台等，还有很多弹药。

九月底，俞、李通电反蒋，并在南宁召开了讨蒋誓师大会。这个通电是余惠同志（即余爱生）帮助起草的。李明瑞审阅电稿时，只将历数蒋介石罪状中的一条“把北伐的胜利果实归之于己”，改用了“贪天之功以为己功”的成语，并将“天”字，改为“人”字。十月初，俞、李出兵广东，进攻陈济棠。

俞、李的部队出发后，我党立即决定由警备第四大队派一个营去右江地区，警备第五大队派一个营去左江地区，协同当地党组织，为建立革命根据地作准备。右江地区西北毗连云南、贵州，南面与左江各县相连。这里人烟稀少，汉瑶杂居，反动统治力量较弱。大革命时期，韦拔群同志从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后，回到东兰、凤山，领导农民运动，组织农会，建立农军，反抗豪绅地主，进行武装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广西各地的农民运动相继失败，右江的农民运动虽然也遭到了严重摧残，但农民组织的基础仍然保存下来了。一九二九年李明瑞来广西后，农民运动又得到了开展，并建立了几百人的武装，这就为我党在右江地区发动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准备了有利的条件。同时，我们还准备了十多条汽船和民船停在邕江待用，一旦时局有变，立即把军械库的武器、弹药装上船只，运往右江。

俞、李的讨蒋部队刚到桂平，还没走出广西的大门，他

的三个师全部叛变。俞、李的失败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快，前后只有十几天，就彻底失败了。俞、李只带几个随从仓皇逃回南宁，然后随俞作豫同志率领警备第五大队到了龙州。接着，俞作柏经越南跑到香港去了，李明瑞则留在龙州，准备继续与我党合作。

俞、李反蒋失败的消息传来后，我们按照预定的计划，将军械库的武器、弹药等物资装上船只，由邓小平同志指挥军械船和警卫部队溯右江而上，驶往百色；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大队则由张云逸同志指挥由陆路开赴右江。有一部分干部乘船从水路去百色，很巧，我和小平同志同乘一条汽船，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小平同志。第一次见面就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很健谈，有时也很诙谐。

我们到百色后，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和部署，积极开展工作。

首先，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我党的主张，发动群众。

第二，把政权掌握过来，在我们力量所及的地方，撤换一些反动的县长，换上我们的干部。

第三，整顿部队，扩大武装。我们的部队是从李明瑞的旧部队拉过来的，成分复杂，过去虽然经过初步整顿，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和许多复杂的原因，整顿得很不彻底。为了把这支旧军队改造成革命的军队，我们在部队中进行了民主改革，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实行官兵在政治

上、生活上一律平等，经济公开，禁止打骂士兵。还在营连建立士兵委员会，受政治委员与政治部的领导。在民主改革中，充分发动群众，对克扣军饷、打骂士兵的反动军官进行了清洗。对他们不抓、不杀，发给路费，“礼送出境”。同时，对右江地区各县的警备队也进行了整顿和改造，建立了各县的地方武装。

第四，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当时，部队中党的力量很弱，有些单位党员很少，有的单位连一个党员也没有。我们派党员干部下去建党，分单位负责“包干”。如卫生部的建党工作，就是我负责的，卫生部部长就是第一批发展的。

第五，加强干部的教育工作。小平同志对干部的培训非常重视，亲自给干部讲课：党的“六大”决议、苏维埃政权等问题，就是他讲的。他讲课理论联系实际，很受欢迎。除了政治教育外，我们还进行军事知识的教育。当时许多干部是工农出身或知识分子出身，没有经过军事学校的训练，也没有打过仗，不懂军事。我们请军事教官给干部讲军事课，讲战略战术，讲游击战，特别是给干部讲授了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总结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此外，还讲射击要领，教干部怎么打枪，进行实弹演习，还教干部学习骑马，准备将来打游击。

当我们在右江积极准备武装起义时，当地的土豪劣绅

勾结警备第三大队，妄图消灭我们。熊镐的警备第三大队原系广西、云南边界的土匪，被俞、李收编。他们有一千多人驻在田阳一带，与右江各县警备队勾结，欺压群众，是安在根据地内的一颗钉子，对我们威胁很大。不消灭这股反动势力，不仅影响起义计划的落实，而且影响根据地的建设和群众运动的开展。经研究，决定采取智擒的办法。十月二十八日张云逸同志在百色活捉了熊镐；与此同时，我恩隆、奉议、思林的农军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消灭了熊的部队，俘虏敌人一千多人，缴枪七百多支。我们消灭了警备第三大队后，敌人的反动气焰才有所收敛。

十一月初，我们派到上海向党中央请示工作的龚饮冰同志回到了百色，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中央同意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创建红军，并颁发了红七军、红八军的番号。委任张云逸同志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长，邓小平同志为政委；俞作豫同志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军长，邓小平同志兼政委。中央要求我们尽快举行起义。

小平同志把右江的起义工作部署好以后，于十一月中旬，带领我和余惠同志到左江地区布置检查工作，为龙州起义和成立红八军作准备。我们第一天到了田阳，第二天在路上碰到了李明瑞和许进同志。许进同志原名许甦魂，我们在南洋时认识，我一九二五年初回国，他一九二六年回国出席国民党“二大”，并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

员。我们在仰光分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这次久别重逢，非常高兴，彼此紧紧握着手，只是问好，谁也不敢叫名字，因为我们都知道对方可能改了名字。待小平同志和李明瑞去单独谈话时，他告诉我，他已改名叫许进。我也告诉他，我改名为袁任远（原名袁明濂）。小平同志和李明瑞两人谈了一会，便决定一同返回百色，这次龙州之行没能实现。在百色，经小平、云逸同志做工作，李明瑞参加了革命，随即转回龙州。以后，李明瑞同志担任了红七军、红八军的总指挥。十二月初，小平同志又率何世昌等同志去龙州，部署龙州起义，然后由龙州经越南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

这时，起义的准备工作加紧了。首先是改编部队，整个部队编为三个纵队：原警备第四大队编为一纵队，纵队司令李谦，政治部主任沈静斋；原机关枪营、特务营和黄治峰、阮殿煊同志领导的思林、奉仪、恩隆等县的地方武装编为二纵队，纵队司令符斌，后为冯达飞，政治部主任袁任远；原韦拔群同志领导的东兰、凤山一带地方武装编为三纵队，纵队司令韦拔群，政治部主任李朴。教导总队的干部和学员都分配到三个纵队，有的担任基层领导。这个决定，当时没有公开宣布。其次，有关起义的一些具体工作，也在加紧进行。我和余惠同志参加政治工作方面的准备工作，主要是起草起义的布告、告群众书和标语口号等。我记得还发了一个起义宣言，通电全国。此外，我们

还翻印了党的“六大”的政治决议案等文件。这些准备工作是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只有少数几个人参加。由于人少，我们亲自抄写。翻印的“六大”政治决议案，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我抄写的。为了严守秘密，我们找了一家印刷铺，将石印机搬到政治部来印刷，几名工人也暂时住在机关宿舍里。军事方面的准备工作，由另外几个同志负责，主要是准备军旗、军服，刻制各种印章以及胸章、臂章等。这些具体工作完成后，在起义前几天，我们就广泛开展起义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并对部队进行有关起义的教育。

起义的前一天晚上，在百色，我们将警备第五大队第五营（该营在右江）营长扣留，将县长、禁烟局长也监禁起来。向商会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十一日成立，要他们转告商人不要惊慌，照常营业，并缴出枪支。商会存枪六十支立即交出了，各商号的私枪也交出二十余支，县公署、禁烟局、公安局也交出百余支枪。

十二月十一日，正是广州起义两周年的日子，我们正式宣布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大家戴着红五星的帽子，颈上系着红布领带来参加庆祝大会，情绪十分热烈。庆祝大会分两地召开，一部分在百色，一部分在平马。在百色，由参谋长龚鹤村主持大会，到会的群众有三千多人。会上宣布了红七军的政纲以及红七军领导机构的组成：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政治委

员邓小平，参谋长龚鹤村，政治部主任陈豪人。会毕，在城内游行一周，沿途高呼口号，有的同志嗓子都喊得嘶哑了。同一天，在平马召开右江工农兵代表会议，张云逸同志专程由百色赶到平马参加大会。会议选举成立了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由雷经天同志任主席。

红七军成立后，总的领导机关是红七军前敌委员会，中央指定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李谦、韦拔群、雷经天、何世昌七人为前委委员，邓小平为书记，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三人为常委。各纵队的党委书记由政治部主任担任。军中各连均有党的支部。

一九三〇年二月一日，又在龙州宣布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俞作豫同志任军长，邓小平同志兼政委，何世昌同志任政治部主任。红八军辖两个纵队，一纵队司令何家荣，政治部主任潘恩文；二纵队司令宛旦平。全军约二千多人。

## 百色保卫战

百色的革命风暴，席卷了右江地区，严重地威胁着南宁，敌人惶恐不安，千方百计要消灭我们。当时，摆在红七军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面前的迫切任务是：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肃清根据地周围的地主武装，建立地方各级政权，巩固革命根据地。由于小平同志已去上海向

中央汇报工作，前委的工作便由陈豪人负责。这时，前委对建设根据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把中心工作放在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上面。

百色起义后不久，适粤桂战争爆发，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与张发奎联合攻粤，桂系主力全部开赴前线，只有吕焕炎部留守广西玉林、贵县至南宁一线，南宁空虚。前委认为攻打南宁是极有把握的，遂决定攻打南宁。陈豪人和张云逸同志率我军主力集结在平马（现名田东）、田阳一带，准备在红八军成立后，会师进攻南宁。当时，百色只有军部和军直属队留守，有教导队、特务连、重机枪营（有几十挺重机枪，正在修理），炮兵连，共约五百人。

这时，百色西部地区的几股地主武装，约二千人，乘我红七军主力不在，百色空虚，一天拂晓突然袭击百色。敌人分三路进犯，已临近城边时，我们才发现。由于敌人多是本地人，道路熟悉，有一股敌人已攻进东关，在街上大肆抢劫。我们发现后，仓促应战。为了保卫军部，保卫百色，我们把司令部、政治部的干部集中起来，干部带头上阵，坚决打退敌人的进犯。龚鹤村带领一部分干部和战士负责打东路敌人，我负责西路，罗小彦负责北路，还有一部分同志在城内搜索敌人。我带领政治部的十几名干部和一个排，直奔西门。当时，敌人已逼近城边，我们立即纵身从城墙上跳下去（因女儿墙已倒塌，城墙不

高)，向敌人猛冲，很快将敌人打垮。我们又追了四、五里，因沿途没有搜索，怕有埋伏，就撤回城里。这次战斗，三路全胜，我军伤亡很小，只罗小彦同志负轻伤。敌人退过河以后，就不再退了，伺机反扑。于是我们就用大炮轰击，迫使敌人逃到山里。百色一仗，敌众我寡，我们所以能以少胜多，因为敌人是乌合之众，他们入城后，到处抢劫，队伍散乱；而我们的队伍是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特别是党员干部带头上阵，真正做到了冲锋在前，发挥了模范作用。百色战斗后，龚鹤村去平马，准备攻打南宁。军部估计敌人还会卷土重来，遂从二纵队调来一个营，驻守百色，准备打击来犯之敌，保卫根据地。

一九三〇年一月，红七军主力开始向右江下游的果德（现改为平果）、隆安一带移动。这时，桂系军阀已得知我军准备攻打南宁，遂从前线开回四个团的兵力向右江进犯。二月初，我军在隆安与桂军接触，我先头部队只有一个营，寡不敌众。以后主力赶到，在隆安外围与敌展开猛烈战斗。经过三天的激战，敌人的伤亡虽然比我们大，我们的伤亡也不小，沈静斋同志牺牲了，李谦、阎伯衡、王展、何莽等同志负伤。我军遂撤出隆安，退向平马。敌军一路尾追，我军又放弃平马，在亭泗与敌接触，双方均有损失，我军遂退到东兰。

当时我们留守百色，经常和军部保持联系。后来，一连几天电话不通，了解不到前线的情况，我们十分焦急。曾

派侦察人员前去探听消息，因田阳一带被土匪占领，不能通过。我们分析主力部队可能已经撤出平马，但撤到哪里不清楚。如撤向百色，我们固守百色就没有问题；如撤向东兰、凤山，我们只有一个营的兵力，敌人来犯，部队可以冲出去，但物资会全部损失。在这紧要关头，需要我们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采取果断的措施。由于其他领导同志都不在，只有我和符斌同志负责，深感责任重大。我们经过反复分析研究，为了保证全军的军需物资不受损失，决定放弃百色。我们连夜动员，做好撤出百色的准备工作。第二天，我们雇用了五十多匹骡子，带着全部物资，安全撤出百色。在我们撤出的当天下午，敌人就进城了。我们经过凌云、凤山到达东兰的武篆。军部已先我数日到达，我们胜利会师了。由于我们采取了果断的行动，及时撤出百色，保住了辎重，使部队得到补充。我们还带来十万小洋（约合七、八万银元），解决了部队的经费，全军上下都非常高兴。

## 在苗山播下革命火种

我们到武篆与主力会合后，休整了十余日。但是，大批人马常驻根据地，给养问题解决不了，再回右江已不可能，只有向外发展才能解决困难。当时，东北方向敌人力量薄弱。因此，前委决定红七军主力向黔桂边界发展，开

展游击战争；第三纵队仍留在东兰、凤山，坚持根据地的斗争。

一九三〇年三月，军部率一、二纵队东渡红河，向河池进军。河池只有少数地方武装驻守，敌人听说我主力部队到达，不战而逃。我军占领河池后，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宣传工作。四月初，我军从河池出发，占领了怀远，筹到几万银元，随即向思恩（今环江县）进发。途中遭到桂军截击，分成两路。两天后，到了贵州的荔波，我军才又汇合。

这时，部队已进入黔桂交界的苗山，这里是苗族聚居的区域。由于封建军阀和国民党的长期压榨、歧视，苗族同胞过着极其落后贫困的生活。这也造成了苗、汉之间的严重对立。当我军进入苗山时，苗族同胞紧闭寨门，不准我们进寨。他们对红军不了解，以为汉人的军队都是压迫他们的。我们向他们宣传，他们也不听。张云逸同志亲自去叫寨门，仍不开。后来军部给苗族头人送了几支步枪，又经过耐心地工作，苗族同胞才打开寨门。部队进寨后，通过会讲苗语的人宣传我们的主张，宣传红军是劳动人民的队伍，是打国民党反动派的。另外，我们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不歧视少数民族，遵守红军的纪律，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了苗族同胞的信任。他们看到红军确实和国民党军队不同以后，我们通过苗族区域就很顺利了，有苗族同胞给我们带路，每到一个寨子，为我们叫寨门，替我

们作宣传。这次进军苗山，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在苗山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 榕江大捷

四月底，我军走出苗山，直奔榕江（古州）。榕江是黔东南一个比较大的城市，有两万人口，商业也比较发达。城里贮存着许多武器、弹药以及军需物资，这里是军阀王家烈的后方供应地。当时，贵州军阀与湖南军阀为了争夺地盘正在湘黔边境混战，王家烈把全部兵力都开到前线去了，榕江空虚，只有黔军第二师副师长史勋远带领五六百人和数百名地方保安队守备。我们得到这一消息后，前委决定出敌不意，突然袭击榕江。我先头部队到达榕江城外便向敌人猛扑过去，城外守敌猝不及防，退到城里。我军乘敌不备，向城里敌军发起猛攻，傍晚我军占领榕江。这次战斗消灭敌军大部，缴获步枪六百支，子弹十余万发以及其它军需物资，还缴获了几门大炮和一座无线电台。这是我们第一次缴获电台。此外，我们在榕江还筹集了十万元的经费。这次战斗的胜利，解决了我军物资上的许多困难，使部队在武器装备上得到了补充；同时也锻炼了部队，振奋了斗志。对俘虏，我们实行优待政策。经教育后，愿意留下当红军的，我们欢迎，不愿意留下的，我们也不勉强。由于我们对俘虏实行了正确的政策，对贵州

的敌军影响很大，敌军中不少下级军官对进攻红军表示动摇。后来，听说王家烈始终不愿意和我军接触，这也是原因之一。

我们攻占榕江城的第二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军政治部在一个小学的操场上召开了纪念“五一”的群众大会。到会的群众很多。我们向到会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宣传中国无产阶级要与农民联合起来进行革命斗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工农民主政府。到会的群众第一次听到这些革命道理。

王家烈在前方听说榕江失守，急如星火，连夜从湖南调军队回援。这时，我军在榕江已经休整了三天。五月四日，前委决定分水、陆两路撤出榕江，经从江到达广西边界的富禄镇。这时得知王家烈的四个团由北面追来，我军遂连夜渡过都江，经罗城又回到了河池。

## 回 师 右 江

邓小平同志到中央汇报工作后，于一九三〇年二月七日回到龙州。根据中央的指示，他立即通知红七军停止进攻南宁。但是，很快就得到消息说，红七军在隆安战斗失利，已退出右江，且桂军将以重兵进犯龙州。根据龙州的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红八军难以固守，敌来必退。小平同志遂决定红八军适当安排龙州附近的群众工作后，速向

右江转移，与红七军会合。为了与红七军取得联络，小平同志率红八军一纵队向靖西进攻，准备在这个地区建立根据地。但打了数日，未能攻克，遂带一个连改道到达右江。因红七军主力此时已离开右江，去黔桂边界开展游击战争去了，右江沿岸已被敌人占领，小平同志遂又转向东兰的武篆。在东兰，他与韦拔群等同志一起进行了土地革命的调查和试点工作。一九三〇年五月，以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名义，颁布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两个重要文件。

我红七军一、二纵队回到河池时，小平同志到东兰已一个多月了。当他得知我们到达河池的消息后，立即赶来与我们汇合。小平同志到河池后，召集了一个党员大会，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并讨论了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根据中央的指示和红七军所面临的形势，会议认为：关于红七军向湘粤边界发展与朱毛红军汇合问题，因湖南有敌重兵驻守，不易通过，暂不宜东进；右江群众自红七军离开后，有失败情绪，为了巩固和发展右江革命根据地，需要红七军返回一个时期；红七军返回右江后，人员可以得到补充，同时可以解决经济问题和服装问题。

这时，蒋桂矛盾日益加剧，粤军余汉谋部沿西江向南宁进逼，云南的滇军也向广西出兵，桂系驻守右江的主力部队遂撤回南宁，右江空虚。我们得到这一消息后，马上回师右江，打百色，攻平马。在百色战斗中消灭敌军五、

六百人。到一九三〇年六月，我们又恢复了右江根据地。

我们收复百色仅十日，适滇军一个师经右江攻南宁，要假道百色、平马。滇军攻桂，是军阀之间的混战，对我们在右江的发展是有利的，我军遂退出百色等地，到平马附近。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在滇军通过后，我军决定打其后卫，拦截辎重，结果滇军调回头来在果化与我激战五日之久。敌军损失很大，团长死、伤二人，士兵伤亡五、六百人，我军伤亡也不小。最后，双方都撤出了战斗。

滇军主力开走后，仍留下一部分兵力继续占领百色，保护他们的交通线，我军遂在平马、田州、思林一带开展工作。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一方面整训部队，建立地方武装，组织县、区游击队；另一方面，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小平同志亲自到平马、田州一带做地方工作。我们这次回到右江三个半月之久，右江革命根据地又得到了恢复，红军也得了休整和补充。

## 河 池 整 编

我们返回右江后，原计划停留一个短时期，然后迅速向外发展。但因经济问题未解决，同时秋收快到了，如果红七军马上离开，农民分得的土地以及快要成熟的庄稼必然被地主抢去，影响农民的积极性。为了维护群众的利益，保护秋收，红七军决定在一九三〇年十一日出发。月

但在出发的前一日，南方区代表邓拔奇（即邓岗）赶到平马，传达中央的指示。十月二日召开前委会议，邓拔奇传达了六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和中央对红七军的指示。中央指示红七军离开右江地区，向东发展，打下柳州、桂林，在小北江建立根据地，阻止两广军阀不得有一兵一卒向北增援，保证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和几省的首先胜利，最后打下广州，完成南中国的革命。当时我已调政治部总务科工作，中央的这个指示是用药水密写在一块白布上，是我用药水洗出来的。这个指示是立三路线统治中央时给红七军的。虽然在一九三〇年九月下旬中央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就已经纠正了立三路线，并停止执行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各地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但由于当时党中央尚在上海，白色恐怖严重，中央与各地的交通联络十分困难，文件不能及时下达，所以，我们还不知道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前委根据中央六月指示的精神，决定整编部队，并把县、区的地方武装编入主力红军。同时，对部队中的女同志进行疏散，本地人由当地组织进行安置；外省来的不好在当地安置，就介绍到香港或到上海去找中央。除此之外，我们还做了一些长途行军的准备工作。

十月上旬，红七军在向河池进军途中，与红八军的第一纵队会合。第一纵队在龙州起义后，曾随小平同志去攻打靖西。后来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又回援龙州，但龙州已

失守，红八军受挫。第一纵队余部在袁振武同志率领下，艰苦奋斗，经云、贵边境到达广西凌云县的向阳。这时，才与我红七军会合，遂编入红七军。我们到达河池后，召开了红七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会议传达了中央六月指示，改选了前委。前委委员有：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李谦、袁振武、许进、李朝纲、黄一平。候补委员有：龚鹤村、胡鹤林、杨英。陈豪人任书记。会后，前委即着手整编部队，取消了纵队，改为三个师，干部也作了调整：红七军总指挥李明瑞，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小平，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参谋长龚鹤村，经理处长叶季壮，政治部总务处长袁任远，教导大队队长阎伯衡，政委袁任远（兼）。十九师师长龚鹤村（兼），政委邓小平（兼），政治部主任许进，辖五十五团、五十六团。二十师师长李谦，政委陈豪人（兼），政治部主任李朴，辖五十八团、五十九团。二十一师师长韦拔群，政委陈洪涛，该师留在右江，坚持斗争。经过整编，全军（不包括二十一师）共七千多人。整编大会后，军首长检阅了部队。随后，即在部队中进行北上的动员，口号是：“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

## 转 战 桂 黔 湘

部队整编后即从河池出发，准备经庆远向柳州前进。

到怀远时和敌人有一个小的接触，即占领了怀远。后发现庆远有敌重兵防堵，我军立即改道，从罗城北面走。在罗城附近的四把，同广西军队遭遇，打了一个恶仗。十月下旬，我军到达长安（现名融安）。长安是融江上游的一个商业中心，是一个大镇，有三、四万人口。我军决定打长安，筹点款。其时，长安已有敌重兵驻守，白崇禧又从柳州率一个师来增援，斩断浮桥，背水死守。我军打了五天没有攻下，遂向北撤退，到富禄渡江，向古宜前进。原拟经古宜到桂林，后因古宜有敌军教导师驻守，无法过河，乃改经湖南的绥宁。十一月初，我军占领了绥宁。由于敌人的威逼和反动宣传，老百姓全跑了，绥宁变成了一座空城，我们只住了一夜，便向武岗进军。

十一月七日到达武岗城下。我们原来不打算攻城，后听说武岗只有一个保安团驻守，仅六、七百人，为了解决经济和服装问题，乃决定攻城。武岗县的城墙完好，又有坚固工事，我们连攻四个日夜，未能破城，而且伤亡几百人，五十五团团长何莽同志在攻城时牺牲。第五天，湖南军阀何键急调五个团来增援，我军遂放弃围攻，以急行军转向南进，经新宁，过资源，突然袭击桂北的全州。敌人没有料到我军来得这么快，毫无防备，连城门都未关，我们很顺利地进了城。

红七军自从离开根据地后，由于长期行军和频繁的战斗（几乎天天有战斗，没有三天以上的休息），战士颇感

疲劳，遂决定在全州休息三天。在全州开会时，广大干部、战士意见很大，议论纷纷。这时，邓拔奇和陈豪人借口向中央汇报工作，离开了红七军。陈豪人走后，由邓小平同志任前委书记，主持前委的工作。前委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将四个团改为三个团，并尽可能把非战斗人员变为战斗人员，以充实下层。同时，对伤兵也作了适当安置。我们在全州筹集了几万块钱，但是衣服、布匹始终没有得到补充和解决。不久，白崇禧亲自率一个师由桂林向全州进攻，我军遂撤出全州，向东南方向进发，经永安关到达湖南的道县。道县除少数贫民没有逃跑外，商人都跑光了，无法筹款。我军在道县住了两天，就向江华进军。

从道县到江华的百里行军，正值隆冬腊月，大雪纷飞，寒风刺骨。战士穿的还是从广西出发时的单衣、单裤。为了御寒，有的战士把打土豪时分的棉衣穿上了，不管是男的衣服，还是女的衣服，也不管是红的，还是绿的，凡是可御寒的都穿上了。有的战士因为没有御寒的衣服而牺牲了。到江华后，前委决定休息两天，为部队补充衣物，突击治疗冻伤。同时，召开了营以上的干部会议，小平同志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当时，我们虽然不知道什么立三路线，但是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离开根据地盲目地攻打敌人重兵设防的城市是不行的。红七军自从离开右江根据地后，经过三个月的浴血奋战，没有攻克一座较

大的城市，而且部队伤亡很大，如果再这样干下去，部队就有拖垮的危险。

江华会议后，部队进行了轻装，将大炮掩埋了。在江华，我们征用了大商户的布匹、棉花，还购买了一些衣物、鞋袜等，分发给战士。部队离开江华时，前卫部队出发不久，直属部队刚刚过河，追击的敌人就进了城。这时城内枪声四起，河对面各高地的敌人也同时向我们开火，我们受了一些损失。

红七军离开江华后，又回到了广西的贺县。这里是桂湘粤三省交界的地方，离敌人统治的中心城市较远，又是山地，交通不便，便于我们休整。原计划在贺县的桂岭多休息一个时期，但是我们到桂岭后发现这一带地主豪绅力量很强，给养也困难，不能久住，便决心到小北江去。在桂岭住了四天，部队又进行了一次整编。红七军从河池出发时是七千多人，现在只剩下四千多人，部队减员很大。这次整编，取消了师的建制，缩编为两个团，即五十五团、五十八团。以原来师的主要负责同志任团长，原来的团长任营长，营长任连长。这时，我由军政治部回到五十五团一营任政委。通过这次整编和教育，部队得到了休整，战士的斗志又开始旺盛了。与此同时，战士的冬服也准备好了。

## 梅花村失利

从贺县桂岭出发，走了三天，到达广东的连州境内。我们从敌人的报纸上看到北江的粤军力量较弱，只有邓挥的一个团布防在曲江、英德一带，故决定向北江、湖南宜章一带发展。这一带多是山地，过去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红四军二十九团曾在这里活动过，有群众基础。龚鹤村原在红四军工作，据他说，二十九团失败时，散失在这里的红军士兵不少，我们到这里，部队可以得到补充。故决定不打连州，继续东进。行至星子圩（连州的一个较大的市镇，离连州八十里），据侦察报告，湘军两个团昨晚到达黄沙埠（距星子圩二十里），我军遂又决定转向连州。我军到达连州，敌人撤进城里，我们占领了城外的街道，采取围而不打的办法。后来，连州商会答应筹款三万元，我们也就解围了。因筹款问题在连州逗留了几天，随即向乳源的梅花村进发。

梅花村是一个山区，四面高山，地形险要。我们到达后，曾在这一带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组织游击队。几天的时间就武十装了几个农民。这时，粤军邓挥率部追来。据侦察员报告，敌人只有一个团。我们决定，消灭邓挥的部队。战斗一开始就很激烈，从中午一直打到傍晚。后来我们发现敌人不是一个团，还

有湘军一个团、警卫队一个团，共三个团。敌众我寡，敌人火力也比我们强，我军伤亡很大，于是，不得不撤出战斗。这次战斗，很多重要干部伤亡，对红七军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李谦、章健两同志牺牲，龚鹤村、袁振武、李显同志负伤。我所在的这个营，营长牺牲了，四个连长牺牲了两个、负伤两个，其中有一个还是重伤，排长伤亡三分之二，战士死伤一半。我们撤出梅花村时，敌三个团一直尾追我们。我们决心甩掉敌人，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中央红军汇合。

## 进军湘赣

我军退至乐昌后，决定从城南二十里的地方过乐昌河（即北江的上游）。本宜拂晓过河，因为刚刚撤出战斗，人困马乏，未能实现。到上午十时 前卫团才到达河边，军部在两小时后才到。由于船只少，部队渡河的速度很慢。小平和李明瑞同志率五十五团先过河，我们一营是在二营之后过河的。待后卫部队渡河时，粤军从乐昌、韶关两处乘汽车赶到，占领了渡口，我后卫团只过了一个连，就被截断了。张云逸同志率领军直属队和五十八团未能过河，与我们失去了联系。

五十五团渡乐昌河后，经仁化到达江西的崇义。在崇义，我们一面休整，一面开展群众工作，并派人出

去打听五十八团的消息。不久，我们就和赣南行委一路分委取得了联系。得知在离崇义七十里的杰坝有一支百余人的游击队，并建立了根据地，我们遂把伤病员安置到杰坝休养。当时，我们曾企图以崇义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创建工农民主政权。我们做了二十多天的工作，发现这里党和群众工作的基础太差，干部又缺乏，仅建立了几个区、乡的政权。根据崇义的情况，如果敌人重兵来犯，红七军只有一个团，很难坚持。后来得到消息，敌人准备进攻，我们遂研究了下一步行动方案。据赣南行委同志介绍，红三十五军曾在信丰建立过工农民主政权，红三十五军走后，根据地遭到破坏。如果红七军去信丰，那里有群众基础，可以使当地的政权得到巩固，并且可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联系起来。但是，崇义东面的上犹县，敌人驻有一个师的兵力，不易通过，而且赣江上游一带，敌人防范较严，渡江有困难，只有北上井岗山，沿途敌人力量薄弱，较易通过。

我们到崇义后，即取消了前委，改为团委，小平同志任书记，受赣南特委领导。小平同志在崇义把工作安排好，经团委决定，去中央汇报工作，并了解“富田事变”的情况。春节前，他带几个同志到杰坝与赣南特委开会，研究开展地方工作的问题，同时慰劳红七军的伤病员。随后，即去中央。小平同志走后，由余惠同志任书记，成员有许卓、李明瑞、袁任远和张翼，我们把它叫作小前委。

二月中旬，敌人从三面向崇义进攻，我们遂按原定计划向北撤到营前，然后到达遂川的大汾。这时，我们得知永新是湘赣根据地的中心，遂向永新前进。

张云逸同志率领五十八团摆脱敌人后，沿河北上，避开乐昌县，到达坪石。在坪石渡过乐昌河，经汝城、桂东，于三月中旬在湖南酃县的十都圩附近与王震同志率领的湘赣独立第一师的第三团会合了。然后两支部队南下资兴、汝城，寻找五十五团。由于敌人向湘赣进攻，两支部队遂北上。在茶陵打了一个胜仗，歼敌三百多人，还活捉了敌人的一个团长。以后就转到永新的天河，进行休整。

我们沿途打听五十八团的消息。当我们路经泰和县境时，听说天河来了红军，遂向天河前进。一九三一年三月下旬，五十五团与五十八团终于在天河会合了。经过整训，部队士气大振，在地方上又补充了一部分新战士，然后又回到永新。四月底在永新召开了红七军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总结了转战桂黔粤湘等省的经验教训。这次大会又选举了新的前委，前委成员有张云逸、李明瑞、许卓、许进、叶季壮、余惠、袁任远等。

### 三军联合歼敌

一九三一年四月，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反革命“围剿”。总前委决定成立河西总指挥部，统

一指挥红七军、红二十军、湘赣独立一师的行动。其时，滕代远同志正率新兵数百人由湘鄂赣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途经永新，由于蒋介石调集了二十万军队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一时无法返回，遂参加了河西总指挥部的领导。李明瑞同志任总指挥，滕代远同志任政委。河西红军的任务是牵制敌人，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的斗争。

根据总指挥部的决定，我军集中力量攻打安福之敌。适驻守安福的敌军韩德勤五十二师的一个旅向我进攻，在廖塘桥与我军遭遇。红七军打右翼，独立一师打左翼，红二十军为总预备队。这是三军会合后，第一次联合作战，士气很高。战斗打响后，我军动作快，冲得猛，敌人的迫击炮还未架好，我军就冲上去了，敌军大败。这一仗，消灭韩德勤一个团，俘敌数百人，缴枪约千支。敌军残部逃回安福。这是三军会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安福大捷后，接着打宜春，由于敌人设防严密，城墙坚固，不易攻占，我军遂经莲花，攻打茶陵、攸县、安仁、酃县，以后又打下遂川。我军连克五县，所向无敌，军威大振，给敌人很大震动。

蒋介石在第二次反革命“围剿”被粉碎之后，仅仅隔了一个月的时间，七月又发动了第三次反革命“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这次反革命“围剿”，中央决定将红七军、红二十军调往中央革命根据地。从此以后，红七军就与中央红军会合，编入红三军团，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红七

军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在湘赣根据地三个多月，行动积极，英勇顽强，对保卫湘赣根据地及配合中央红军作战，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我因病未能随红七军去中央革命根据地，留在大汾、草汾、井冈山的大院一带休养。病愈后，就参加了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 从第五次反“围剿”到 遵义会议\*

陈 伯 钧

第四次反“围剿”战役后，红军有很大的发展。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次战役以后，五月来了一个猛烈的“扩红”运动，红军增加了四、五万人。把部队整编了一下，将老部队改编成大师，又成立了一些新的师团。敌人失败后，也得到一个深刻的教训，知道这样“长驱直进，分进合击”还是奈何我们不得。所以敌人改变战略，训练部队，加强侦察活动，训练登峰队，搞了一些山地作战的东西，成立了庐山军官训练团，总的战略叫做“堡垒政策”。第五次总“围剿”，包括政治“围剿”、经济“围剿”、心理“围剿”、文化“围剿”。不但这样对付我们，而且还这样对付他自己区域里反对他的人。

---

\* 本文系陈伯钧同志所作的关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历史情况报告的一部分。报告时间是一九五五年春天。这次发表前曾经军事科学院核对史实。本文标题是编者加的。

在第四次反“围剿”战役胜利后，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开始前，我们还有一些行动：一方面在北线继续坚持斗争；另一方面又组织了东方军，打了连城附近十九路军的老虎师长区寿年这个师，接着打洋口、延平，一直打到福建水口附近，威逼福州。那时十九路军感到威胁很大，于是陈铭枢就写信给蔡廷锴说：与红军作战，若战而胜，牺牲必大；若战而不胜更不堪设想。因此他主张与我停战，联合我们反蒋，和我们讲条件。以后就搞什么生产人民党，成立福建人民政府。这时候北线敌主力蒋介石的部队正向苏区边境集结，待机进攻，于是三军团就从福建撤回来了。五军团去接应，开到顺昌后也撤回来了。这样的有利条件我们没有利用。

第五次反“围剿”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从洵口一战到团村，这是第一段。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我们由福建转回来，在洵口打了一个遭遇战，把敌人第六师十八旅消灭了，黎川敌三十六师增援以后，没有打出什么名堂。本来这一仗打胜了，照老规矩就应该把部队集结在附近，看敌人下一步怎么办，我们再行动。因为我们是采取内线作战的办法，集中兵力打它一路，各个歼敌。但是没有那样办，而是想要把黎川搞过来，到白区去打硝石，想借此叫敌人撤出黎川。这时敌人战法就变了，打到一个地方就到处筑工事。十三师到资溪桥袭击了一下，敌人根本不理。总想到外线去求战，求战不得还要

回来。这就是毛主席说的，开脚一步就走错了。后来敌人从黎川向前推进，本来那时敌人并不是“堡垒主义，向前推进”，因为黎川到团村还有四十里路远，他们是要“逐段跃进”的。这一仗本来很好打，但是没有打好。因为只有三军团的四师、五师，五军团的十三师以及九军团的第三师和第三十四师，共五个师，兵力不足。刘伯承同志曾与李德两个人争论，刘建议一军团是否可东调，但是话未说完，李德就大发脾气。很明显，当时东边是三军团的四师和五师担任突击，十三师除一部分参加突击外，主力担任掩护，西边只有第三师担任突击，力量不雄厚。结果东面虽把敌人突垮了，西边却突击不上去。敌人在山上，我们就去攻山，战术上也有缺点，猬集一处，队伍未展开，敌人一摔手榴弹，我们伤亡很大，最后只好撤退。这一仗不但没有打好，而且还牺牲了四师师长张锡龙、三师师长吴高群。如果当时东西两面一、三军团集中，组成两个有力的拳头，东西夹击，就可以把敌人进攻的一部约三个多师消灭。以后敌人又进攻德胜关，因我军的英勇作战，终于把敌人阻止住了。

第二阶段，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蒋介石非常恐慌，在北线加紧构筑碉堡，令其主力向闽北前进。先向福建进军，把苏区的北边暂时守起来。其主力沿光泽、邵武、顺昌前进，每师距离四十里。这是我们歼敌的好机会。可是我们没有出击，这是很失策的。这

时教条主义者有些歪道理，他们说什么：福建的敌人比蒋介石还危险……。我们在山上望了两个月，蒋（光鼐）、蔡（廷锴）和我们联络，我们也不帮他们的忙，以后他们那里就发生了问题，十九路军没有几个月就完全垮了。

所以，这一点在政治上是很大的错误，就是军事上也很不应该。就是不帮助十九路军，能把蒋介石的主力打垮也好。结果蹲在那里，非常机械，非常被动。本来十九路军和我们讲联合，我们日用百货、盐巴也还不困难，还有一点办法。十九路军一垮，蒋鼎文就到福建当总司令，我们就四面被围了，一点办法也没有。这完全是机会主义，完全不懂得辩证法的关系。

自五次战役开始到福建事变这一阶段，不但没有搞出什么名堂，反而将主力分散使用，两个拳头打人，甚至往堡垒地域里钻。福建事变发生时，把一军团拉到神岗、党口去进攻堡垒地域，最后敌人形成四面围攻，又把一军团拉到福建，打了一个温坊战斗，聊以解嘲自慰。一个月就行了二十八天的军，真是劳累已极，使主力疲于奔命。

第三阶段，就是广昌战役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就是拼命主义，是拼命主义的典型例子。因为苏区北线的敌人是以占领广昌来号召其他地区的敌人向我们实行总的进攻，因此教条主义者也就以广昌作为苏区的太门来拼命，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当敌人战略上的合围形成以后，就开始向广昌进攻，而这些外行的军事家——教条主

义者，也就在这个地方搞拼命主义，以主力对主力。敌人有十一个师，由罗卓英指挥，正面十华里，沿着盱江两岸的丘陵地带构筑碉堡，步步向前推进。我们则集中一、三、五、九军团的九个师，预先也在这一带地区筑了很多碉堡，以堡垒对堡垒，准备拼命决战。敌人在狭小的正面上以重兵搞我们，我们则对敌实行短促突击。敌人在盱江左岸前进，碰到我们短促突击时，马上停止，以一个纵队在原地作工事，另两个纵队则沿河上已架之桥梁，转移到右岸前进；等到在右岸又遇我短促突击时，又转到左岸前进。如此反复辗转前进。所以刘伯承同志给它起了一个名字，不叫打仗，叫做“滚仗”。这样由甘竹到广昌四十华里，整整“滚”了十八天，敌人有时每天前进四华里，我们没有搞到什么东西。那时李德、博古都来了，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指手划脚，搞了十八天，最后还是把广昌失掉了。

这就是说，这些教条主义者认为：你们说我不行，我就是耍搞一下给你们看看。九个师对敌人十一个师，敌人有高武器——飞机和远武器——炮兵，我们这样的同敌人拼命，敌人是最欢迎的。结果我们只有撤退，最后还是失掉了苏区的大门——广昌。

第四阶段，就是广昌战役之后的分兵把口和高度的阵地抗击战。自广昌撤退后就是分兵把口，一路是三军团第六师和红十二一师抗击周（浑元）纵队，守老营盘、高兴圩之

线；一路是八军团，抗击薛(岳)纵队，守古龙岗；一路是五军团，抗击霍守义部，守头陂以南地区；还有一路是三军团，守广昌通驿前大道，抗击汤恩伯、樊崧甫两纵队。而一军团则转移到东线(福建)去了。分兵把口，也是阵地战的最高峰，其中以高虎脑、万年亭战斗为代表。广昌战役后，敌人深入了苏区腹地，就一步一步推进，开始用飞机轰炸，以后打炮，以后是机关枪掩护步兵冲锋，完全是正规的一套。我们也是做工事、筑碉堡、安鹿寨、埋地雷，再就是等敌人进到近距离时以手榴弹、步枪、机关枪一齐开火，以及用小部队从翼侧突击。敌人欺侮我们没有重兵器，就是远距离冲锋时，也采用营方队的密集队形；而我们的手榴弹，各种枪炮只能在一定的距离上开火，这就完全要靠干部战士的英勇善战。敌人的汤纵队在高虎脑一仗伤亡四千多，我们自己也损失不小，班以上的老战士也剩不多了。第五次反“围剿”，我军连续作战一年之久，就是在阵地上过日子，在房子里睡觉的时间很少，毫无修整。连以下的干部差不多三个月要全部换一次，以后完全靠干部打，补充上来的新兵连训练都来不及。所以，虽然对敌人有很大的杀伤，但我军自己的元气也受到相当损伤。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法在战略上说是很盲目的，而又毫无自信地自欺欺人地要与敌人拼消耗，想从此来转变敌我形势。正如毛主席说：“这是叫花子和龙王比宝”。我们那几个制造枪弹的简陋工厂，哪里能抵得上敌人的汉

阳兵工厂、金陵兵工厂呢？何况敌人还有国际帝国主义的帮助。

高虎脑、万年亭战斗之后，退到了驿前。三军团四、五师加上五军团三十四师，在一起作战。过去敌人总是先来飞机，以后打炮，搞七、八个钟头后，步兵才正式攻击。在驿前作战，我们自己就上了敌人的当。我们三个师，右边是四师，中间五师，左边三十四师，都是以一个团占领阵地，两个团在后面。我们的阵地构筑得很好，一道、二道、三道，也算是一个防御地带，有的工事做得很不错，文化学习、休息、隐蔽、进出道路等都有，还有隐蔽的火力点。那时候就是鼻子对鼻子，敌人和我们的距离很近，而且工事以外还有侦察部队，所以我们经常和他们打交道，我们的人抓他们的人，他们的人也抓我们的人。敌人的炮兵阵地只离我们有千把米，完全暴露，每天进行试射，我们对之毫无办法；但我们坚守，敌人也没有办法。结果敌人改变了高虎脑、万年亭的打法。清晨，飞机先从广昌起飞，飞机一响，就是信号，炮兵就打。炮兵一打，于上半夜就运动到我们的鹿寨前面的部队，在飞机和炮兵的掩护下，立即投入冲锋。这样一来，我们的短促突击根本就用不上，部队还没出得去，就被敌人火力封锁住了；第二梯队还没有上来，阵地就被敌人突破了。敌人突破哪个地方，就占领哪里，构筑碉堡进行巩固，口子不大，叫做钻隙进攻。这时我们第一线被突破了，第二线来不及组

织防御，接着第二线也被突破了，第三线也跟着被突破了，这一天敌人就前进了十几里。这样一来，我们左右两翼的部队就都向左右转成了侧面阵地，敌人又以另一支部队向我侧面进攻，我们就无法坚持了。驿前战斗证明：我们没有总的预备队是很大的缺点，在敌人突破后就没法应付，结果一下子把三道阵地都丢失了。总之，这种办法都是消极的、呆板的，违背了正确的战略方针，结果不论部队怎样英勇，终于失败。

第五阶段就是西线掩护战。驿前战斗失利后，就变成了西线掩护战。因为北线、东线都被敌人突破了，当时更威胁我们的就是西线。西线就是兴国，那时只有陈毅司令带着地方部队和第六师阻止着周浑元纵队，力量比较单薄。驿前战斗后，五军团十三师就到西线增援第六师。以后一军团在高兴圩想以第二师实行夜间突击，没有成功，就调走了，只剩下五军团在那里与敌人对峙。敌人每打一个地方，就在前面做工事，后面修马路，就象前面一个乌龟壳，后面一条尾巴似的。我们在这里和敌人共对峙了几个月。以后，就退到兴国以南，准备长征。本来在西线掩护战时，就应提出准备长征，但那时没有搞，仍只是提出击破敌人等老一套的办法。

总而言之，第五次反“围剿”，一直打到底也没有痛痛快快打好一仗，所以很失策，完全处于被动。教条主义者的理论就是：“由战斗的胜利开展战役的胜利，由战役

的胜利开展战略的胜利。”这完全是“本末倒置”。我们说：主要是搞好战略指导，在正确的战略指导下，以一定的战役战斗的胜利来完成战略上的任务。即使某一个战役打不好，也无关大局。但是教条主义者根本是外行，根本不是真正的军事家，最多是懂些班排长的战术技术动作。李德这个人狂妄自大到什么程度？他在瑞金和林老等中央同志讲班进攻，讲短促突击，他就是搞图上作业比较熟悉，其实完全是外行、空洞的家伙。

所以，第五次反“围剿”不管在哪里，原来都是可以粉碎敌人的进攻的。第一阶段本来可以粉碎敌人。第二阶段本来也可以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主力，粉碎第五次“围剿”。实在不行，就是当敌人四面合围形成后，我们不和他鼻子顶鼻子，退一步让他，区域还大，也还有回旋余地，可以消灭一路、二路，就是苏区都不行了，没有办法，也还可以跳出去，到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之间的地方打他们。再不行也可以向西边跑，到赣西、湘南、迂回到敌人的侧后，也一样可以打破“围剿”，取得胜利的。总之，这些大的战略眼光，教条主义者都没有，只是在那里毫无办法地挨时间，被动挨打，毫无前途地进行战争。因此，教条主义者在战略战役指导上是傻到极点。敌人反而还聪明些，懂得“竭泽而渔”。第五次反“围剿”，从战术技术来说，过去我们没有打过阵地战，没有搞过对空防御，这次学了一点；但从整个战略指导上来说，是

错误的，开始是冒险，以后是拼命。对部队来说，我们部队发挥了高度的战斗能力，发挥了高度的勇敢精神，我们自己也经过了一些锻炼。如果有正确的战略指导，有正确的军事路线，加上英勇顽强，我们相信是可以搞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的，第五次战役是不会失败的。但由于领导上的错误，我们虽然有那样好的基础，有那样好的部队，有那样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却没有取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结果是被迫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

严格地说，长征是没有什么准备的。按照教条主义者的想法认为是有一点准备的，如长征以前八月七日派六军团（弼时同志带着）从湘赣苏区遂川县横石地区出发，到湖南、贵州与贺龙同志会合，建立湘鄂川根据地。事实上这就是一个先遣部队，利用在与贺龙同志会合的过程中勘察一些路线，搜集些情况，供给些资料，以便中央主力红军长征。此外，长征前也补充了一些新兵，动员了一些人等。长征开始准备由中央苏区撤出，与二、六军团会合，但是结果没有做到，因为有几项最基本的工作没有搞。

首先，在政治上没有准备。在准备工作中没有政治动员，行动完全是秘密的，可以说是军事上的被迫。党内党外都没有深入动员，行动计划只传达到师一级的干部。那

时五军团是由陈云同志（五军团的中央代表）受中央的委托给我们传达的。那样大的行动，没有政治动员就是最大的错误，就没有了精神准备，官兵的积极性就没有办法发挥到最高度，一遇到困难就不但不能克服，反而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倾向。如果早就作了政治动员，各种倾向就会防止和容易纠正。

其次，在军事上准备也极端不够，必要的训练、休息、补充等工作都没有好好地搞。第五次反“围剿”时，我们就是光搞阵地战，不搞运动战，也不打遭遇战。没有运动、进攻、遭遇、抢隘口、抢河川、突破等必要的训练准备。主力也没有得到好好的休息。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退出兴国，十月十七日就走了。在补充工作上，本应该补充主力，但相反的却成立了新的兵团。主力师是四、五千人，而教导师也是五千多人，还有几个新兵团。八军团、九军团都是新的番号，除了第三师以外，其他的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师都是新成立的，不是老部队扩大起来的，干部大都是红军学校的学生，因而战斗力比较软弱。如果一个老的团扩大成为两个团，那就不同了。为什么新的部队战斗力弱呢？就是因为新的部队还没有经过很好锻炼和没有一个历史的传统作风，因而他们走路、吃饭都成问题，更不要说别的了。在大庾北稳下村时，广东敌人出来一个营，就把我们教导师的一个团打散了，跑得两面山上都是。后来八军团在贵州整编时，只剩下一千二百人，

编了一个团给我们。所以，虽然组织了很多新的兵团，但作用并不很大，只有一个作用就是搭起了一个架子。走起路来，一、三军团为左右先锋，八、九军团打接应，后面由五军团担任掩护，中央军委直属队在中间，“坐的‘五个人’抬的‘轿子’”，搭的架子很大，但没有发挥主力的最大作用，新的部队也没有起到作用。

长征时不仅是基本准备工作没有做，而且对敌人的估计也是十分错误的。当时领导上为什么敢于采取这样的方法？就是因为误认西南（广西、贵州、湖南）的敌人装备差，而没有估计到西南敌人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教条主义者在中央苏区作战时，由于遭受到严重的失败，把当面敌人的战斗力夸大了，害怕蒋介石，却轻视西南的部队。这种估计完全是错误的。长征的实践证明：蒋介石的部队倒还好打，红军和他们是老对手了，只要被我一包围，他们就集合缴枪；而西南的部队却不好打，有时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搞不到他们的人和枪。他们也采取游击、袭击的办法搞我们。

由于以上的原因，所以长征开始是搬家式的，以后是退却逃跑式的，不是积极的战略转移。那时不但不把各主力部队扩大，反而把直属队扩大，每一个军团成立后方部，有的有一千副担子，有的有八百副担子，我们的军团就有一千副担子，什么东西都挑上。军委纵队更吓人，约三万人的庞大机关，还要部队掩护。供给部、卫生部人很

多，连一个石印机都要带上。野战医院还以为就在附近苏区打仗，所以就连屎盆、尿盆都带上了。

当时整个部队连新兵、老兵、民夫、担架队加在一起，有七、八万人，其中战斗部队加上直属队还不到一半。这样就没有办法打仗，结果所有的战斗部队都成了掩护部队。一碰到敌人，也不想办法去积极进攻，只是打掩护，只是跑。跑也应该跑得快，在战术上必须脱离敌人，跑到有利的地方，占领阵地，抵御敌人，但没有做到。战略上也要走得痛快，但也没有作到。那时候，如果平均一天走五十里路就可以抢到敌人前面了。因为我们从古陂圩突围的时候，敌人有一个错觉，以为我们会从赣江左岸打吉安，所以周、薛纵队赶快从苏区撤出来，在吉安、永新一直到井冈山一线布了防，并且等了一个礼拜。以后他们发现我们到了湖南，知道不是打吉安，才又把队伍集合起来追我们。如果我们那时一天走五十里路，就能走在敌人前面了。照例说，战役应该选择道路，控制要点，压迫敌人在不利的道路上，我们在有利的道路上。可是恰恰相反，我们在长征中走的是山路小道，敌人走的是大马路。我们沿着五岭山脉在大庾岭、骑田岭、越城岭上转来转去，走得很不痛快，而且是夜行军，一下雨路就相当滑，加上好多笨重的行李，就更困难。曾经有这样的事：一个夜晚从小山这边翻到小山那边，总共不到十里路，坐一下，走两步，行动就是这样迟缓。敌人走大路，我们走小路；敌人走得

快，我们走得慢，所以丧失了很多机会，结果敌人就跑到了我们的前面。长征开始是摆起架子搬家，但碰到敌人一打就拼命退却逃跑。口头上天天喊“备战”，实际上天天在“避战”，敌人来了打一下，赶快转移，而不想办法消灭敌人。这样的方式，毛主席形容为“叫花子打狗，一边打一边走”。叫花子一边走，一边打狗，狗咬不着就行了，也不准备把狗打死。

长征的时候，前面先锋部队虽然打得好，但是后面走不动，前面打到一个地方就要守起来等，等后面部队到了再走。因为走不动，所以丧失了很多有利的机会，完全处于被动、处于消极逃跑的情况，而不是积极的战斗的战略转移。如果是积极的战斗的战略转移，首先就可以在湘南停下来。湘南过去搞过暴动，以后二十九团的人又回去过一些。在湘南过路时，有一个黄茅山，山上还有游击队。如果我们在那里停下来，把伤病员和拿不动的东西给他们，打下周、薛纵队可不可以？完全可以。但是没有采取这个办法。在湘南不停，继续走。一过湘江、漓水，那时就很恼火了：广西敌人来了，湘南敌人也来了，周、薛纵队又追来了。这时一军团在全州，打了一个礼拜，三军团在灌阳、兴安打了一个礼拜，完全是掩护战斗，消耗很大。过湘江的时候很危险，几个军团的队伍都搞乱了，有的在全州附近打得很苦，有的没有赶上，中间的赶上了又走不动，后面的敌人又打来了。五军团十三师在没有到湘

江的时候，在灌阳以北的隔壁山就被敌人切断了。后面文市的敌人又追上来，我们在夹击中打了一天，才掩护八军团渡过江来，但是五军团的三十四师被丢掉了。我们转移的时候，军团部参谋长刘伯承同志派了一个科长来找我们，带来陈云同志写的信，说这是紧急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的决心，赶快拉过湘江。那时拉过多少就是多少，拉不过去就丢掉了。过了湘江以后，有一个命令：各军团自己收容部队，不管哪个部队的，都收容起来编在自己的军团里。当时就搞得那么紧张、狼狈。这也是教条主义者军事上指挥错误，路线错误的总暴露。

在长征这一阶段，过了几个要害的地方，一个是过湘南，一个是过湘江。由于没有远大的战略眼光，没有高明的战役指导，结果部队减员很多。夜行军搞多了，味道也不好受。那时弄得疲惫不堪，部队有很大的削弱。

过了湘江以后，本来还想向北转到二、六军团那里去，结果城步、武冈都有敌人赶到，把去路给堵住了。没有办法向北，只好向西。又由越城岭向西过苗岭，完全在山里转。这时广西的敌人侧击、袭击我们，还搞了一些特务，在我们刚到宿营地的时候烧房子，使得我们没有房子住，同时把我们和老百姓的关系搞坏。这样一搞几个月，弄得很疲惫。夜间行军行得久了，消耗很大，特别是快天亮的时候，最容易打瞌睡、掉队，发生问题。以后形成了

一个规律，就是晚上行军，天亮后宿营，中午敌人追上就打几个钟头，等到黄昏就走，第二天又是这样。这样一搞，体力消耗很大，部队有很大的削弱。新兵、民夫不习惯这样的生活，很容易掉队。所以有很多人不是打死的，而是拖死的、累死的。我们军团走在后面，就更伤脑筋，前面走的还可以弄到些东西吃，我们走在后面的就没有了。有的同志疲劳到这样的程度：在山路上他靠着休息一下，一坐下来就再也起不来了。又饿、又累、又疲劳，在这样的情况下，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削弱了。在数量上，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去掉了一半以上，而且战略目的没有达到。所以陈毅同志说：走死、饿死和战死的味道完全不一样，与其走死、拖死，不如战死。如果真正以这样大的牺牲来进行战斗，那要打多少漂亮的仗，要消灭多少敌人！

……

到黎平休息两天以后，改编了军委纵队，其他的军团整顿了一下，这样才过乌江。到一九三五年一月进入遵义，接着就开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是一个很大的关键。这次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事先作了很多的工作，他在中央苏区就看到不对头，在行军过程中又看到这些情况，所以写了一个东西，预备了一下，在长征过程中就和一些同志商量，事先酝酿。在下面，大家也对领导上有一些意见，因为客观事实就是中央苏区丢掉了，长征中红军削弱了，仗没有打好，大家

都不满意。到遵义休息了十二天，就把这事情清算了一下。基本上是清算军事路线，从五次反“围剿”失败搞起一直到长征，把冒险主义、拼命主义、保守主义、退却逃跑等问题都好好地清算了一下。这是惨痛的血的教训。最后才取得了遵义会议的胜利。

从这里可以看出毛主席的领导是很艺术的，他对政治路线根本不提，只谈军事路线。因为当时如果谈政治路线，牵连的面就更大了，所以抓住了最主要、最突出的矛盾——军事路线。那时主要的问题是武装斗争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别的问题就都没有办法解决。因此，集中力量抓这一点，就可以争取很多的人。毛主席说：遵义会议是借了别人的码头打仗的。就是说，那时的中央完全是教条主义统治的，他是被排挤的，能够对教条主义的中央把事情说通，说得心服，就说明他是很艺术的，他也作了很多的工作。当然，以后的历史给那些教条主义者已作了结论。

遵义会议后，改变了领导，形势就完全改变了，各方面工作也活跃了。

为什么在遵义能休息这么久？因为我们过了乌江打遵义的时候，二、六军团打了很多胜仗，牵制了湖南的敌人，在战略上起到掩护我们的作用。二、六军团一出桃源，就消灭了敌人两个师，把张振汉捉到了，直接威胁常德。同时，我们到遵义后，敌人估计我们可能回头与二、

六军团会合，因为他们看到六军团是这样走的。周、薛纵队就在芷江、洪江严阵以待，准备打我们。因此，我们就在遵义休息了这么久。后来敌人看到我们没回头，他才进贵州。这时我们和二、六军团会合不了，只有想办法与四方面军会合。本来这也是好机会。四方面军在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时是打了胜仗的，把刘湘的六路进攻都粉碎了，是一个胜利之师，有很大的发展。那时中央要他们第一步控制嘉陵江，来接应我们。我们亦开始准备北进，打算在宜宾、泸州之间过长江，而后再过嘉陵江，和四方面军会合。可是我们从遵义出来到桐梓，发现敌人有准备，潘文华指挥了十四个旅四十三个团在沿江两岸布了防、筑了工事，并从松坎出来一支兵（刘湘的模范师郭勋祺）追我们，一直追到土城，打了一仗。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得很好。北进不可能，后来追兵又来了，仗又没有打好，怎么办？所以就向西走到了威信，这是川、滇、黔交界之处。这时战略指导很困难，北进不成，只有在贵州附近打圈子，建立川滇黔苏维埃根据地。

以后从威信又回到桐梓，从娄山关打到遵义，把王家烈的部队打垮，夺取了遵义城。以后守遵义城。有两座山，一个叫老鸦山，敌人攻山，把山给占领了。那时张宗逊同志被打伤了，邓萍同志被打死，干部团也用上去冲了。后来一军团赶上来了，最后领导上下了决心，不能攻山，就沿着遵义通乌江的马路一直打下去，打到乌江边。

这样一打，击溃了吴奇伟的两个师。后来敌人占领山上的部队也撤退了。

从娄山关一直打到乌江边，确是一个很漂亮的仗，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个胜利。王家烈的部队不是被我们“个个击破”，而是“个个碰破”的。这次击溃、消灭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那时我们开会，洛甫同志讲话说：我们现在不是逃命了，有希望了，有办法了。

薛岳指挥的吴纵队被我们打退了，还有一个周纵队。我们刚到遵义，他们就在遵义西南的长干山，我们一打就撤退到鲁班场守起来。那时他的兵也拖得和我们差不多了，但是他守在那里，因为天下雨，行动不方便，我们攻不上去，所以我们就从右侧仁怀附近过了茅台酒。那时战略指导很困难，因为要建设根据地就必须打仗。我们的老规矩是：打一仗，消灭敌人后，就分兵发动群众，补充自己，创造战场，敌人再来就再打。所以，要打两仗。三仗才能打出个名堂来，才能站住脚，建立起根据地。而那时建立根据地是很不容易的，虽然打了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也不解决问题，吴纵队还有两个师，周纵队又来了；而就红军本身来说，有很大的削弱，到贵州后才扩军，但新扩的部队也不容易巩固。真正打起来，还是靠红军的老骨头，把老骨头消耗了就划不来。那时很多干部问：我们到底怎么行动，方向如何？他们不知道当时战略指导上的困难。

从仁怀过茅台酒向西北走，敌人以为我们要向四川去，薛岳指挥的部队赶快沿着通四川的长江边堵我们、追我们，结果我们沿着茅台北面到了太平渡，又过赤水河转了回来，从鸭溪、枫香坝插过来，到乌江渡河，直插贵阳附近。那时蒋介石自己在贵阳，一看我们来了，很恐慌，赶快调滇军守贵阳。那时毛主席说：如果他把云南敌人调出来，调到贵阳，甚至出来一点，我们就胜利了。结果正合我们计算，滇军一直进到贵阳东的龙里县。我们就乘机从霁儿关插下去，把滇军甩到贵阳一带。迈开大步，顺着贵阳的大道走路，一天一百多里，直到昆明附近。中间只是在黄泥河附近碰到了滇军一些部队，打了一仗，其他没有打什么仗。龙云把民团集中起来守城，我们没有费什么事就把地主武装都搞掉了，把昆明东北将近十几个县城都打开了。这样一来，对龙云的威胁很大，他就赶快把孙度纵队调回来追我们，等追到的时候，我们差不多已经到了昆明的北面。这一仗完全是走出来的，一直走到金沙江边。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打不成就不要再打下去。那时没有办法建立根据地，既使在贵州一带建立根据地，也离进入抗日前线的中心过远。所以就走出一个“战役”来，把四川薛岳的部队甩到后面，把云南的敌人引出来，过河以后又甩掉了。这个“战役”是很伟大的，既达到了战役的目的，也完成了战略的任务。这就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二个胜利。

#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 与盛世才的关系

黄 火 青

按：黄火青同志于一九三七年五月随红西路军进入新疆，曾任“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阿克苏行政区行政长等职。黄老的这个讲话，是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在乌鲁木齐参加纪念陈潭秋、毛泽民、杜重远、林基路等烈士牺牲四十周年活动期间，在新疆民主革命时期党史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它解答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活动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如：我党与盛世才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情况；西路军的一部分是如何进入新疆的；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有没有党的组织；“反帝会”的性质等重要问题。现刊载出来，供党史工作者研究这段党史时参考。

叫我说两句，我还是应该说几句。事隔四十多年了，有些事情记忆不起，可能记错了，也有些事情我是听到传达的，不是直接参加决定的，所以说的准确不准确，也没有把握。我相信在座的研究新疆党史的同志们，是经过多方面的调查，掌握的材料比我知道的还多。我就我的记忆

来谈，不准确的地方，还是你们研究党史的同志来纠正。我不是说不负责任的话，我说的话我还负责，但我说的这些材料不一定准确，不敢下肯定的断语。

第一个问题，这上面（指座谈提纲）有个林超的问题，说我们到这里（迪化）来以后，苏联驻迪化领事馆介绍了一个做党的工作的林超，跟陈云同志见面。这个事当时不知道，以后也没听说过。对这个事，我怀疑。我怀疑这个林超不是中共党员。有什么根据呢？那时王明是驻共产国际的代表，陈云同志是中央委员，他从苏联回来，要是这里有一个（中共）地下党员，王明不会不告诉陈云同志。林超如果是中国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找迪化党的人还找不到？还要苏联领事来给他介绍？林超不一定是中国共产党员。要是中国共产党员的话，中央是会知道的，陈云同志来新疆，中央是会告诉他的，何必要苏联领事来介绍呢。我只说，我自己没有听说过有一个地下党员林超。最近问冯铨同志，他也不知道。这个材料究竟是怎么来的，我提出来，供搞党史资料研究的同志们参考。这是一个问题。（编者注：林超当时是联共党员。）

历来我们就是这样说的，在红军西路军进入新疆之前，新疆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是中共党员，在苏联学习中从苏联派到这里来工作的人不少，他们都不是中国党的关系。这里有个重要人物你们没有写上去，叫陈中，把他漏掉了。陈中是黄埔学生，在盛世才推翻金树仁的政变

后，被盛世才任为参谋长，是个很有能力的人。后来，盛嫉妒他，就在盛督办公署后院里把他杀掉了，不敢拿出来杀。我不认得陈中，是到新疆才知道的。另一个叫张义吾，现在还活着，在天津，我们是熟人。还有一个是王宝乾，也叫赵石。在一九二七年六月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前，我是同这两个人一起坐船到苏联去学习的，我和他们都在东方大学的一个单位里学习。一九三七年四月红西路军到这来的时候，王宝乾是外事处长，张义吾是公安管理处处长。盛世才捏造所谓阴谋暴动案，说张是主要角色，把他抓起来，以后苏联把张要回去了。还有个江泽民，现在在一机部工作（插话：江泽民，现在是电子工业部部长）。还有一个叫俞秀松，化名王寿成，今年八月十四日《人民日报》上给他写了纪念文章，他还是中国共产党的老资格哩，是一九二一年的党员，还是二三年的党员，不清楚（编者注：俞秀松是一九二〇年夏参加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他是我的前任，一九三八年我接他的“反帝会”秘书长的任嘛！我们来新疆以前，有几个确实是中国共产党员，他们在苏联学习，都是从苏联派来的，跟中国共产党中央没有组织关系，跟中国共产党没有领导关系。我们来这里以前，这个地方没有中国共产党组织。还有个陈培生，现在叫刘进中，他还活着，在中央调查部。他也是从苏联派来的，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就是跟周总理那一批到法国，他从法国到苏联，又从苏联到新疆来的。像他

这样过去也曾有党的关系的人，当时跟我们中国共产党没有组织关系。还有一些人，盛世才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员，好象是中共对他不公开，派他们来的。如何语竹、周春晖等，在新疆是有名的十大博士。盛世才跟我们说，这些人，他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派来的。实际上这些人是脱党分子、叛变分子跑到新疆来的，是不能算共产党的。我说这一切，就是说，根据我的了解，红西路军失败来新疆以前，新疆没有党的组织。

关于陈云同志是怎么来新疆的问题。陈云同志在长征的时候到川西（插话：天全、芦山一带）、宝兴一带，他是那个时候（编者注：一九三五年夏）离开队伍，经地下党组织去上海转到苏联去的。一九三六年十月，我们有一部分队伍（指红西路军）过了黄河，需要共产国际接济一下，他是带了东西来迎接我们这支军队的。在我们红西路军没有到新疆以前，他们就到了阿拉木图了。他们共有五个人（编者注：陈云、滕代远、冯铨、段子俊、李春田同志），在中苏边界上等消息。一等，等来了我们几个败军之将，剩下四百五十来个人。我们一来，陈云同志很快就知道了。当时，在星星峡盛世才的边务处，那个姓王的（插话：叫王孝典，一九八一年已去世）是边务处陈培生的部下。我们一到，陈培生就知道了。陈培生知道了，当然苏联驻迪化领事馆也知道了。苏联知道了，陈云他们就过来了，他们就是这样来的。你们问是中央派来的，还是

共产国际派来的？总之，当时他是中央委员，他们是拿了很多东西来的，等我们来后，给我们送过来。陈云是这样来的。来到这儿，跟中央有联系没有？有联系。红西路军徐向前、陈昌浩走了以后，剩下一部电台，叫第八台，好象是手摇机。徐、陈走后给中央发过一个电报。他们两人离开队伍，成立了一个工作组，还是叫工作委员会？（插话：工作委员会。）那个委员会有六个人，李卓然是书记，有李先念、程世才、曾传六，另外还有两个不太好的人。这两个人的下落现在不知道。那一回发了一个电报，从此，这个电台就压起不发电报了。因为，西路军有一个修理电机的，姓刘，对这个电机很熟悉，后来这家伙被俘了，这个电台叫号一响，他就能听得出来，听懂声音。所以，在整个祁连山活动时不发报，一点不准动。快出祁连山了，有一个地方叫跑马泉，一个地方叫石包城，还有一个地方叫塔实，属安西县管的一个大村子。我估计是在跑马泉发了个电报，告诉中央我们现在剩下九百多人了，我们是进新疆还是到蒙古去，请示中央。那时中央关心得很，一叫就叫通了。中央回了个电，说你们到新疆去，走北路，不要走南路。中央是有这样指示的。为什么不走南路？以后知道，马仲英的残部还在围攻和田，如果我们一到和田，马仲英就会把我们消灭掉。我们一到星星峡，盛世才打电话问，实际是陈云同志问，来了哪些主要干部，来了几个什么人？于是，象我们这些人都算在内，都报告了，陈云同志

就来接我们了。在星星峡还开了“五一”纪念会，陈云同志在会上说了不少鼓励的话。陈云同志一直就是这个精神，就是鼓励，说你们这些共产党员，经过那些困难都过来了，人都累的不象样子了，不投降敌人，剩下这部分人还团结在一起跑到这里来，总算好样的，是好共产党员嘛！都是鼓励的话。这以后我们乘坐十来辆汽车，大概是五月七号到了迪化。先住在西郊公园附近，金树仁要办纺织厂的那地方，不久就搬到迪化北门外，正式对外叫“新兵营”。你们说陈云同志来是不是中央批准叫来的，那很早就安排好了吧。带了好多武器，那是共产国际马衣努斯基布置的，拨了多少枪，多少炮，多少机关枪。陈云同志给我讲，去领武器的时候，另外给我们加了多少门大炮。很明显了，陈云同志就是这样来的。

关于我们跟盛世才的关系和“反帝会”的性质问题，也可以说是对盛世才的“六大政策”问题。要说明我们跟盛世才的关系，首先要说明盛世才跟苏联的关系。盛世才所以能统治新疆，完全是苏联人给他打下的天下。这句话我说得不艺术，实际是那回子事。马仲英占领了迪化北门外的“一炮成功”了，就要进攻迪化了，十分危机。盛世才急得狗子过不了河，有一天找外事处长陈德立，问他怎么办，陈说领事馆里讲“快了、快了”。陈德立紧急地不断地跑，靠领事馆问消息。什么快了？天快黑的时候，来了几架飞机，向“一炮成功”扔下了几个炸弹，马仲英的

威风下去了。接着又来了个“阿泰军”，是从阿勒泰过来的军队，骑兵穿的都是盛世才的军服。我们听到新疆人说，是苏联的军队。那个军队把马仲英一直打到和田去。一九三七年苏联又出兵，在和田把马仲英的残部消灭掉。这样盛世才才得了天下，才站稳了。苏联又把从中国东北三省退到苏联去的抗日的张学良的部队派过来一些，如马占山、苏炳文这些人的部下，几百人，内有蒋毓芬、孙庆龄、冯良等，盛把他们收容起来，编了个队伍。他们吃的穿的全都是苏联支援。盛世才这个天下是这样子来的。这你们就知道盛世才和苏联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了。红西路军到这里来，那还不是苏联领事馆给盛世才说的？抗战期间由盛世才出面派他那个最亲信的副官给我们送二十万件皮大衣。盛世才就那么大方，可以拿二十万件皮大衣出来？还不是苏联出钱，他出名。以后还送过一回西药，都是这样子的形式。我们“新兵营”一到，每天每个人一斤半羊肉，吃不吃都给拉来，你们那时候（指参加座谈会的当年的老同志）吃的够呛吧，都吃胖了。那是苏联顾问开了口，他照办就是了。我们和盛的关系就是这样子来的。那个时候，几乎各个地方，军队里、各个厅都有苏联的顾问，顾问说话顶事，也可以说有决定权。那时，这些人是明里来的，暗里还有哪！边境线上，我们这边是哈萨克，苏联那边也是哈萨克；我们这边是柯尔克孜，他们那边也是柯尔克孜，彼此亲友往来，边境上是没有哨卡的，很自由，谁

能知道苏联在这儿有多少人？盛世才不知道。那时各个专区里盛世才有土产公司，苏联有个苏新贸易公司，说是商业来往，实际是起领事馆的作用。我在阿克苏当行政长，有好多事我不知道，就靠苏新贸易公司那个经理透消息给我。我那里，公安局长叫曹天爵，此人很坏，他派特务搞我的明堂，搞了两个特务在我身边，我还不知道，就是苏新贸易公司经理告诉我的。这说明一个问题，苏新贸易公司不是光做经济工作的，也做政治工作。我离开家从来没有接过一封家信。我家的信寄到延安，从延安转到重庆，又从重庆转到迪化来，是苏新贸易公司的人把信拿给我。是我大哥给我写的信，还有我母亲的照片。说明这个关系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新兵营”留下一些人在新疆工作，以后从延安又调来一批人（插话：都是经过苏联向中央要的），都是这个路子来的。我们对外说，是盛世才请来的。我们在这里老老实实地做工作，盛还收拾我们！最近，西安电影制片厂编导《西安事变》的一位同志，还有个周伟写这段历史。我说这个事，你们只能够这样说好，不能说别的。你说我们这些同志来，不是中央决定的？你朱大姐（朱旦华）、高登榜同志，这都是中央决定调来的。说是盛世才要的，这话对呀，但实际上是苏联需要我们中国共产党来些人，先跟我们中央商量好了，我们也同意了，领事又去给盛世才讲，盛世才又向我们代表提出来，你们再给我们多少人吧，就是这么圈子一转。我们来这些

人，中央不派，哪个共产党员敢跑到新疆来？我们虽然是打败仗到这里，如果中央不同意，我们敢留在这里工作？说是中央派来的，也是有道理的。实际上我们的工作不归中共中央领导，我们在这里做具体工作，不是延安给我们发指示，是按苏联在这里的政策办事。我们不在这里成立支部，不发展党员。这个关系就是这样一回事。王明从这里路过，是不是执行王明路线？“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也给我们提过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在这里执行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我们在这里不是那样子一个问题。这个事要有一个分析。王明那个人想吹乎他自己，也到“新兵营”转过，那时前呼后拥，把他两只胳膊夹着，怕他踩死蚂蚁。他在工作上讲了什么，我没有多大印象。我们这里不发展组织，不搞群众运动，不搞群众斗争，不过党的生活，这是苏联和盛世才商定的。我们出来工作的时候都向我们交代过。陈清源在阿克苏是《阿克苏报》的总编辑，还有个陈九柯在温宿管财贸，他们都知道我是比他们老一点的共产党员，我也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但没有开过会。这上面（指“新大”等单位编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新疆革命斗争纪事》）说我在阿克苏是党小组长，经常有联系。没有那回事。要有那回事，我们就有党的工作，过党的生活，讨论工作，发展组织了。这些青年同志出来工作时，中央代表都交待了，你们到那里去，有事可找谁联系联系。很明显的，我们较

老的党员和他们说话总带有点指示性吧，这些情况是有的，但没有党的生活。有一件事是真实的，就是毛泽民、孟一鸣（叛徒）、我，我们三个人，没有什么组长的问題，一定时间由我召集一下，碰碰头，谈谈情况，研究点问題，交换交换意见。地点在教育厅。这是邓发同志交待过的。除这个外，没有别的，没有党内生活，没有党的组织。搞这一套，你一切经过盛世才，是不是王明路线？我想这地方也有点不太一样。王明那个“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是对蒋介石，他跟我们是彻底对立的，蒋介石的后台是美国。盛世才的后台不是美国，他跟蒋介石也有蛛丝马迹，有个张元夫在重庆住着，有些联系，但他基本上是跟苏联。所以跟王明那个“一切服从蒋委员长，一切通过蒋委员长”还有点区别，这个问题要说清楚。至于对盛世才这个人的评价，大家都知道了。那时就是这样搞的。这样搞，我们不习惯，别扭极了。党要你搞，你有啥办法呀，这个关系就是这样一個来历。包括盛世才那个“六大政策”（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我们来以前就有了。“六大政策”我现在不知道根子，估计是王寿成他们在这里搞了，苏联同意了，我们来的时候就有。我们在新疆时，中央的重要文件书刊，到办事处是可以看到的，但不能根据中央指示讨论布置工作。苏联那一套搞法，我们也不是没有意见。这段工作如何总结，是可以研究的。

关于“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问题。那时会长是盛世才，副会长是李溶，下面是秘书长、秘书处长、科长，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形式。“反帝会”是个官办的群众组织，因为盛世才当会长，下面的厅长也好，什么长也好，都要加入“反帝会”，也算混个身份，镀镀金，这是一方面。另外，广大的会员还是可以谈谈马列主义的。那时马列主义的书、斯大林的书可以在街上买到，盛世才准许宣传马列主义、斯大林，是合法的，但不能宣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这个牌子不能挂出来。为什么呢？从盛世才来说，或者从苏联来说，有个怕美国的问题。一说中国共产党在这里，美国可以大肆宣传。苏联，斯大林怕美国，叫他不过长城，他就不过长城，多走几步都不干。盛世才怕蒋介石说他赤化了，所以不要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派了一百多个人来，基本上都是在政府里，在财贸、文教这两个口里分配的。那时派潘柏南（叛徒）到和田去，派周纯麟到喀什去，胡东去尉犁，都在军队里。盛世才是不愿意我们到军队里去的。以后，可能苏联领事说了话，他们妥协的结果，还是用了几个人。那时候虽然没有党的组织，可是老百姓都知道“新兵营”是共产党、红军。从延安来的那些干部，老百姓也知道是共产党。虽然没有党的组织，我们这些人还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把本身的工作做好，给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每个共产党员都是本着这个精神做事的。象昨天讲的（编者注：指自治区纪念陈潭秋等烈士牺牲四十周

年大会上王恩茂同志的讲话)那是事实,毛泽民同志到这里整顿财政,搞币制改革,确实起了很大作用。林基路、汪小川、李志梁等,特别是林基路,在青年学生中是有很好的影响的。如祭悼文(编者注:指自治区纪念陈潭秋等烈士牺牲四十周年祭悼灵墓时,铁木尔·达瓦买提同志宣读的祭悼文)上写有乔国仁,我记得还有武志孝,要是说我们能发展党员,这些人是要发展的。师范学校里还有个马志良(插话:跟林基路到阿克苏去的那个田玉桂)。这些人,当时在青年里都是很进步的。我们来的这一百多个人,虽然是不让宣传毛泽东思想,但还是按照毛泽东思想跟群众讲话的。对盛说起来,我们叫“走私”了。跟群众接触,人家一看你没有官气,你这个风度,他不说,心里也知道你是共产党员。我们是给人民留下了好的影响的。那时“反帝会”的工作,就说抗日宣传工作吧,盛说“反帝”,我们就说“现在反对帝国主义主要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突出地强调抗日,借“六大政策”给发挥一下,利用“六大政策”,我也不犯你盛世才那个法,我有我的解释。盛世才写的那本“六大政策”,牛头不对马嘴,胡说八道,我们给它按我们的观点解释,在人民中间散布了一点种子,起码共产党在这里亮了个相。所以,后来盛世才提出了“注意新来的人”这个口号,到处宣传这个口号。我还没有到阿克苏,那里就说“注意新来的人”了。那时“反帝会”还是反帝统一战线组织。我们在迪化搞了个手工业

的工人联合会，为首的那个人是手工业小作坊的头，姓李姓什么的，发展到一千五百人。那时的“反帝会”，不能说是个反共的组织，它是官办的组织，官办的群众组织。盛世才那些头头脑脑的也参加，连那个蒙古的满汗王，哈萨克的王爷沙力布汗都是会员，还有的是各分会的会长。我们可以利用官办组织的合法性来宣传马列主义、宣传抗日。那时，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没有利用好这个关系多做一些工作，把工作做得更好。开始盛世才是尽量地跟我们拉关系，他是为了讨好苏联。开始他还要求入党，表现很积极，说朱总司令也是我的总司令（插话：他还喊毛主席万岁），他也想镀金，他要加入共产党，陈云同志在时他也提过。我们那时候说，你不加入比较自由些，你说话起的作用大些，这是我们拒绝他的话。我们没有答应他。一九三八年盛跑到苏联见斯大林，想加入联共，斯大林也拒绝他。回来后，他就翻脸了。最后他所以敢动手，把我们同志押起来，主要是他看苏联的战争形势，认为苏联完蛋了。他把我们的人押起来，杀我们几个人，作为跟蒋介石的见面礼（插话：苏联红军八团撤走，他才敢杀），第八团不走，他也可能不敢杀。

（本文原载《新疆党史资料通讯》总第12期，本刊转载前又送黄老审阅，并对个别字句作了修改。）

# 开辟辽东根据地

肖 华

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曾在东北开辟了辽东根据地。这里三面环海，背靠长白山脉，南扼海上渡口，西控京沈线要道。境内工业发达，钢都鞍山，煤都抚顺以及本溪、阜新，安东的工业都驰名全国。控制了辽东，就控制了从海路进军东北的门户，掌握了东北的主要经济命脉。辽东的战略位置和经济地位，使之必然成为敌我争夺的重点。光荣的辽东军民，在这块土地上，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如火如荼的斗争。

这里我仅就辽东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作一简要回顾。

## (一)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百万红军进入东北，向日本最精锐的“关东军”发起进攻，并予以毁灭性打击。党中央预见到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将由中华民

族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大众同美蒋反动派之间的矛盾。抓住先机，制定了“南守北攻”的战略方针，同国民党争夺东北。九月，中央命令我率领部队横渡渤海，进军东北。我三万大军，告别了山东老根据地，渡海北进，先后在獭子窝、庄河、皮口、大孤山一带登陆。我和指挥部的同志经过一天一夜的艰苦漂泊，在大连登陆。当天，我即同吕麟、刘居英、赵杰等同志搭乘一列拉煤的火车赶往沈阳，向东北局汇报。

在沈阳市三经路博物馆，我们找到了刚到这里两天的陈云、彭真等领导同志。他们认真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并扼要地向我们谈了当前的形势。从他们的谈话中我才知道：正当我们在海浪中行进的时候，国民党有将近五十万大军沿平绥、同蒲、平汉线向平津、东北前进。刘少奇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开会，在取得当时在重庆的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的赞同后，向全国发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重要指示，并派陈云、彭真等领导同志急赴东北，统一领导。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现在十万大军正抓住先机，急驰东北。他们在介绍完情况后，对我们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南满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央决定肖华带山东渡海来的部队主力留在南满，开辟根据地。从山海关过来的曾克林与唐凯同志率领的冀热辽第十六军分区的部队划归你们指挥。当前，你们第一位的任务是站稳脚跟，控制海口，迎接大部队登陆，同时趁蒋军未到的机会剿灭土匪

和日伪残余，放手发动群众，改造政权，建立根据地。并且利用一切可能，尽快整编军队，发展武装，扩大主力，形成拳头。为了统一南满铁路以东的调进部队的指挥，东北局决定建立东满人民自卫军，成立东满临时指挥部，并决定由肖华任司令员兼政委，代表东北局领导该地区的工作。

十月，在内地正是遍地红叶的季节，而在关外，却已万木叶落，寒风袭人。但是，从东北局请示工作回来，我们一个个心里都暖烘烘的，大家为沦陷了十四年的东北重新回到祖国怀抱而欢欣鼓舞，也为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建立人民政权而感到兴奋和喜悦。离开沈阳后，我们先到本溪，同曾克林、唐凯同志讨论了冀热辽十六分区的整编方案。接着，即回到凤凰城，在迎宾馆召开了部队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了东北局的指示，宣布成立东满人民自卫军司令部，并决定：一、以一部分兵力控制营口至安东一线沿海海岸，防止蒋军登陆，为我后续部队及干部登陆争取时间和创造条件；二、整编部队，调整组织，以一部分兵力分散到农村，大量发展和吸收贫苦农民、工人、青年、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入伍。在十月底完成发展十个团的任务，充实力量，保持拳头和突击力量。同时加强训练，提高战斗力，大力建设炮兵。

会议精神传达到部队，干部战士一片欢腾。各部队迅速派出一大批干部，深入中长路以东，北到吉林南到普兰

店等广大地区的乡村和中小城镇，广泛开展扩军工作。他们每到一地，便积极向群众宣传我党建立民主东北的主张，宣传我军的宗旨、性质、任务和三大纪律<sup>等</sup>、八项注意，积极配合地方干部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反奸清算斗争，建立群众组织和各级人民政权。党的主张、人民军队的行动象一股春风，吹散了蒙在群众心头的疑云，饱受日伪残酷统治十四年之久的南满人民，从我军宣传中看到了自己的希望所在，纷纷报名参军，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当兵，新人新事层出不穷。大批青年学生、知识分子、技术人员也拥到部队，踊跃报名入伍。矿山上的工人也自动收缴日伪武器，一批一批地投奔我军。在地方同志的热情帮助下，部队很快扩充了不少兵力，军政学校也招收了大批青年和学生。

部队渡海时，大批武器都留给了在山东的部队。进入东北后，武器和弹药十分缺乏，加之扩军工作发展很快，武器装备更趋紧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后勤部长吕麟组织工作人员走城镇、钻深山，收集日伪军溃退时丢弃的武器弹药、被服、军械物资和医药，在深山里寻找日伪的地下仓库。并和苏联红军联系，利用各种方式搬运他们缴获的仓库里的武器弹药。通过这些方法，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收集了大批武器装备、医药、被服、兵工机器。尤其使人兴奋的是，还收集了一批山炮、野炮、轻重机枪。这些在敌人看来已经陈旧的武器，我们的战士却都当做宝贝。我们

用这些武器成立了炮兵连、机枪连、炮兵团。那时，去北满的部队武器装备也很匮乏，我们除了充实本部队外，还拿出一批比较好的武器运往北满，支援兄弟部队，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同时我们招收了大批工人，建立了兵工厂、被服厂、医院和仓库。

在派出一部分兵力配合地方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发展武装力量的同时，我们对部队迅速进行整编训练，统一建制，形成拳头，使新生力量很快成长为能够作战的部队。我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深入各地，了解部队情况。我们根据中央指示，经过反复酝酿协商，把全区部队编为两个纵队，五个直属支队，一个保安旅，一个保安团，一个基干团，一个独立团。其序列为：第二纵队由山东军区第六师和第五师一个团及原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第七十二团编成，司令员吴克华、政委彭嘉庆。下辖第一、第二支队和直属第二支队、警卫团，共计七个团，驻海城、大石桥、营口地区。第三纵队由原山东军区第五师一个团、胶东军区北海军分区独立团、警备三旅第三团及一部分地方武装编成，司令员胡奇才、政委欧阳文。下辖第四、第五两个旅，共四个团，驻大东沟、大孤山、庄河地区，防止敌人登陆和一切可能的进攻。通化支队，支队长翟毅东，政委刘西元，下辖两个团，驻通化。一团由山东胶东军区招远独立营及山东军区发展的部队和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第五十八团组成；二团由延安、冀、察、

晋和山东来的一部分干部在沈阳，抚顺发展起来的保安三旅第九团组成。平原游击支队，由原陕甘宁边区教一旅二团一部发展的部队组成，在辽中、台安、盘山一带活动。直属第一支队，辖原山东军区警卫团一个营及原山东军区第五、第六师各一部分连队组成的警卫团，和由延安炮校来的一部分干部发展的部队组成的炮兵团，驻安东宽甸、凤城一带。直属第三支队，由原山东胶东军区蓬莱独立营发展的部队组成，驻安东、庄河一带。邓铁梅支队，由山东军区来的一部分干部发展的部队组成，驻安东。保安第三旅，辖两个团，以晋察冀、华中、山东军区来的一部分干部为骨干，吸收抚顺、本溪、沈阳的煤矿工人组成，在抚顺地区活动。辽宁军区第四军分区独立团，由延安和华中军区来的干部及山东军区滨海支队第二十六团的部分兵力发展起来的部队组成，在朝阳、盘石、海龙地区活动。鞍山保安团，以冀察晋军区来的一部分干部为骨干，吸收矿工组成。安东军区第三军分区基干团，由原山东军区第六师第十八团部分兵力和警卫团部分兵力发展起来的部队组成。就这样，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东满人民自治军已发展到二十多个团共三万五千余人，司令部也由凤凰城搬到安东，改为东满人民自治军司令部。

争夺东北的斗争十分激烈，我们的部队刚整编完毕，蒋介石经过同美国密谋后，便悍然调集他的精锐部队从海、陆、空大举向东北进犯。十一月三日杜聿明和美国第

七舰队代理司令巴贝，同乘美舰脱尔号进行试探性登陆，当即遭到我军的阻止，他们便乘舰从营口到葫芦岛一线进行侦察，选择强行登陆地点。我军一边严阵以待，扼守渡口；一边做好各种准备，陆续迎接我向东北开进的部队。我们在登陆点和部队将要经过的地区屯积了粮食、衣物、车辆、马匹，号下了房子，安排了宿营地，使部队一到就能有饭吃有地方住。十月中旬，胶东军区田松支队（威海卫刘公岛起义的海军郑道济部队）渡海，经我们接迎，从安东开赴北满；十一月初罗荣桓同志率部横渡渤海直抵安东，随他先后渡海的有三个师、一个旅、两个团和十个团的架子及大批地方党政干部；十一月中下旬，山东军区第三师、警备三旅和华中、山东来东北的一批党政军干部及一部分县地方武装部队在貔子窝、庄河等地登陆；十二月上旬，山东军区第二师由胶东渡海北来。这些部队在我们的接迎下顺利地到达预定战区。迎接大部队的任务完成后，南满的部队又得到了补充。为了统一作战指挥，加强辽东根据地建设，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东北局决定，以东满人民自卫军为基础，成立辽东军区，我为司令兼政委，江华为副政委，莫文华为政治部主任。将辽东和安东两工委合并组建辽东省委，辖辽宁和安东两分委，我为书记，江华为副书记，程世才、白坚、张学思、刘澜波、罗舜初为常委。辽东军区下辖三个军区，两个纵队，其序列和干部为：辽宁军区，司令员

张学思、政委白坚；安东军区，副司令员沙星澜、副政委刘澜波；辽南军区，司令员吴瑞林、政委林一山；罗舜初部与曾克林部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程世才任司令员，罗舜初任政委，曾克林任副司令，唐凯任副政委，下辖七、八、九三个旅；吴克华、胡奇才两部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吴克华，政委彭嘉庆，副司令胡奇才、韩先楚，下辖第十、十一、十二旅。各纵队还成立了一个炮团。按照保持主力，增强战斗力，适当照顾原建制，缩减机关，充实部队，适当调整部队的原则，我们对机关直属各单位，军分区、支队、独立团也进行了整编。辽东军区机关直辖一个警卫团，一个炮兵团，驻安东。

经过这次整编，部队新老搭配，装备合理，编制、体制健全，全区六万六千余人形成了拳头。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集中力量对部队进行训练，建立健全各项制度，积极准备迎接敌人大规模的进攻。

## （二）

开辟根据地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剿匪和清除日伪残余。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以宁渝合流、蒋伪合作代替“中日提携”、日伪合作。他于日本投降前后派出大批特务潜入东北，同日伪勾结，与日伪、日特、伪警、汉奸、地主恶霸同流合污，组织所谓“地下军”、“先遣军”、

“铁血团”、“挺进军”。他们把日军组织起来，拒绝我接收，夺我武器，杀我工作人员，侦探我情报，进行暴乱，反苏反共，残害人民，无恶不作。他们破坏我解放区，准备迎接国民党军队。日伪统治时期，东北本来土匪就多，这时再加上这些日伪残余势力的猖獗活动，更使祖国的东北，土匪遍地，司令多如牛毛。他们到处烧杀抢掠，搞得人心惶惶，一片混乱。不剿除这些祸患，就不可能建立起民主政权，我军也无法在东北站稳脚跟。

十月初，在凤凰城迎宾馆召开的会议上，我们对南满的匪情作了详尽的分析，基本查清：安市周围有国民党特务李光忱、日特吉岗等人组织的“先遣军第十五路军”和日本军人成立的“铁血团”在活动，约三千多人；通化、临江一带有汉奸孙耕尧同日寇一二九师参谋长藤田组织的三千多名日寇和三千多名伪警土匪，跟随伪满州国机构和宫廷残余在活动；鞍山东部千山、七岭子一带，有伪满州国少校宋子明等组织的四千余名日伪残余在活动；抚顺一带，有汉奸王舟等部三千多人在活动。除了这几股大匪外，还有无数土匪和日伪残余盘踞在小城镇、林海雪原或崇山峻岭，少者数十人，多者数百人。为尽快铲除对我军威胁最大的日伪残余势力，我们决定，先消灭集中在中等城市、交通线上的大股，然后派出小部队剿除分散的小股。具体任务是：由吴瑞林统一指挥直属第一支队和第三支队先消灭安东、凤凰城地区的日伪残余，然后直属一支

队和通化支队由翟毅东、刘西元同志指挥消灭宽甸、通化和临江地区之敌；第二纵队则由吴克华、彭嘉庆指挥歼灭鞍山以东千山和岫岩地区之日伪残余。要求各部队要采取出敌不意的战术，灵活机动，连续作战，务求短期内彻底肃清土匪和日伪残余势力。

剿匪第一仗首先在凤凰城打响。这里是安（东）沈（阳）线上的一个交通要点，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且城东山区山峻林密，洞穴很多，便敌隐蔽，所以匪徒们在安东和凤凰城的活动十分嚣张。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打家劫舍，奸淫烧杀；冒充我军抢夺群众财物，敲诈勒索，有个商行一次就被他们诈去一百三十多万元；他们携带武器，破坏交通，暗杀我军战士和地方工作人员，并提出杀一个八路奖赏五千元；还破坏工厂开工、学校开课、商人经商，弄得市区秩序混乱不堪。一次我坐车从安东市里经过，伪警从楼上搬起一块大石头朝我砸了下来，只听“咔嚓”一声，石头穿透布篷砸坏车厢，离我的头部仅差几公分的距离。

为了把这些杀人魔王一网打尽，我们派直属支队第一团一营营长李兆亨同志，率领全营从安东乘火车到东汤一带去端敌人的老巢。这伙匪军的消息十分灵通，当我部队向东汤进军时，他们即闻讯钻入深山。丛山峻岭，重峦叠嶂，一营人进去，象大海捞针，到哪里去找，到哪里去打？李兆亨等同志冷静地分析了形势，决定也来个将计就

计。他们大张旗鼓地集合部队，扬言这次走漏了消息，使部队扑空，下次找准机会再来。部队大摇大摆坐上火车鸣笛开回。狡猾的敌人看到我军远去，连夜回镇，狂吃滥赌了半宿。拂晓，当匪徒们还在梦中的时候，突然镇西边响起了激烈的枪声，他们从睡梦中爬起，急忙向镇东撤退。不料，刚刚出镇，东、南、北三面高地上就响起了枪声，三百多名匪徒被压缩在一个山窝里全部束手就擒，伪区长、警长带着十多人逃窜也被全部活捉。原来，那天一营并没有真正返回，他们在火车驶过山后即迅速下车隐蔽。他们分析，匪军看到我军撤走，一定会回镇，于是第二天一早他们就杀了一个漂亮的“回马枪”。

东汤之战后，我们便决定进剿安东的匪徒“先遣军第十五路军”和“铁血团”、“先锋队”。当时安东驻有苏联红军一个营，一个少校营长担任警备司令。进剿安东日伪残余，需要和苏军配合。但是，那时我军初到，他们见我军既没有标志，也没有党证；“治安维持会”的人又四处造谣，因而，他们对我们究竟是什么军队半信半疑。刚登陆时，我曾去跟他们联系过，还到朝鲜新义州同他们的领导商谈，部队和机关主动请他们开联欢会，用手势表示我们是八路军，但发现他们还是弄不懂，于是战士们便唱起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

高昂的歌声，使红军战士激动不已，正如列宁在纪念鲍狄埃时说的那样，无产阶级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凭着国际歌的歌声找到自己的朋友。听到这熟悉的曲调，红军战士的疑团消失了，个个脸上露出了笑容。但是，由于受“中苏友好条约”的限制，他们在同我们打交道时，还有不少条条框框。这次要消灭盘踞在原伪市公安局、各分局和七、八道沟等地的日伪残余势力，还需要同红军协商。我们派吴瑞林同志去同红军警备司令商谈时，他们没有表示明确态度。后来经过了解，才发现红军到来后，日伪军都打出了“维持会”的招牌，表面上他们装做维持市内秩序，暗地里却在杀人越货制造混乱；在市外，他们则大队出没，肆无忌惮地劫掠村庄残害无辜，而“维持会”又在红军面前把他们的所作所为推到我军和土匪的头上。红军初到异国，又只住在城市，所以对这些情况一时弄不清楚。

为了揭露日伪继续残害人民的罪行。我们派吴瑞林带直属三支队的一团，对安东西南三股流的敌人进行了一次奔袭。当时已是十月底，野外寒风怒号，万木萧条，被日伪洗掠过的村庄，处处闻哭声，家家有带孝人。目睹一片惨境，战士们个个怒火中烧。他们以急行军赶到三股流后，即散开队形，向敌发起进攻。顽固的敌人凭借暗堡，疯狂向我扫射。我军炮兵发现后，马上发炮轰击。我军在

炮火掩护下，前扑后继，更猛烈地向敌人进攻，一举歼敌五百多人，七个日本军官也全部被我活捉。我们把这七个家伙押解到苏联红军司令部，向红军详细介绍了日伪的滔天罪行，红军在人证物证面前，明白了事实真相，表示同意我们歼灭安东市的日伪势力。为了防止敌人潜逃，我们决定于当天午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敌以突然打击。不料，这伙敌人的消息特别灵通，还不到午夜，侦察员就来报告，敌人准备乘车逃跑。敌变我变，我们立刻决定提前行动，我直属一、三支队马上向敌人压了过去，三千余日伪残余大部被歼，当场活捉伪省长曹承宗、次长渡边阡治。

逃窜的敌人如丧家之犬，急急向长甸河口和宽甸以西而去，我一支队一部紧紧尾追，昼夜不舍。不巧，这天晚上上下起了大雪，一夜之间，满山遍野银装素裹，道路村庄白雪茫茫，匪徒们惯于雪地行动，天亮时已跑得无影无踪。这时，天寒地冻，气温下降到零下二十多度。为了尽快歼灭这伙日伪残余，我们在安东动员了二十辆汽车，部队乘车追击。可是，狡猾的敌人根本不同部队交手，我军赶到后，他们打了几枪就向山林密处逃窜。一支队一直追到宽甸以西的大河东、香炉沟一带才又发现敌人踪迹。为防止敌人潜逃，我们下令安东第四军分区基干团从西边出动，和一支队合围，两支部队密切配合，终于使五百多名残敌全部被歼。化妆潜逃的敌人头目也于第二年一月被逮

捕，著名的日本特务森龙二郎、吉岗和汉奸程玉堤等都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司令部附近的日伪残余被消灭了，社会秩序开始安定，被匪徒劫掠后的村庄又开始恢复了生气。十一月，我军又乘胜向通化临江地区进发。

临江大栗子，是伪满州国宫廷机构所在地；通化，则是日本准备退守南满时要把“国都迁往的地方”。早在苏联对日宣战的第四天，高级顾问吉岗就在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和参谋长秦彦三郎的策划下，同溥仪及皇后、贵人、御弟、妹夫等人乘车来到临江大栗子，他们的文武大臣、阁僚、议员也相继来到这里，开设办事机构，组织军队，准备负隅顽抗；如情况不利，就过鸭绿江去日本。苏联红军的进军粉碎了他们的美梦。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投降，准备逃往东京的桥本和溥仪在沈阳飞机场被捉，张景惠等一批伪大臣也和他们的主子一起，被用飞机送到了苏联，但是伪满机构残余的势力还十分庞大，他们带着各种伪满皇室的国宝，妄图依托长白山天险，伺机暴乱、反扑，四千多名匪徒则经常四面掳掠，扰得方圆百里房破屋空，尸横遍野。

从宽甸到通化、临江，要翻几座大山，沿途群山起伏，峭壁林立。时值关外雪季，沿途雪团纷飞，铺天盖地，山涧林涛怒吼，难辨东西。战士们踏着没膝的积雪赶路，不时有人落入冰河，陷进雪窟。这里因被日伪并过屯，几十

里遇不到一个村庄。偶尔在深山见到几户人家也多是房倒人亡，或只剩下衣不遮体的老人、儿童。战士衣服湿透了，只好拧拧积水，继续赶路。随着时间的推移，路上雪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猛，上山时要手拉手连结起来才免被刮下深谷，下山时到处是三、四十度的陡坡，大家便学着当地群众滑雪的姿势，坐下来，飞快地滑下去。经过几天几夜的急行军，部队于十二月七日赶到临江以西的帽儿山下。此山形似半月，环抱临江，山势险峻，峭壁纵横，无法逾越。城前月牙缺口处两山对垒，号称“珍珠门”，日伪一个营的兵力驻扎两边山头工事，易守难攻。部队在山前反复研究作战方案，突然一阵大风刮来，积雪飞舞，遮天蔽地，形成一片雪雾，带队的团长郭家洛灵机一动，指挥部队飞快地冲了上去。敌人还没看清是怎么回事，我军已冲到了跟前，他们仓促放了几枪，就四散逃跑，我军乘胜追击，很快就包围了临江城。入夜，战士们的衣服都冻成了铜盔银甲，但大家静静地埋伏在城外，静等总攻开始。八时，三颗红色信号弹划破夜空，我军战士们威逼城下，敌人凭借坚固的工事猛烈开火，枪声、炮声、冲杀声响成一片。第一次进攻受阻后，我军马上调整组织，集中火炮猛轰西门，支援部队展开第二次进攻，很快从西门突入，一举毙敌百名，俘敌五百余名。这时，我另一支部队已直插大栗子，包围伪满皇室，皇后婉蓉、贵人李玉琴以下全部束手就擒。临江、大栗子又回到了人民手中。广大劳苦大

众纷纷拥向街头，敲锣打鼓，欢庆新生。

临江日伪残余的覆灭，使敌军闻风丧胆。我军乘胜出击，在南满铁路两侧的千山、岫岩等地围歼匪徒六千余人，在抚顺地区歼灭匪徒两千余人。至此，大股敌人全部被歼，一小撮漏网匪徒潜入丛山溶洞和林海雪原，开始了“座山雕”式的土匪生活。根据这一情况，我们也调回大部队整训，以一部分部队化整为零，组成精干的小分队，进山剿匪。

这次剿匪，时间两个多月，部队在人地两生的情况下，顶风冒雪长途奔袭，歼灭日伪残余两万余人和难以胜计的小股土匪，基本肃清了南满的匪徒，铲除了残噬人民的祸害，稳定了解放区的后方。部队所过之处，人民群众箪食壶浆，举村相迎，许多受敌人欺骗宣传逃入深山的群众，也从我军剿匪的行动中，对我军有了正确的了解，纷纷返回家园，协助我军访贫问苦，进山追匪。这些都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打下了基础。

### (三)

要在东北站稳脚跟，必须有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舍此便不能更好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取得群众的密切配合，不能同国民党进行长期的、艰苦曲折的斗争。

早在部队渡海初期，我们即遵照东北局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武装，接收并改造政权，建立根据地》的指

示，以一部分兵力深入中小城镇和广大农村，宣传我党政策，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团体，帮助群众克服困难，改善生活，开展民主运动，建立政权。随着后续部队和地方干部的陆续到来，我们又遵照党中央关于发动群众，接收所有县政权，建立民主秩序的指示，紧密配合地方工作人员组织群众，开展反日伪残余、反汉奸、反特务的控诉清算活动和减租减息及增资运动，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恶霸，削弱了敌伪封建统治势力，逐步建立了工会、农会等群众组织。在这个基础上，安东省和辽宁省于十一月中旬召开了全省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成立省人民政府。高崇民任安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刘澜波任副主席；张学诗任辽宁省人民政府主席，车向忱任副主席。接着各县人民政府也相继成立。十二月二十八日，党中央、毛主席鉴于东北的长期斗争不可避免，发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并明确提出，建立这种根据地，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必须经过艰苦奋斗。建立这种根据地的时间需要三、四年，但是一九四六年一年内，必须完成初步可靠的创建工作。否则我们就有可能站不住脚。党中央的指示，为东北根据地的建设指明了方向。我们根据党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划分了辽宁、安东、辽南三个军区和各军分区所属的地区，部署了各部队开展群众工作的地区和任务，确定：辽宁军区建立以通化为中心的长白山地区根据地；安东军区建立宽甸、桓仁、凤城、赛马地区和红旗、

白旗、青城地区的根据地；辽南军区建立岫岩、万福、孤山地区的根据地。任务划分后，我们向所属部队发出了《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指示。各部队热烈响应军区党委的号召，积极开始了创建根据地的工作。

严冬，东北大地朔风怒号，茫茫原野白雪皑皑。各军区和各部队派出的小分队冒着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深入农村，开展根据地的建设。第一阶段的群众工作是十分困难的，少数坏分子到处散布流言，胡说共产党的日子长不了，跟共产党走国民党来了要掉脑袋。少数山匪也经常潜回屯子，杀害我积极分子，制造混乱。有些群众由于长期受日伪宣传的影响，也对我军持观望态度。针对这种情况，我军配合地方工作人员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老解放区的建设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况。与此同时，各省人民政府宣布了民主纲领，颁布了临时保护劳工条例、农民土地问题条例及惩治汉奸的规定。在农村实行“二五减租”，解决土地纠纷，收回日伪强占的土地；在城镇实行增资，改善人民生活，接收敌伪财产，保护私人企业和合法的营业者等措施。

根据这些纲领和政策，地方工作人员组织群众广泛开展控诉、清算运动，打击了敌人的气焰，鼓舞了群众的斗志。在这个基础上，实行“二五减租”，发动农民追回被多收的租子，大批佃农得到了实际利益。记得当时曾有一份一百五十个乡村的统计材料表明，在得到减租的七千

五百多户佃农中，即得到粮食八百四十四万多石。在控诉清算运动中，仅安东、宽甸两个县便追回被日伪强占的土地一万三千八百多亩和四亿多元，全部分给了贫苦农民。据桓仁县统计，每户农民得粮食六百多斤，钱六千多元。广大城镇的工人、职员工资也得到了提高。群众的斗争热情空前高涨，纷纷要求参加群众组织。各级工作队因势利导，很快就组织起了农救会、工会，建立了屯和村的农会组织。群众组织的壮大，增强了贫苦农民的力量，他们斗争更加坚定，使那些比较顽固的敌伪、恶霸、土匪、坏分子也不得不向群众低头，坦白他们犯下的罪行，从而在群众中克服了怀疑共产党和自卫军的思想。

火热的斗争，使广大群众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党，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翻身求解放的道理，阶级觉悟空前提高，一大批在斗争的急风骤雨中锻炼出来的积极分子茁壮成长，改造政权的条件已经成熟。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我们发动群众斗争和罢免了那些为日伪当走狗的伪区长、村长，用民主方式选出贫苦农民信得过的积极分子当村长和村政委员。当时，参加地方工作的同志曾在八个县搞了一个不完全的统计：这八个县在控诉、清算斗争中共培养了七千一百多名积极分子，在选举中有一千七百八十多名被选为屯、村干部，还有七十三名被提拔为区一级的干部。这些同志经过斗争的考验，革命立场都比较坚定。在我们建立民主政权后，有的敌伪坏分子对新当选的

民主村长威胁说：你们当自卫军的村长可得小心点，别看现在穷人闹得欢，共产党走后可有人给你们拉清单，到时你们的脑袋得搬家。不少村长不怕威胁利诱，他们十分坚定地说：所有这些我都不怕，共产党、自卫军不会走，就是走了我也要干到底！

在加强农村工作的同时，我们还特别重视城市工作。进入东北后，我们首先派出一批最优秀的干部担负各市公安局的主要领导职务。他们在那里建立警察队伍，制定城市治安法则，基本稳定了城市的秩序，安定了人心。记得刚到东北时，旅大的秩序比较乱。当时这里由苏联驻军，我军许多有病的高级干部在这里疗养，三分区的部队背靠旅大作战。我们考虑到旅大的战略地位，特地把从山东带来的赵杰同志派到那里当公安局长，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对旅大的警察部队进行了改造，市内治安情况有了明显的好转。

在稳定人心的基础上，我们派出工作队深入工矿、企业、街道，宣传落实党的城市工作政策，发动工厂复工，商店开业，学校开学，电台开播。同时协助地方干部集中主要力量发展工业生产。当时在东北局领导下，我们提出了凡是有原料、有条件的单位都要立即恢复生产的口号，帮助工厂尽快复工。为了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工作队还在地方党委的领导下，宣传党的保护民族工业的政策，开展增资运动，使资本家打消了顾虑，工人得到了实际利

益，工业生产的形势很快有了好转。工业生产的恢复，使民主政权和部队有了经济来源，不仅保证了南满部队的供给、经费，也支援了整个东北的部队。特别是南满的纺织工业比较发达，生产恢复后，部队的军装、被服有了来源，出关部队相继接到了崭新的冬服，这对坚持寒区作战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建设根据地的工作，使我军有了可靠的后方；翻身群众积极参军参战，使我军战斗力有了最深厚的源泉。在以后保卫南满的战斗中，大批工人、农民踊跃参军，保卫胜利果实；成千上万的群众，抬着担架，赶着骡马，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往前线运送粮食、弹药，往后方运送伤员、押送俘虏，使东北的解放战争成为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这是我们取得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根本。

#### (四)

南满是国民党同我们重点争夺的地区。在大批蒋军陆运、空运东北后，国民党即调集重兵不断对我南满地区发动进攻。在开辟辽东根据地的斗争中，战争始终是我们同国民党进行激烈斗争的主要手段。

依靠美帝的海运、空运抢在我主力部队到达之前赶到的蒋军精锐部队，占领锦州后继续空运部队和作战物资，同时，大量收编敌伪和地主武装，收编散匪，不断充实反革命武装。面对这种暂时敌强我弱的形势，党中央毅然决

定：“放开大路，占领两厢”，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和交通干线，让敌人背上包袱，拉长战线，分散兵力，失去进攻的锐气。而我则控制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和广大农村。为了落实党中央的指示，我辽东军区部队，遵照毛主席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在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以迟滞敌人的进攻势头为主要作战目标。在敌人进攻时，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达到迟滞敌人的目的后，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在根据地，则积极防御，每战力求选择敌人薄弱或孤立的部队，各个歼灭；在敌占区，则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消耗敌人，瓦解敌军，逐步改变敌我力量之对比。

一九四六年一月初，争夺辽东的第一场大战首先在营口一线开始。当时，进入东北的敌人在锦州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补充后，加紧抢占北宁线两侧要点，扩大占领区，以求从陆、海两处割断我同关内的联系，接迎其增援部队进攻沈阳。

一月五日，敌五十二军突然占我沟邦子、盘山，其目的是夺取营口，我军被迫奋起自卫还击。我们很快对部队进行了部署，令第二纵队第二旅于海城、第一旅率第一团及第三团一部于营口担任守备，监视海上敌情；第三团一营于田庄台，三营于古树子一带阻击从沟邦子进攻营口之敌；二团为预备队。一月七日，敌五十二军以其主力二十五师向我田庄台和营口发起进攻，我部队顽强抗击，双方

激战竟日，敌未能突破我阵地。入夜，敌二十五师主力渡过大辽河，从我右翼迂回营口，由于部队没有察觉，使敌顺利迂回至营口东，威胁我侧后安全，我军乃主动撤出营口。

第二纵队撤出营口后，经过三天的准备，趁敌立足未稳，重新向敌发起进攻。十三日十九时战斗打响，担任主攻的第一旅第一团在强大的火力支援下，一路猛插，直逼敌防御重点伪警察署和青林馆，迅速夺下这两个制高点。打红了眼的敌人立即蜂拥到原伪市公署进行阻击，双方鏖战至深夜二十四时。这时，接到国共双方一月十三日签署的停战令。为了表示和平诚意，坚决执行上级命令，我们指示部队就地停止攻击，双方军队的枪声在一条街的两边停了下来。两个小时后，经过喘息、调整的敌军突然宣布“停战令对东北无效”，又开始组织反击。我为自卫向敌发起总攻，从西、东、南三面将敌压缩于原伪市公署大楼，以连续爆破突入敌阵，将敌全歼。我们以歼敌一千七百五十九名的战果，取得了保卫营口首次作战的胜利。

全国停战令公布后，我们集中部队，进行时事政策教育，帮助干部战士克服和平麻痹思想，加强战备观念。毫无和平诚意的国民党反动派，匆忙把新六军运抵秦皇岛登陆后，公开破坏停战令，扬言“东北不在停战范围内”，悍然于二月初向北宁路两侧大举进攻，企图消灭沿线我军，开辟登陆场和运输线，为进占沈阳创造条件。为了打击敌

人的嚣张气焰，我们根据中央“要打一、两个大仗”的指示，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作战任务，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动员一切力量，配合在西满的兄弟部队，迟滞敌人的进攻。

二月十日，敌十三军、五十军进占公主屯、秀水河子地区。新六军由沟邦子进至胡家镇后，以二十二师向我盘山、台安、辽中发起进攻。我四纵十旅二十九团经顽强阻击后撤出盘山。敌二十二师占领盘山、台安、辽中，其六十六团及师教导队占沙岭。这时，盘山、台安之敌在辽河以北以西地区，形成一条线式防御阵地；沙岭之敌单独在辽河以南，成为孤立突出之部分。根据这一情况，我们当即决定，乘敌分散之际，集中主力于十五日晚攻歼沙岭之敌。

新六军是蒋军嫡系中的精锐部队，全部美械装备，曾参加过印、缅作战，号称“国内无敌”。二十二师是这个军的主力师，火力强，军官指挥能力比较高，士兵老，受反动思想影响深，有战斗经验，号称“虎师”。他们进攻沙岭后，迅速构筑了工事，阵地上外壕、鹿砦、铁丝网层层密布，村沿、街口、拐角修有大量地堡，有断续交通沟连接，形成了纵深配备的立体交叉火力网。在当时，攻打沙岭是一场硬仗。

我参战部队于十五日晚集结，以四纵五个团主攻，以三纵七旅于台安以南打盘山来援之敌，九旅的两个团及八

旅一个团集结于辽阳、辽中之间的小北河、大沙岭一带，阻击向辽阳前进之敌。

十六日下午六点，我部队发起攻击，阵地上炮火轰鸣，战士们勇猛冲杀。顽固的敌人，以猛烈的炮火配合各种轻重火器组成一个个严密的火力网，紧紧地封锁住突破口。我部队英勇顽强，死打硬拚，终于突破敌前沿。疯狂的敌人立即组织火力对我进行压制，并很快组织反冲击向我扑来。由于敌火力占了优势，为避免伤亡，发挥我军夜战特长，我们决定拂晓撤出战斗，调整部署。十七日夜，四纵以三个团从村东南、东北和村西第二次向敌实施突击，经过激烈争夺，再次突破敌前沿，但由于敌火力太猛，双方苦战一夜未能继续发展。十八日下午三点，我军第三次向沙岭之敌发起总攻，十二旅三十四团由村东投入战斗，三纵队十九团由村西加入战斗，前后夹击，连续冲锋，多次突破敌前沿阵地和二道防线，同敌展开肉搏。老奸巨猾的敌人，凭借工事坚固、兵力机动快等特点，以八二炮、六〇炮、轻重机枪、冲锋枪、火焰喷射器组成密集的火网压制我方行动，并组织部队不断向我反冲击。双方几进几出，反复拚杀了一夜，予敌以重大杀伤。十九日拂晓，我军再次撤出战斗，守敌在援军接应下放弃沙岭，仓皇逃回盘山。这时，三纵主力经两天两夜行军，于十六日向辽中立足未稳之敌发起突然进攻，歼灭敌之十四团三营，并予敌六十五团三营以歼灭性打击。沙岭战斗，是我

军在东北首次和全部美械装备的敌人作战。这一带是沼泽地，在敌有依托我无依托的情况下，将敌打跑，歼敌千余名，阻止了敌人的进攻，迫敌停止于辽河西岸，给敌人向辽南的进攻以当头一棒，保卫了中长路，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东北蒋军进攻受阻后，美蒋急忙集中第七舰队的运输舰从上海、广州、越南等地往东北抢运部队，待其兵力补充后，兵分两路再次向沈阳以南和以北进犯，矛头所向直逼本溪。

本溪是东北的重要工业基地之一，南满的煤钢之都，沈阳东南的门户，地形十分险要。敌人不占据本溪，沈阳将直接受到威胁，北进将受到钳制。因此，四、五月间，蒋军在大举北攻四平的同时，集中重兵，连续向本溪发起猖狂进攻。

四月一日，敌集中三个师的兵力向我发起猛攻，我三纵奋起反击。二日，敌二十五师进至石灰厂、三人沟、大甸子地区，我七旅和九旅二十七团勇敢反击，毙伤敌七百余名，将敌击退。向华子沟进攻的敌十四师也遭到我八旅二十四团的顽强阻击，敌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反复冲杀，几次接近我阵地前沿，我军顽强抗击，从早到晚，敌人未能越过我防线一步。这时，我保三旅和军区炮兵团一部对苏家屯的敌人突然发动夜袭，杀伤敌人一部，敌军被迫撤退，

敌争夺本溪首战失利，使敌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恼羞

成怒。四月七日，敌又集中三个多师的兵力再次向本溪发起进攻。

八日，敌二十五师在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亲自指挥下，从我七、九旅的结合部实施猛烈的迂回攻击，很快进占小四家屯、石窠屯地区，我九旅全力迎战，迫敌暂时转入防御。三纵队抓住这个机会，集中七、九两旅，于黄昏时突然迂回包围敌一个团，经过勇猛冲杀，敌除一部集体投降外，该团全部被歼。敌遭我打击后，狼狈逃窜，我部队乘胜追击，击毙五十二军副军长郑明新、二十五师师长刘世懋，歼敌一千八百余人。军长赵公武差点被我活捉，侥幸漏网后带领残敌仓皇逃走。

敌右路进攻我之十四师，在得悉二十五师被我追击后，急速北进解救，企图经大堡、英守屯夺下姚千户屯，迂回我三纵侧后，解敌之危。我们得到这一情报后，十分重视，当即决定，调四纵十旅进至姚千户屯，控制大英守屯东南有利阵地；三纵八旅一部隐蔽于大英守屯北山，待敌后尾进入大英守屯，向敌侧后猛烈攻击。敌十四师为救二十五师之围连日急进，赶至大英守屯时已疲惫不堪。黄昏，我乘胜向敌全面出击，敌仓促应战，死伤惨重，慌忙溃逃，我军跟踪追击，在长岭子一带抓住敌人迅速发起攻击，一举将敌击溃，先后消灭敌师部及一个多团，击伤敌师长龙天武，毙伤敌副师长以下一千三百八十多人，俘敌六百多名。

这次战斗，历时四昼夜，共歼敌四千余人，使敌十四

师损失三分之一，二十五师损失近半，震撼了东北蒋军将领。党中央和军委通电庆祝：此次本溪大捷，击溃顽敌两个师及一个团，歼灭不少部分，缴获甚多，配合四平方向击溃敌两个师并歼灭一部之胜利，必能引起于我有利之变化。望通令全军，鼓励士气，粉碎敌军之进攻。本溪、安东人民组织慰问团，敲锣打鼓，杀猪宰羊慰问部队，我军士气空前高涨。

敌两次进攻本溪失利，损失惨重，四平又久攻不下，与我形成相持状态。为改变这种被动局面，杜聿明在“东北停战一周”的幌子下，调整部署，决定集中兵力夺取本溪，去掉后顾之忧，尔后再集中优势于四平。

正在这时，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调保卫清平的三纵去支援四平，归总部直接指挥。敌人发现我南满只有一个纵队，兵力削弱，于四月二十八日，集中五个多师的兵力，共八万余人，兵分三路突然直扑本溪。四月三十日，我们接到中央关于立即布置死守本溪的计划和准备死守一个月的指示，便马上调整部署，以十旅的三十团和十一旅之三十一团在本溪以西的三会厂、松树岭、林家崴子及大虎沿、上下虎把什沟组织防御，赶修工事，进行死守。九旅及保三旅第七团，以一小部于架板山、塔山一线监视敌人，主力集结于牛堡子、石桥子附近，并在马耳山、歪头山铁路两侧构筑阵地，阻敌前进。

我防御部队刚刚部署，各路敌军即以师为单位，在飞

机大炮配合下，以猛烈火力向我阵地轰击，支援步兵以集团连续突击。左路敌二师和二十五师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向架板、塔山阵地猛攻。我二十七团在上有机扫射，下有炮火轰击的情况下，和数倍于我的敌人反复冲杀，坚决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军区急调三十四团支援本溪，侧击敌人。该团中途同敌二十二师相遇，发生激战，不得前进；我二十七团和保三旅之七团遂转移至大柳家屯、歪头山阻击敌人。五月二日，敌以优势火力摧毁我歪头山阵地工事，支援步兵攻占了歪头山要点，我防御阵地被割裂，敌乘机向我纵深发展。三日，敌机轮番向我阵地和市区轰炸扫射，强大的炮火支援步兵连续冲锋，终于在傍晚突破我第三防御阵地，发展至老市区，我同敌人逐街争夺，展开激烈的巷战。

这时，敌右路八十八师在响山子一带与我十旅及十一旅之三十二团形成对峙。敌中路之二十二师正在松树岭、下虎把什沟、大河沿阵地与我三十团、三十一团激战，由于敌空中与地面火力都十分猛烈，我阵地工事多处被摧毁，敌数十次突入我阵地。两个团顽强抗击，多次展开白刃格斗，杀伤敌人千余名。三十团有四个连队，干部全部伤亡，每连只剩下十几个人，仍然死守阵地，寸土不让，获“守备模范”光荣称号。

我们及时分析了战场形势，认为现在部队防御面太宽，兵力不足，敌我力量相差悬殊，不宜死守。因此，我

们于五月三日向党中央请示：三纵调走后，南满兵力太弱，由于接到死守本溪的指示太晚，本溪新老城区南北长二十余里，附近山石坚硬，来不及修筑坚固工事和储备充足的粮食弹药，在敌人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不宜死守城市。为避免被动，保存军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建议放弃本溪。党中央很快批准了我们的建议，我军遂于四日凌晨主动撤出本溪。根据军委的指示，以一部分部队休整补充，一部分部队利用本溪至凤城山地构筑工事，节节抗击敌人，消耗其有生力量；同时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后配合地方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破坏敌人交通运输，分散敌人兵力。总计，第三次保卫本溪，歼敌两千余人。五月六日，党中央来电指示：本溪虽失，你们牵制敌人甚多，这就是胜利，望鼓励各旅，继续于本溪周围阻击敌人。我们按照中央指示，胜利完成阻击敌人的任务后，各主力部队转移阵地，组织防御，进行休整。

五月，四平失陷。敌人调集大军猛攻长春，战略目标直指北满，北线形势十分紧张。为了钳制和调动敌人，我们决定发起鞍海战役。

当时，敌留一八四师守备鞍山、海城、大石桥和营口一线（中长铁路南端）。军区认为，敌一八四师各守备地区兵力不足，尤其是鞍山，市区大，兵力薄弱，于是，我们于五月十五日决定，乘鞍山、海城地区敌兵力分散薄弱之际，消灭该敌，夺取鞍山。四纵十二旅和十一旅一个

团，除向辽阳、宫园一线之敌担任警戒外，以主力攻占鞍山；辽南一分区主力袭击海城，钳制敌人，使其不能北援；辽南一分区一部向鞍山、营口间展开破袭战，占领敌人防守薄弱的据点；安东三分区部队担任抚顺方向警戒，并以一部伸至沈阳、本溪和本溪以东活动。为加强对攻打鞍山、海城部队的领导，军区决定由四纵副司令员韩先楚、副政委欧阳文统一指挥。

二十四日拂晓，我四纵主力经过一夜隐蔽行动，突然出现在敌阵地前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发起攻击，十一旅三十二团首先攻克七岭子，守敌狼狈逃窜，我军一路穷追，将其一举全歼；第十旅二十八团顺利歼灭唐家房之敌，下石桥子之敌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向我举手投降。至此，鞍山外围之敌全部肃清。接着，我军向鞍山市发起总攻，各部队大胆迂回穿插，迅速攻占伪市公署大楼，把敌指挥所打乱，残敌大部龟缩于女子中学顽抗。我一面在炮火掩护下连续爆破，一面火线喊话，展开政治攻势，敌被迫缴械投降。余敌全部就歼。

蒋介石、杜聿明见我攻克鞍山、进逼海城，威胁其侧后，十分惊慌，赶忙停止北犯，急调九十三军、新一军、六十军及五十二军的五个师零三个团，火速南援。为调动和钳制更多的敌人，配合北满部队作战，我们决定：以一部兵力坚决阻击南援之敌，四纵十旅乘胜消灭大甘泉铺之敌后，继续南进，夺取海城。

二十八日黄昏，我第十旅向海城发起攻击，敌依托山头高地和炮火优势进行顽抗。阵地上炮火纷飞，烟硝弥漫，枪声、炮声、喊杀声响成一片。双方激烈争夺一夜一天，我军终于在二十九日傍晚拿下玉皇山，突入东门，将敌彻底包围。在阵地上，我军向敌人展开政治攻势，敌见大势已去，遂要求停止攻击，请我派代表与其师长商谈。深夜十二点谈判成功，师长潘朔端率海城守敌师部及五五二团宣布起义。接着我军进逼大石桥，派一八四师参谋长马逸飞，持以我的名义写的一封信和潘朔端的亲笔信，令守敌五五一团团长放下武器。谈判持续了两天，敌只谈不降。这时，我们发现这个团长已接到让其代理师长的命令，因而故意拖延时间等待援敌。当时，援敌已节节逼进。于是，我于六月二日黄昏，向大石桥发起进攻，经一夜突击，于第二天凌晨将敌主要阵地攻克，守敌匆忙向营口方向逃窜，被我保安第三团全歼于大石桥西边的北甸子一带。

鞍海战役，共歼敌一八四师五五一团和五五〇团（欠一个营），迫敌师长潘朔端率师部及五五二团起义，共毙伤敌人一千二百余名，俘敌团长以下二千一百余名，两千七百多人参加起义。辽阳以南铁路线全部收复，威胁沈阳，有力的支援了北满作战，打乱了蒋介石进攻北满夺取哈尔滨的布置，对东北以后的斗争起了重要的作用。潘朔端起义后通电全国，表示要与民主联军合作，致力于反内

战斗。潘的起义，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鼓舞了我军的士气，在东北战场创造了首次争取大批国民党军反内战起义的辉煌战绩。党中央、毛主席专门来电表扬鞍山战斗打得很好。

一九四六年六月七日，东北开始休战。七月初，东北局于哈尔滨召开党的扩大会议，七月七日作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东北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即七七决议），纠正了在和战问题上的错误思想，特别强调必须坚持党中央关于创造东北巩固根据地的方针，提出无论在目前或今后一个时期内，创造根据地是我们第一位的工作，并把重点放在中小城市和次要铁路线在内的广大乡村，中心任务是发动农民群众进行翻身斗争。这次会议还决定把三纵和辽宁军区重新划归辽东军区，加强了辽东的兵力。在这次会议精神的指导下，辽东军区抽出大批干部参加群众工作团，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发动群众从“反奸清算”入手，开展群众斗争，集中打击大汉奸、豪绅、恶霸、大地主、土匪头子，没收其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在这个基础上，广泛开展了反霸占、反贪污及减租减息、分地、分粮的斗争。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农村政权，初步解决了土地问题，建立了民兵、自卫队组织，广大群众“保田、保家”的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

在加强根据地建设，利用七、八、九三个月进行休整的同时，我们还派出了一部分兵力到边沿地区，配合当地

政权和地方武装，开展反蚕食斗争，并派出精干的武工队、游击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活动，疲惫和消耗了敌人，支持了敌后人民斗争。

在这个时期内，我军还在桓仁、通化以东开始建设小型的兵工厂，被服厂，屯集粮食，开设医院，并取得了苏军和朝鲜的大量武器援助，武装了部队，并海运内地，支援了山东部队和新四军部队；还搜集接受了大量物资，如布匹、棉花等等，补充了南满与北满的部队。

自从宣布东北休战以来，东北敌军经过三个月的整补、编组、待援后，其实力达到七个军的正规部队和相当于二十个丙种师的地方武装，总数共约四十多万人。在敌元气恢复后，又采取“先南后北”的方针，向我展开大规模的进攻。

为破坏与推迟敌人进攻哈尔滨和安东，争取时间加强根据地建设，根据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指示，三纵及独二师、三师出击四（平）梅（河口）线，积极在长春西侧和西丰地区寻求战机，先后在西丰歼灭敌人二〇七师一个工兵团和一八四师一个新兵营；在石河、马鲁岭地区歼敌两个营；在太平岭歼敌四个连，共约两千五百多人。接着又在通化地区节节抗击敌人，使敌人数日没有得到进展，敌我暂时处于对峙状态，基本达到了迟滞敌人前进的目的。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九日，敌人在巩固沈（阳）吉（林）线后，又聚集主力十万之众，依托中长路、吉沈

路，分路由西而东，向安东、通化地区进行宽大正面的进攻，企图将我压迫于长白山区，进行决战。其布置以新六军（美械化）沿海城、庄河公路迂回安东，并以一部协同新组成的一八四师五五〇团沿中长路南返；五十二军（欠一九五师）沿安沈路进攻安东；以一九五师、二〇七师、新三十师、一八二师由兴京、山城镇、柳河、金川向通化进攻；九十一师在抚顺为预备队。另以七十一军（欠九十一师）和保安团向西满通辽进攻，策应其主要方向的作战；以新一军（美械化，欠新三十师）及六十一军暂二十一师利用松花江障碍，防御北满我主力。面对强敌进攻，我们决定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集中主力歼敌一部。

战斗开始，我们先以三纵之一部在新宾、通化之间阻击敌人；以四纵一部在安沈线进行运动防御，迟滞敌人前进，主力集结于海城进犯之敌右侧，阻击进攻之敌，寻机歼敌一部；独二、三师和各分区部队积极向金川、辉南、南城子、永陵、本溪等地活动，给敌造成部队在向安东转移，通化、桓仁空虚的假象，使其放胆前进，以造成我歼敌的机会。

起先，我军准备歼灭突击深入之一九五师，后见该师进展缓慢，而敌五十二军之二十五师，却钻隙突破、大胆迂回，冒险深入于安沈线以东地区。我们对这一情况作了研究，认为该师号称“千里驹”，到过印缅作战，装备精良，是蒋嫡系部队，杜聿明起家的老本，让其深入对我威

胁很大；该敌虽然错误估计我军力量，趾高气扬，但以往曾多次遭我打击，新兵增多，战斗力开始降低，且这次孤军深入，处在运动之中，距南北两路之敌较远，一时难于来援；加上这一带山峦重迭，群众条件较好，有四纵两个师的兵力和地方武装，便于我隐蔽集结，迂回穿插。如将该敌歼灭，对打击敌人的锐气，延缓其行动，争取时间开展战局和掩护后方转移都有重要的意义。于是，我们决定放弃安东，组织新开岭战役，集中四纵全部，歼灭敌二十五师。

十月二十二日，新开岭地区雨雪交加，北风凛冽。我十一师一部踏着泥泞在分水岭顽强阻击敌二十五师，在掩护主力转移集结后，即撤出战斗。敌二十五师占领赛马集后，留两个营驻守，主力向凤城前进。此时，我十二师主力已到赛马集东北与十一师主力会合。为调动敌人回援，打乱敌人部署，军区决定歼灭赛马集之敌，迫二十五师回援。二十四日下午，四纵队以部分兵力向赛马集进攻，于次日拂晓将敌击溃，歼敌二百余名，残敌匆忙向小市方向的山区窜逃。敌二十五师得知后，果然回头援救，于二十七日上午进至赛马集西南的双岭子一带。我即以十一、十二师向其发起攻击，在毙伤、俘敌八百余人后，撤出战斗。以一部兵力保持与敌接触，节节抗击，诱敌深入；我主力则转移至新开岭地区集结。这时，刚刚占领了安东的杜聿明、赵公武得意忘形，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错误地认为，

现在辽东半岛空虚，我军向新开岭地区转移是因侧后受威胁，由赛马集向东溃退，遂令二十五师立即跟踪追击。敌二十五师接令后，迅速向东进犯，于三十日晚进入了我预定战场——新开岭地区。

正当敌人踌躇满志之际，我集中八个团的主力，以猛烈的火力突然向敌发动攻击。敌三面被围，一日被歼九百余，十分恐慌。师长李正谊急电杜聿明，要求一日内增援。但是增援部队遭我部队阻击，进展迟缓。为逃脱被歼灭的命运，敌将主力集中于老爷岭、黄家堡子，并组织起三千人的反冲击部队，对付我军的冲击。我九次攻击均未成功，敌我争夺极为激烈。

这时，敌支援部队已逼近我后方，情况非常紧迫，新开岭战役已到最后关头。攻击部队在四纵韩先楚副司令员建议下，集中炮火猛轰老爷岭。炮弹打中了敌师部附近的汽车，使十几辆汽车和几百辆大车起火，敌师部顿时大乱，烈火，浓烟四起，人员、牲口，车辆乱冲乱撞。我投入总预备队向敌展开进攻，一举将敌三千人的反冲击队击溃，打乱敌师部指挥系统，夺下了老爷岭。失去控制的敌人在阵地乱窜，我立即对敌进行围歼和开展政治攻势。在我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敌军纷纷举械投降。战斗结束，共毙伤敌团长以下一千六百余人，俘敌师长李正谊、副师长段培德以下五千八百七十七人，敌七千余人全部被歼。

新开岭战役创造了东北我军在解放战争中首次歼灭敌

人一个师的先例，极大地鼓舞了我军士气，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十一月三日，党中央、毛主席来电祝贺：庆祝你们歼灭敌人一个师的大胜利，望对有功将士传令嘉奖。

新开岭战役前后，辽东军区我军在其他方向上的部队，坚决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在各条战线上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自十月十五日至十一月三日，经过连续紧张的作战，全区部队共毙伤敌七千五百九十多名，俘敌六千二百余名，共歼敌一万三千七百余名。我们主动放弃了安东、通化等城市，歼灭了一部分敌人有生力量，大量牵制了敌人，保证了北满加强根据地和野战军的建设，同时延缓了敌人对长白山区的进攻。这次作战也使南满我军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加深了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作战方针的理解，提高了指挥艺术和战术水平，这些都为以后的四保临江战役创造了条件。

一九四六年十月三十一日，东北局决定乘敌大举进攻南满、西满，吉林、长春以北空虚，关内尚无增兵和松花江即将结冰之际，集中主力，以出敌不意之行动，突然出击江南，各个歼灭敌人与调动南满之敌。南满我军则以削弱和抑留敌人，保存自己，坚持根据地为基础任务。

为加强南满斗争的领导，东北局决定成立南满军区，陈云、肖劲光同志分别兼任南满军区司令员、政委，陈云同志为南满分局书记，我任副司令兼副政委，并任分局副书记。从此，南满人民的解放斗争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 老航校诞生前后

黄 乃 一

建国三十多年来，我国的航空事业有了飞速发展。现在不但有了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和海军航空兵，民航事业也初具规模；而且有了自己的航空工业、航空院校、航空科研等，构成了比较完整的航空体系。

我国航空事业的发展，是和我们党一贯重视航空事业分不开的。我党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简称老航校）的建立，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党大举向解放区进攻的战争环境下，老航校经过不足四个月的筹建，于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正式成立。到一九四九年初，训练时间不足三年，培养出飞行人员一百多名、领航员二十多名、各种地勤人员三百多名。这些同志后来成为我国航空事业各部门的重要技术、领导骨干。老航校这段历史，是党史、军史的一个片段，是我国近代航空发展史中短暂的一页，但也是承前启后不可缺少的一页。

我所写的这段历史，不是老航校经验的总结。从今天

的观点看，如果把当年的某些表面现象当作经验借鉴，如牛车拉飞机、酒精代汽油、招收航空学生文化程度偏低等等，那肯定是一无可取的，因为历史条件已经变了。然而，回顾这段历史，我总觉得当时同志们那种革命的坚定性、创造性和科学性，使人振奋，催人向上，给人以鼓舞！

革命的坚定性，主要表现是：为了实现人民的期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面对任何艰苦、困难和危险，都不气馁，总是千方百计去战胜它，继续前进。

革命的创造性，主要表现是：旁征博览前人的有关经验，当没有现成的路可走时，必须根据当时当地实际情况，创造条件，自己闯出一条路来。

革命的科学性，主要表现是：尽管任务要求急，革命热情高，也不能任意蛮干，特别是航空事业，稍一不慎，机毁人亡。因而，凡重要决策，必须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进行必要的试验，按科学规律办事。否则，欲速则不达，反受损失。

老航校的创业者们总是本着那么一个思想，一种精神，一股劲头，那就是：实事求是，奋斗不息！创业者们的这种思想，这种精神，这股劲头，使我感受极深，长久不忘。

我所写的老航校的部分历史，只是亲身经历中印象较深的，与老航校诞生直接有关的一些史实。我力求反映出老航校的真实面貌，但是，时隔三十多年，难免有误差或

遗漏。不妥之处，期待和欢迎熟悉当时情况的同志提出校正、补充。

## 我党一贯重视培养航空人才

我党第一所航校的建立，并不是偶然的、一帆风顺的。她是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战胜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在斗争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

为了准备建立人民的航空事业，我党在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就十分重视培养航空人才。

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我们党就选送了一些党员到苏联学习航空专业。其中有常乾坤和王弼等同志。他们在苏联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工作和研究，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才回国。回国后，他们在新疆和延安一直从事航空事业的研究和为党培训航空人才。他们是我党培养的第一批航空事业的领导骨干。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仍不断输送人去苏联学习航空。在刚刚结束长征时，即决定从留苏学生中选送一些同志去苏联航校学习。一九三五年九月，从苏联东方大学和列宁学院的留学生中，选送了刘风、王连（朝鲜族）、王春、李凡等七人去苏联第三航空学校学习。其中二人中途淘汰，五人毕业。这是我们党培养的第二批航空骨干。王连、王春、李凡和刘风等

四人，于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先后回国。开始在新疆我们党组织的航空班工作，一九四〇年底，他们和常乾坤、王弼同志一同从新疆回延安。可惜王春、李凡同志在途中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抗日战争时期，在一九三七年新疆统一战线形势较好时，我党从西路军进入新疆的人员和延安抗大、摩托学校中，选调了四十三名同志，利用盛世才航空队进行培训。其中学飞行的有方华、吕黎平等二十五人，学航空机械的有严振刚、朱火华等十八人。一九四二年盛世才倒向蒋介石，破坏新疆统战局面，将我党在新疆工作的大部分人员以及在航空队学习的四十三名同志关押囚禁。直到一九四六年六月，经过党中央、周恩来同志反复交涉，他们才获释出狱，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回到延安，一九四七年三月到达东北老航校。这是当时航校和后来我党航空事业的一批重要骨干。

一九三八年前后，在国民党统治区，我地下党还布置了一些青年同志投考国民党空军的飞行学校和机械学校，利用国民党的航校为我们党培养航空人才，或通过地下党的工作，争取国民党空军航校和工厂的青年航空技术人员。这些同志，有的经过一段学习或工作，初步掌握了一些航空专业知识和技术，先后脱离国民党空军学校、工厂来到延安。其中学飞行的有魏坚、吴凯等同志，学航空机械的有张开帙、杨劲夫等同志。这些同志到延安后，先后在摩托学校、工程学校、工程队、俄文学校工作或学习，

以后转到老航校学习和工作。

为了培养更多的航空人才，一九四一年三、四月间，经党中央批准成立了延安工程学校，有学生近一百人，在这里学习航空基本原理和航空机械知识。同年七、八月间，延安工程学校并入抗大，改称抗大工程队。

以上这一系列事实，充分说明我们党很早就关心和重视建立自己的航空事业。从大革命起，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尽管在极其艰苦困难的战争环境中，仍坚持通过各种途径为筹建人民自己的航空事业培养人才。这些准备工作为老航校的创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 中央决定在东北建立第一所航校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后，掠我资源，开办工厂，修建铁路，客观上也使东北有了较强的工业基础。他们还修建了数十个机场，保留着战略总预备队“关东军”及其配属的空军部队，战败后在东北留下了大批机场和航空器材。东北又与苏联接壤，有利于我沟通国际联系。因此，夺取东北对我们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东北筹建我军航校也有一些物质条件。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日本关东军迅速溃败。日本政府八月十四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党中央、毛主席当机立断决定调动军队和干

部挺进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造成影响革命全局的新形势。同时指示：要组织延安航空研究小组的同志和原工程学校（抗大工程队）的部分同志随军进入东北，利用日军留下来的机场设施、飞机和航空器材等条件，筹建航空学校，为以后建立人民的空军和航空事业培养骨干力量。

因此，在我军先机进入东北的同时，所有学过航空的人员也先后陆续调往东北。九月份，常乾坤带领延安航空研究小组和原工程学校部分同志组成首批建校骨干，从延安出发。我当时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过去并没有学过航空，但参加了第一批自愿报名去东北的干部团。我们是九月三日从延安出发的。临行前，刘少奇同志在欢送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着重强调进军东北要做好战胜各种困难的思想准备。他把当时能够设想到的困难以及危险一条条地提出来，我记得其中谈到，万一你们去的地方已经被国民党占领，就要像孙悟空那样，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去，见机行事，消灭敌人。少奇同志分析了八、九条困难之后，又提出“最后还有一条困难，叫做意想不到的困难”。教育我们对待困难和危险，要多设想，预料到了，有了准备再大的困难和危险也不怕，怕的是没有想到困难，缺乏战胜困难和危险的精神准备。我们干部团在十一月初抵达沈阳。不两天，东北局组织部通知我到沈阳航空队任政委，着手筹建航校。

## 蔡云翔等驾机起义，奉调东北参加建校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日本宣布投降刚一个星期，蔡云翔等在地下党的组织下驾机起义飞到延安。这架飞机是日式“九九”双发运输机，是汪精卫伪政府的一架专机，名叫“建国号”。驾机起义的共六人。他们到延安的第二天，即受到朱总司令和叶剑英参谋长的热情接见。在日本帝国主义刚刚失败，蒋介石又蓄谋已久要打内战的重要时刻，他们这一行动开创了从敌人阵营中驾机起义，投奔革命的先例。这对瓦解敌军，建设人民的航空事业，都是很有意义的。为了纪念蔡云翔等人八月二十日起义飞到延安，当时就把这架飞机编为“820”号。不久，他们先后奉调到东北参加航校建设。

和蔡云翔等一起参与策划起义，但未能搭上八月二十日起义飞机的部分人员，何健生、白起、吉翔、陈静山以及秦传佳和家属等共二十余人，十月从江苏分批出发，经山东解放区，于一九四五年底至一九四六年初，也先后到达东北参加了航校建设。

## 接收林保毅部队，为我培训航空人才

林保毅，本名叫林弥一郎，是日本侵华空军在东北的一

个飞行部队的部队长。他领导着一支三百多人的部队，拥有一部分零式战斗机，驻在本溪附近的奉集堡机场；另一部分是作为训练使用的教练机，驻在沈阳机场。这个部队技术装备齐全，飞行人员的技术也较好，是一支富有飞行训练经验和一定作战能力的飞行部队。林保毅本人飞行技术好，也能团结部下，在该部队中有较高的威望。

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后，我们接收了这支部队。在接收过程中，我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认真贯彻优待俘虏的政策。他们深受感动，一方面表示希望遣返日本；另一方面又表示在回国前，愿去修公路或者到煤矿做工。几天后，我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伍修权同志在沈阳接见了林保毅及其部队的几个主要军官。这次接见，对他们极深刻的教育。伍修权同志指出：你们想在回国前做些工作，这很好。现在我们需要办一所航校，训练航空技术人员。你们在这方面有特长，有经验。欢迎你们在回国之前，帮助我们培训航空技术人员。林保毅等临走时，伍修权同志解下腰间佩带的手枪，送给林保毅，并说“这是长征以来一直随身携带的手枪，送给你作个纪念吧！”这个举动完全出乎林保毅和其他几个日本军官的意料，他们称这是共产党人伟大气魄的范例，十分感激，表示愿为我们效力。

林保毅这支部队，大体有飞行员近二十人，机械师二

十多人，机械员七十多人，通讯、气象等其他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二百人。这些人员，在我东北航校初创时期，在飞行训练和维修飞机方面都是很重要的技术力量，为我们培养航空人员做出了贡献。

## 沈阳航空队组成，初步确定办校方针

接收林保毅部队后，派谁去做他们的工作呢？正好，十一月初刘风带蔡云翔等人，由张家口来到沈阳，东北局就决定派他们去做林保毅部队的工作。首先组织日本机务人员去修理尚能修复的飞机。就这样，刘风、蔡云翔等八个中国人加上林保毅部队的三百多个日本人，组织了沈阳航空队。十一月九日，东北局组织部分配我到航空队任政委。

十一月九日，我到航空队任政委的当天晚上，总部参谋长伍修权同志找我谈话；第二天东北局书记彭真同志又找我谈话。谈话的内容大致相同，他们讲了沈阳和整个东北的形势，讲了中央对在东北办航校的条件分析和决心。之后，他们着重对航空队当前的主要任务；对起义人员的工作方针；对日本技术人员的工作方针；对航校招生和训练工作的方针等，都作了明确具体的指示。

关于航空队当前的任务，他们提出：主要是发动群众搜集航空器材；组织日本技术人员抓紧修理飞机；学过飞

行的同志要尽快恢复飞行，熟悉和掌握飞行技术，为航空运输和建立航校创造条件。

关于对起义人员的工作方针，他们提出：对待起义来归的人，要始终保持热情欢迎的态度。有的人历史、社会关系复杂，最关心对他们是否信任。我们须知起义过来很不容易，要冒很大风险，起义后应该得到信任；工作安排要使他们有职有权，敢于大胆工作。要深入了解其思想和经历，了解不是追究历史问题，而是为了帮助他们进一步提高革命觉悟。对生活、作风上的问题，要教育启发提高觉悟，不宜操之过急，也不能听任自流。

关于对日本留用技术人员的工作方针，他们指出：林保毅的部队，是侵华空军，受法西斯和武士道的毒害较深。但他们既答应帮助我们培训飞行员，我们就不能把他们当俘虏对待。我们的方针是：生活上优待，人格上尊重，工作上严格要求，思想上尽力帮助。这批人究竟能为我们工作多久，能否尽力地为我们工作，一方面要看整个形势的发展；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看我们的工作。他们反复叮嘱我们，一定要按照党的正确方针政策做好教育争取工作。

关于怎样办航校，首先遇到的是招生问题。他们明确指出：东北在日本和伪满统治下十几年，目前刚解放，不宜就地招考飞行学生，应考虑从部队选调。究竟选什么样的人，特别是飞行学员需要什么条件，可征求起义人员和

日本飞行人员的意见，和他们研究后提出。后来，我们研究的结果，主要提出了以下几条：一要出身较好，历史清楚，有较高的阶级觉悟；二要体检合格；三要年轻；四要有一定文化水平。

关于航校训练方针问题，他们指出：目前我们处在非常时期，不能按正常情况办学。美国、日本、苏联以及国民党，他们的航校训练飞行员都要三、四年。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我们需要在最短的时期内培养出自己的飞行员和飞机修理人员。我们要从实际出发，针对学员文化水平不高的情况，主要用师傅带徒弟的办法，进行实物教学。

这些指示，是当时航校工作的重要方针。在贯彻这些方针的过程中，有的问题有过激烈的争论，在实际工作中也有过反复，甚至走过弯路，但实践证明，这些方针是适合当时情况的，是正确的。

## 航空委员会的成立及其首次会议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左右，伍修权同志在沈阳召集我们开会，他宣布：东北局决定成立一个航空委员会来加强对航空事业的领导。这个委员会，暂由伍修权、黄乃一、刘风、蔡云翔、林保毅五人组成，伍兼主任，黄兼秘书长。正在延安赴东北途中的常乾坤、王弼两位同志也是委员会成员。委员会近期的主要任务是领导筹建航校。

根据目前形势和客观条件，办航校不能照搬人家的老办法，不能等什么都准备好了再招生进行教育和训练，应学习和发扬抗大精神，尽快接收学生，教职学员一起动手，边建校、边训练，用最快的速度，在最短的时间内，为中国人民早日培养出飞行员和飞机修理人员。

会议决定了当前要抓紧进行的几项工作：

一、由刘风主要负责，组织人员去各地修理飞机和搜集航材、航油，搜采路线是先南后北，飞机修好一架，飞回（沈阳）一架。

二、由黄乃一负责，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提出招收学生的条件、学生来源、训练方针以及航校机构的设置等方案，交委员会下次会议讨论通过后，报总部审批。

三、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尽快把现有人员组织起来，正式成立航空队，按军队办法实施管理。

会后不几天，由于时局变化，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一直没能召开。但首次会议的精神，对航校的筹建工作起到了指导作用。

## 国民党进攻沈阳，航空队向通化转移

航空委员会首次会议后不几天，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向我各个解放区进攻，东北的形势也日趋紧张。约十一月下旬，东北局和总部撤出沈阳，驻到本溪。总部指

示：航空队派人迅速去通化侦察，准备转移去通化筹建航校；搬到通化后，迅速从部队中选调学生，可成立一个学生训练队，再成立一个飞行队，准备执行临时紧急飞行任务；两个队上面设个总的机构来统一领导；到通化后，总部将委托通化地委书记兼后方司令部（也叫军分区）政委吴溉之和司令员朱瑞管理筹建航校的事情。

部队做好了准备之后，十一月下旬，我们开始从官源向通化转移。先遣部分人员去通化准备机场和驻地，随即将能飞的飞机分批转场通化。当时，航空器材十分紧张，暂不能飞的二十多架飞机，也必须转去通化，但既没有火车，也没有汽车，我们只好把飞机的机翼卸下来，装在大板车上，机身装上轮子，把机尾绑在大板车后边，用牛、马、毛驴等牲口拉着大板车向通化转移。一路上经过不少盘旋曲折的山路，老百姓见了，风趣地说：“嘿！牛车拉飞机，真稀奇！”我们也感到好笑。

## 第一次招生

我们在通化稍事安排后，即着手招收飞行学生。按照总部的要求和我们的原定计划，飞行学生都要从部队中选调。当时各部队都在前线打仗，上哪儿去选调学生？我们正在着急的时候，山东抗大分校在十一月底和十二月初到达通化，他们带来一千多名学生，都是从战斗部队选送培

养的青年战士或在胶东老解放区吸收的青年学生。这正是我们选调飞行学员最好的对象。于是，我们立即请示东北局，决定从山东抗大分校选调学生。原预计选调一百二十名，最后合格的只有一百零几名。一九四六年一月份，通化炮校从他们的毕业生中又选送了五名学生到航空队。随后又从华东新四军地区以及解放区的山东大学陆续选调来三、四十名学生。

这批学生的大体情况是：年纪轻，多数在十七、八岁至二十岁左右；在部队或老解放区的农村，经过战争环境和艰苦生活的锻炼，有较高的阶级觉悟；身体健康；他们中有些是在解放区农村上过小学或初中，有的是参军后在部队学了点文化，多数的实际语文程度只相当于正规的高小，仅炮校和山大少数学生有中学程度。在选调学生工作中，当时有过不同的意见，有时争论还很激烈，但实践证明，因为这些学员阶级觉悟较高，学习目的明确，学习努力，绝大多数人都学得很好。身体好，适于飞行的都飞出来了；学机务的也很快掌握了实际维修技术。有的在抗美援朝空战中，还当了战斗英雄。

## 林保毅飞行事故发生之后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部队刚转到通化不久，机务人员修好了一架飞机，林保毅亲自试飞。不幸飞机起飞

后，发生事故摔了下来，林保毅负了重伤。我们要求医院全力抢救。几个小时后，当他苏醒过来，看到我们守护在他的身旁，看到大家都十分关心他，他感动得热泪盈眶。

林保毅以后常说，这次事故负伤，醒来时看见中国同志关切地守在他身边，深受感动。使他进一步加深了对共产党、八路军的认识，对他以后的思想转变有很大影响。后来他在工作中一直认真负责，为我们培训飞行人员作出了贡献。直到一九五六年才返回日本<sup>①</sup>。

## 航空总队正式成立

航空队接收学生后，人数有很大的增加，全队人员总数已近六百。其中，领导干部、飞行人员、警卫人员和学生共有二百余人；日本留用人员有三百多人；此外，还有二十多名朝鲜人。

由于航空队人数巨增，为了加强领导和管理，我们提出编制方案，经东北局批准正式成立航空总队。总队下

---

<sup>①</sup> 一九五六年林保毅回国后，一直把中国当做他的“第二故乡”和“第二祖国”。为了开展日中友好活动，他亲自发起和组织了“航七会”（即原在中国七航校工作过的日本人组成的日中友好组织）。后来又组织“中国归国者友好会”（即会员不只是原七航校成员，凡从中国解放区回去的都可以参加）。进一步又发展成为“日中和平友好会”（即到过和没有到过中国的日中友好者都可参加），会员已有八百多人。林保毅自一九七七年起，多次来华

设：教导队（即学生队）；民航队（准备承担一些紧急的飞行运输任务，由起义飞行员和部分日本飞行员组成）；机务队（负责外场修理）和修理厂（负责内场大修）等。

一九四六年元旦，全体人员举行了航空总队成立大会。会上，朱瑞同志受总部委托正式宣布航空总队成立，并宣布了干部任命：朱瑞（东北民主联军后方司令部司令员）兼任总队长；吴溉之（通化地委书记，后方司令部政委）兼任总队政委；常乾坤（尚未到达通化）和白起任副总队长；林保毅任副总队长兼教导队队长，黄乃一、顾磊任副政委；白平任政治部主任；蔡云翔任民航队队长；刘风任民航队政委；陈乃康任教导队政委。

航空总队正式成立后，我们继续组织机务人员到各地修理飞机。到一九四六年初，在通化共有二十来架飞机可以飞行，个别教员的恢复飞行训练已逐步开始。选调来的学生则陆续开始补习文化和学习航空基本理论知识。

为了做好教育争取日本留用技术人员的工作，党中央和东北局专门把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组织干事杉本一夫（本名前田光繁）抽调来航校，专做日本留用技术人员的工作。我们在政治部专设一个日本人工作科（对外称技术人员工作科），任命杉本为科长，并在日本机务人员中经过考核逐步选调了几个干事。这不仅有利于我们内部开展日本技术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而且也有利于和当地党委及驻军配合开展外部日本人的工作。

为了加强总队内党的活动和政治思想工作，按总队新的编制，我们及时调整了党的支部，选举成立了总支。

## 参加平息“二·三”暴动

通化“二·三”暴动，是国民党为了配合其正面军事上的大举进攻，派遣特务孙耕尧在我后方串通日本反动军人策动的一起反革命暴乱。孙耕尧是国民党通化特区书记长和特派专员，他看到小小的通化地区，在日本军队溃败时竟集结了十余万日本居民和关东军溃散军人，便想利用这股力量推翻我政权，策应军事上的正面进攻。他和日本关东军一个师团参谋长滕田相勾结，暗地策划暴动。他们提出煽动日本人的口号是：“推翻中共政权”、“成立中日联合政府”、“实现中日亲善”、“东亚共荣”等。暴动计划是由滕田拟订的。滕田负责策动并指挥日本人，孙耕尧负责策动中国人。他们梦想在我欢度春节之夜，二月三日凌晨四点发动暴动，企图打我们个措手不及。

当时，航空总队刚成立一个月，修好和待修飞机全部在机场，位置突出，而且机场驻的大部分是日本人，防卫力量薄弱。我们名义上有一个警卫连，实际兵力只有三个班，而且全是我们到通化后招的新兵。学员虽多数经过一些战斗锻炼，但没有武器。我们担心，若是机场的日本人

参加暴动，形势将是十分危险的。

二月二日晚上十点左右，司令部电话通知：从暴动计划中得知，航空总队一日籍飞行员将于天明后驾驶一架飞机为暴动助威，命令立即将该人逮捕审讯。审讯时，他突然说：“暴动头子就是林保毅”。这时候，忽然全市电灯关灭，复亮，再灭，再亮，四点整电灯第三次关灭。顿时，外面枪声大作，日本人暴动开始了。一时间，暴徒冲到航空总队机关和县府大院门前。这时，有一种意见主张立即枪毙林保毅。我们感到仅凭个别人一句话说林保毅是暴动头目，证据不足，遂暂对林保毅采取了监护措施。

暴动在天明后逐渐平息了。不几天，滕田也被捕获了。经多方审查，证明林保毅与暴动无关。这时，后方司令员兼航空总队队长朱瑞同志和我一起与林保毅谈话。一方面明确告诉他，暴动与他无关，我党对他是信任的；另一方面也严肃指出他的原部属中确有人怀有异心，他平时过于自信部属对他的忠实，险些铸成大错。林保毅当即表示：原来认为自己在日本军人中是个精明的军官，现在感到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自己还是个小学生；这次通化日本人暴动之后，仍让他任飞行主任教官，让他的部属继续工作，这是对他及其部属的宽大和信任。对此，他们非常感激，表示今后一定要为建设中国人民空军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暴动平息后，我们总结了经验教训。对来历不明的日

本非技术人员进行了清理。同时，给学员也发了一些武器，增强了航空总队的防卫力量。为了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复仇主义，后来对几个学员在这方面犯的错误，还给了严肃的批评和必要的处分。同时，对全体同志进行了提高政治警惕和加强政策观念的教育。这些措施，对纯洁组织，提高全体人员的政治觉悟、政策观念，增强团结，搞好工作，特别是对包括林保毅在内的这批日本技术人员从政治思想上的改造，都起了较好的作用。

## 老航校在战斗中光荣诞生

在平息日本人暴动后，大约是二月十一、二日，常乾坤同志率领魏坚、吴凯、张开帙、许景煌等十多人，辗转到达通化。这些同志大部分都是早年学过航空的老同志，他们的到来，使航空总队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航空队懂得航空技术的党员干部只有刘风一人，现在有十几个人了。这样就有了政治和航空技术兼备的主要领导骨干，加上日本人残留的飞机、航材和东北已有的机场等，成立党的第一所航空学校的条件基本具备了。

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在航空总队全体人员大会上，通化后方司令部司令员朱瑞同志受总部委托，宣布了我党我军历史上第一所航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正式成立。航校三月一日诞生，就此向上报了个代号叫“三一部”

队”。朱瑞同志在会上还宣读了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关于航校主要领导干部的任职命令，校长朱瑞（兼）；政委吴溉之（兼）；副校长常乾坤、白起；副政委黄乃一、顾磊；政治部主任白平；教育长蔡云翔；校参议兼飞行主任教官林保毅。

当时，全军党委制尚未恢复，总部指示：由于朱瑞、吴溉之同志没有精力承担航校的实际领导工作，决定由在航校的领导干部组成军政委员会、党务委员会和除奸委员会实施具体领导。军政委员会由两个副校长、两个副政委和政治部主任组成；党务委员会由常乾坤、黄乃一、顾磊、白平和组织科长组成；除奸委员会由黄、顾、白和当时的组织科长、保卫科长组成。并指定由黄乃一兼三个委员会书记。

航校诞生后，飞行训练刚刚开始，国民党空军就连续轰炸扫射通化机场，妄图炸毁飞机，破坏机场，阻止我们的飞行训练，把我们初生的航校扼杀在摇篮里。大家没有被敌人的空袭所吓倒，我们边疏散边防范，坚持进行飞行训练。

## 国民党进攻南满，航校奉命北迁

一九四六年三月中旬，总部通知在通化地区的四所军事学校的领导同志一同去汇报。我同军大校长何长工、兼

炮校和航校校长朱瑞、炮校政委邱创成一起到了抚顺总部（工兵学校因故未到）。由于国民党向南满发动进攻，通化地区的形势也日趋吃紧，总部领导只简单问了几个学校的一些情况，还没等我们详细汇报，就明确告诉我们：总部决定四所学校，立即到北满选址，准备转移。

回到通化后，按照总部指示，我们立即派人去北满的齐齐哈尔、佳木斯、牡丹江等地了解机场情况。在当地党委的协助下，经总部批准，最后航校选定去牡丹江。

牡丹江机场的房屋全被炸毁，但跑道完好。牡丹江省委大力支持，将伪满时的市公署办公大楼和附近一些小楼房划给航校作校部。不远处另有一栋较好的楼房，我们划给了学生队。

为了顺利北迁，航校军政委员会研究决定，将暂不能修复的飞机、大部航材、航油等，先装一列车运走，到牡丹江后，迅速整理机场和房屋，为飞机转场做好准备。留通化的同志继续组织飞行训练，然后把能飞的飞机分批转场飞牡丹江。

我们第一列车行车十分困难，沿途各站均为苏联红军控制，几乎站站都要费力交涉。特别是列车过老爷岭时，车头拉不动，全车所有的人都下来在列车两边推车，大家用力推着一步一步地移动，好不容易才推过了高坡。我们这第一列车，停停走走，过了好几天才到达牡丹江。

航校转移到牡丹江后，由于朱瑞、吴溉之同志没来牡

丹江，不便再兼任航校的领导职务。我们去总部请示，总部任命常乾坤同志为校长，王弼同志为航校政委，并将王弼所带的干部全部调航校工作。

王弼同志到校任政委后，他提出，三月一日是朝鲜的一个惨案纪念日，航校代号叫“三一部队”不好，为纪念航校六月一日正式开飞，经校军政委员会讨论，并报总部同意，从六月一日起，航校代号改称“六一部队”。

## 敌人越破坏，我们越坚定

航校、炮校相继转移到牡丹江，尚未安顿就绪，就遇到国民党残存的大股土匪从多路进袭牡丹江市。航校立足未稳，安全受到了很大的威胁。但这时我们已经接受了通化日本人暴动事件的教训，扩大了警卫部队，加强了对机场和飞机的警卫，学生队也装备了一些武器，增强了自卫能力。我们遵照牡丹江军区的布置，配合全市军政机关、部队及炮校一起发起反击，将土匪全部打退。这次战斗，给了我们又一次深刻的教育，也使部队受到了一次锻炼。

国民党为了消灭人民航空事业这个刚刚萌芽的嫩苗，对通化、牡丹江机场以及后来的东安、干振、佳木斯机场，经常派空军轰炸扫射，妄图把人民的航空事业扼杀在摇篮里。为了对付敌人的空袭，保护人民航空事业茁壮成长，我们采取了许多对策：敌机从沈阳起飞来轰炸扫

射，一般在上午十点和下午四点这段时间内，我们摸准了这条规律，后来就尽量把训练时间安排在早晚进行；为了防止万一，每次飞行后，都将飞机疏散，并伪装隐蔽起来，且把汽油全部放掉，以免敌机扫射击中起火；同时，为了迷惑敌人，我们还把一些报废的破飞机有意整整齐齐的停放在停机坪上，以转移敌机的空袭目标。有一次敌机果然上了当，他们来空袭时，一个劲向那些破飞机扔炸弹和扫射，自以为取得了很大战果，实际上我们并没有什么大的损失。与敌人的愿望相反，他们的疯狂轰炸和扫射，更加激发和坚定了我们每个学员尽快掌握飞行技术和修理技术的决心，以便早日和敌人较量。

## 吸取血的教训，确保飞行安全

老航校初期共发生四起严重飞行事故。第一次是林保毅试飞，飞机坠毁。第二次是从通化转场牡丹江途中，大家等四个日本人飞的一架运输机撞山，机毁人亡。后两次是中国同志。

一九四六年六月，飞行科长吉翔同志，在一次带许景煌飞行时发生了严重事故。飞机起飞后，在第一转弯前，飞行高度还不到一百米，发动机发生故障，失去马力，吉翔同志为了保全飞机（当时航材困难，初、中级教练机只剩下一两架了），企图做180°转弯回场着陆，在转弯过程

中，飞机失速坠地，吉翔同志当即牺牲，许景煌同志负重伤。

吉翔发生事故后大约一个星期，总部指示航校派飞机去通化往北满运东北币。校领导研究决定并报总部同意，派飞行技术最好的蔡云翔同志执行这次重要任务。蔡驾双发运输机从牡丹江起飞。中途在敦化着陆加油时，敦化军分区司令部有几个干部南调，顺便搭机去通化，人和行李较多，飞机超载。从敦化起飞后飞机升高很困难，蔡云翔便选择在一片原是森林，失火烧光，从空中看似乎是较平坦的地方迫降，不幸撞在一棵树桩上，飞机爆炸起火，全机人员遇难。

蔡云翔、吉翔同志连续发生事故后，我们认真总结了教训。蔡、吉两同志当飞机发生故障时，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不顾个人安危，千方百计想保住飞机，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但是，两次事故确有沉痛的教训：一是违反规定超载飞行。二是没有严格按科学办事。吉翔同志上午给学生讲课，还专门讲到飞行高度在一百米以内，飞机若发生故障，只能作直线迫降，不许作转弯飞行，否则飞机有失速的危险，但是下午他带飞就违反了这一规则。虽然主观动机是好的，但不尊重科学规则，结果造成了严重事故。三是机务维修工作检查不严，发动机发生故障。

通过这几次事故，我们对部队加强了安全教育。在以

后的训练中，大家牢记这几次事故的教训，严格机务维修检查，严格按科学规章制度办事，一直较好地保持了飞行安全。

## 实践检验了学生队的教学方针

在飞行训练逐步展开的同时，机械学生队（包括当时尚未开飞、还在进行地面教育的飞行学员在内）由于教学方针的改变，在学校引起了一场风波。

机械学生队，原按照彭真、伍修权同志的指示精神和航校的教学计划，以实物教学为主，要求学生先知其然，暂不求知其所以然，尽量争取早日学会修理飞机的技术，待以后有机会再进行理论补课和提高。这是针对当时战争形势和日本技术人员随时都有可能撤走的特殊情况，从学生文化水平低的实际出发制定的正确方针和计划。在学习中，学生本来是安心的、积极的，学得也很有兴趣。但这时有一种意见上升起来，认为现在培养学生，是培养“母鸡”，以后是要他们“下蛋孵小鸡”的，没有理论基础，以后怎么教人？因此，极力主张先学理论，再学实际修理。于是改变了原来决定的方针和教学计划，暂不搞实物教学，集中精力学原理。学了不久，由于学生文化低，原理学不懂，又一次改变教学计划，先补习文化。大部分学生本来数学基础就差，离开实物教学，成天啃代数，几

何公式，啃不动。许多学生眼看着前方战争激烈，加之学飞行的由于飞机少，有的暂时又飞不上，因而不安心学习。有的学生提出：“枪炮一响，手就痒痒。学不懂，憋得慌；飞不上，等得慌；还不如让我们打起背包上前线去打仗！”这些意见反映到了校军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并直接召开学生代表座谈会，当面听取学生的意见。这样才决定恢复原教学计划，学生又普遍安心学习了。

经过不长的时间，在教员和日本技术人员的指导和帮助下，学生较快的掌握了修理技术，机务人员迅速成长。到一九四七年上半年，航校培养的机务人员大部分都能实际维护飞机了。五、六十名机务学员相继毕业，机务人员队伍逐步壮大。与此同时，修复的飞机也多了，学生实习修理的飞机也试飞成功了。这就为一九四七年航校较大规模开展飞行训练（几个班相继在牡丹江、东安、干振和佳木斯开飞）打下了物质基础，也为保证飞行安全进一步创造了条件。实践证明，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当时条件下，以实物教学为主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 正确处理日本人的“回国风”

一九四六年夏、秋，国民党军队向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来势甚猛。解放区某些大城市相继丢失，飞机、器材

和汽油日益缺乏，眼看航校似乎难以为继，不少人深为忧虑，个别人丧失信心。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政府连续大批遣送日本人回国，航校日本人发生了一次较大的思想波动，刮起了一阵“回国风”。个别日本人甚至对我们提出要挟，扬言不干了，要求立即遣送回国。当时，我们分析了他们闹“回国风”的原因：主要是对当时的形势和困难缺乏认识；对通化“二·三暴动”后撤销了他们的领导职务有不满情绪；另外在我们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尽管我们对他们物质生活给予优待，比我们多吃一些大米、白面，但还是比较艰苦的。直接的起因是，我们有的学生看不惯日本个别教官旧的管教方式，甚至发生“顶撞”，有的日本人按照旧的习惯认为这是不可容忍的，因而趁遣送日本侨民之机，刮起了“回国风”。

那时，航校正开始搞飞行训练和机务训练，使用的又全是日本飞机，我们的同志无论是搞飞行的还是搞修理的，都是过去多年以前的事，技术已经荒疏，对这些日本飞机更不熟悉，很需要争取这批日本技术人员同我们合作。于是，根据党的政策和工作需要，我们对他们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同时，也适当地开展了一些批评斗争。我们首先做技工科（即日工科）日本同志的工作，要求他们正确对待这股“回国风”，然后通过他们去做日本技术人员的工作。

同时，我们和林保毅等原来的主管教官进行谈话，个

别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要求他们起好作用，不要带头闹“回国风”。

然后，考虑到这次闹“回国风”的波及面较大，决定召开一次大会，对全校日本人公开进行教育。我们明确提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对中国人民负有血债，作为日本侵华空军，同样也是有罪的（林保毅本人就曾击落过中国飞机）。要求他们以戴罪立功之心，做好当前工作；并应从日本民族前途着想，加强对自己的改造。应将在我军工作视为改造自己的最好时机，把眼光放得长远些，为了解救日本民族，抓住在我军工作的便利条件，努力学习，提高觉悟。由于我们在事先个别地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加之我们平时对他们的态度友好，这次大会虽然对他们进行了公开的严肃的批评，批评中我们又有所节制，注意不伤害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因而使他们受到了教育和感动，“回国风”很快平息。

## 克服两大“意想不到的困难”

日本人在东北留下的初、中级教练机本来就少，经大力收集，总共不过八、九架，而且都是破烂不堪、设备极不健全的。两次严重飞行事故和几个月的训练消耗，到一九四六年七、八月份，再没有可以继续供飞行训练用的初、中级教练机了，飞行训练又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

难”。

没有初、中级教练机，怎么搞飞行训练？校内引起了一场很大的争论。有人主张向苏联要；个别新来的同志主张向英法买。但是，在我们党还没有掌握国家政权的状况下，这些主张显然都是不现实的。这时，有的同志提出干脆直上“九九高练”（即超越初级教练机和中级教练机，直接上九九式高级教练机）。有的同志说，这不符合循序渐进的原则，直上“高练”，一步登天，那是冒险！我们反复研究，如果不直接上“九九高练”，飞行训练就要中断。客观情况把我们“逼上梁山”，要继续搞飞行训练，就不得不设法“一步登天”。

能不能做到比较有把握地直上“九九高练”，确保安全，不冒大的风险呢？我们发动群众认真分析直上“九九高练”的不利条件和有利条件。不利条件主要是：一，飞行速度大，比初、中级教练机快得多；二，设备差，机上没有无线电设备，刹车系统陈旧；三，飞机方向不好保持。有利条件主要是：一，飞行教员都飞过“九九高练”，带飞较有把握；二，学员要求飞行的积极性高，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毅力；三，大家重视按科学规律办事。经过领导与群众的充分酝酿讨论，直上“九九高练”的意见得到多数人的支持。思想统一后，我们在尊重科学、认真准备的基础上，大胆实践。在训练实施过程中，又反复强调：教员要加强责任心，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学员要虚心学

习，细心体会，勤学苦练。没有把握的不放单飞。第一批直上“九九高练”的是一期甲班。学员吴元仁，经过教员悉心指导和他的刻苦钻研，勤学苦练，教员只带飞了十二个小时，就第一个顺利地放了单飞（那时平均带飞是十五、六个小时才能单飞）。吴元仁直上“九九高练”成功，给大家很大鼓舞，使后放单飞的同志增强了信心。后来在整个训练中也未发生过严重事故。没有初、中级教练机，直上高级教练机，这是我们在艰苦的环境中迫不得已走出的一条路。在这条前人没走过的路上，我们靠领导与群众相结合，靠革命坚定性、创造性、科学性紧密结合赢得了胜利。

直上“九九高练”的难题刚解决，我们又遇到了一个困难。随着飞行训练的不断展开，汽油缺少困难越来越突出。日本人在东北残留下来的汽油，我们能够收集到的可以说已搜寻殆尽，航校储存的汽油即将用完。汽油哪里来？解放区暂时还不能自己生产，外国进口也毫无指望。没有航油，飞行训练又将被迫中断。客观形势又要求我们象直上“九九高练”那样，必须大胆去实践、去创造。

开始，我们先逐步以汽油和酒精7：3、5：5、3：7的比例混烧进行地面试车，然后进行空中试飞，都取得了成功。后来我们又用扩大汽化器喷咀的办法，终于以百分之百的酒精代替了汽油。

为了保证纯度高的酒精能大量供应，我们把日本人丢下的哈尔滨两家最大的酒精厂迅速复工。直到建国前，这两个工厂不仅保证了航校的需要，而且使前方汽车运输所需的燃料也得到了解决。

## 刘亚楼到校检查工作， 纪念蔡云翔起义一周年

一九四六年八月中旬，总部参谋长刘亚楼同志第一次来航校检查工作，他率领总部工作组对航校各方面的工作进行了检查，并接见了航校全体党员领导干部。他充分肯定航校工作取得的成绩，表扬了航校同志不畏困难，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同时，也批评了我们领导上存在的某些主观、片面、不深入的现象，要求我们进一步做好起义人员和日本留用技术人员的团结、教育、改造工作。

八月二十日，他在牡丹江当时最好的会英楼饭店，以总部的名义，为蔡云翔等同志起义一周年举行庆祝宴会。除蔡云翔、吉翔两同志因公牺牲外，全部起义人员及其家属都参加了这次庆祝宴会。会上，对这次起义——敌营中第一次驾机起义及参加起义的全体人员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赞扬。对蔡云翔、吉翔两同志在航校工作中，积极执行空运和训练任务，危急时还一心挽救飞机，以至光荣牺

牲，表示高度的敬重。并勉励航校新老同志，为办好我党第一所航空学校，群策群力，共同奋斗。这次庆祝活动，不仅给起义人员以很大的鼓励，对航校全体同志也是一次很好的思想和政策的教育，对进一步搞好航校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

## 航校再次东迁

一九四六年九、十月间，国民党占领了沈阳、长春，我哈尔滨、牡丹江等地受到威胁。根据战局的变化，总部命令航校再次东迁，向东安（密山）转移。为了使飞行训练不间断，我们采取了边训边迁的办法。部队转移到东安后，马上继续组织飞行训练。

然而，航校迁东安不久，国民党空军又追到东安机场来进行轰炸、扫射。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我们除在东安抓紧早晚时间进行飞行训练外，又将部分飞行部队迁到更僻远的地方——干振，继续坚持飞行训练。

在东安、干振，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七年春，这是我们生活和工作最艰苦的时期。

当时虽然进入了飞行训练，由于战争条件的限制，我们并没有什么“空勤灶”、“地勤灶”。飞行员也和大家一样，吃的是玉米碴儿和高粱米，经常吃的蔬菜就是土豆、萝卜、豆腐、白菜和咸菜。有时星期天包一顿饺子

吃，那就很不错了。

那时，在千振飞行的一期乙班，不管教员、学员还是地面机务人员，全部住在一个破旧的榨油房楼上，睡的是通铺，铺的是谷草。冬天气温降到零下三、四十度，窗户结冰一寸多厚。许多同志没有棉工作服、棉手套。为了御寒，上天飞行时只好多穿几件旧军装。机务人员更困难，冬天修理飞机，手一触及金属就会被粘住。

为了防止敌机轰炸，我们坚持在早上八点前、下午四点后继续进行飞行训练。这样，无论空地勤人员，早上都得提前两三个小时起床到机场做准备。在冬天，大家要冒着刺骨的寒风把疏散的飞机推到停机坪，烧木柴给飞机发动机加温，同时要把滑油加温到六十多度才能倒进油箱。此外，当时没有加油车，为了防止空袭，每次飞完后飞机上的汽油必须放光，下次飞行之前空地勤人员又只好一桶一桶地向飞机上加汽油。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季节，顶风冒雪做这些事情，其艰苦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尽管当时生活、工作如此艰苦，大家工作却十分积极，所有这些困难，都一一被同志们战胜了！

## 校领导班子第一次调整， 开展整顿思想与学习、立功运动

一九四六年九月底，总部决定马文同志来航校任政

委，同时对航校领导班子作了相应的调整：王弼改任第二政委，黄乃一改任政治部主任，顾磊改任校务处长，原政治部主任白平同志调总部另行分配。军政委员会书记由马文兼任，党务委员会书记和除奸委员会书记仍由黄乃一兼任。

新的领导班子分析了航校的情况后认为：航校从筹备到建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战胜了许多困难，到现在已初具规模，应该说成绩是很大的。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思想问题，很有必要认真进行一次整顿和总结。

从航校前身——沈阳航空队算起，到一九四六年冬，历时不过一年，由于战局变化的影响，我们却经历了五次大搬家（沈阳—辽阳—宫原—通化—牡丹江—东安），客观环境很不安定。加之航校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成份复杂，除中国同志外还有日本人、朝鲜人。我们的同志又是从各个解放区来的，还有起义来的，思想作风大不一样。许多人一到航校就被派出去收集器材，执行任务，一去就是两三个月，在校过集体生活不多，相互之间、上下之间往往都不很了解。有的干部来后就投入紧张的临时工作任务，思想上产生的一些问题没能得到解决；由于战局不稳，环境艰苦，有的人思想动摇，个别人甚至企图叛逃；有的干部和学生，对办航校所遇到的重重困难，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感到航校难以为继，要求调动工作；有的日本留用人员也不安心，要求回国等等。

针对以上情况，经校政治部和党务委员会研究并提请

校军政委员会讨论决定，在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开展了一次思想整顿运动。

这次整顿，按照延安整风的经验，首先组织全校人员认真选学有关整风的文件，在提高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的基础上，自觉总结和清理自己来航校后的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互相帮助，并对新来的同志进行必要的审查。日本留用技术人员，在校政治部技工科（日工科）的组织领导下，也进行了学习和对照检查。

通过整顿，全校人员的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普遍有所提高，对形势、前途等方面的糊涂认识和错误观念得到了澄清和纠正，增强了办好航校的信心，不安心航校工作的现象大为减少；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增强了上下之间、相互之间的了解，增进了团结；初步弄清了一些新来同志的历史情况，被审查的同志为弄清了自己的问题也感到高兴。总之，通过整顿，为进一步办好航校，打下了思想基础。

为了巩固思想整顿成果，不久，校军政委员会又决定，在抓飞行训练的同时，开展政治学习运动和立功创模运动。目的是引导大家重视政治学习，自觉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这次运动，调动了大家的政治积极性，连日本人也逐步重视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积极参加了立功创模运动。一九四七年“三八节”，为了推动立功运动的开展，全校召开了第一次庆功大会，表彰了建校以来成绩

突出的人员，促进了部队建设。

## 各级领导力量进一步加强

一九四七年三月，刘善本同志和新疆航空队的同志们一同到达航校（东安）。他们的到来，使航校增强了领导力量和骨干，对航校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刘善本同志是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利用国民党从昆明经成都运送军火的机会驾机起义的。在同机组人员张守益、唐世跃、汤玉文等的配合下，安全飞到延安。在延安，他们受到了党和人民的热情欢迎，毛主席、朱总司令亲临欢迎大会，周恩来同志曾表彰“刘善本同志是国民党空军起义的带头人”。一九四六年九月，刘善本同志及其机组成员和新疆航空队的同志们一道，从延安出发，经过近半年的艰苦跋涉，于一九四七年三月，辗转来到东北老航校。到航校后，刘善本同志被任命为副校长，其他同志在训练处参加教学工作。

关于新疆航空队的同志，早在他们到来之前，校领导就认真作了研究。认为这批同志既经过长征或战争的锻炼，又经过监狱斗争的考验，而且学习过航空专业技术，是党的宝贵财富。原学机务工程的同志，由于工作急需，少数人很快分配到机务工程单位担任了领导工作。其余多数同志（包括学飞行的同志）经过一段时间恢复健康和恢

复技术学习之后，先后到各级领导岗位，分别担任了处长、大队长、教导员、协理员、科长、股长和飞行教员、机械教员，成了各级领导和教学的骨干。

## 大规模开展飞行训练， 航校工作逐步走上轨道

由于直上“九九高练”和以酒精代替汽油解决了两大难题，由于机务人员的增多，修复的飞机也增多了，这就为一九四七年较大规模地开展飞行训练创造了条件。是年开春后，除教员训练班和一期甲班继续进行飞行训练外，五月份，一期乙班学生在干振机场正式开飞，这班学生共有三十三人。后来又从机械班学生中挑选了一批人学飞行，他们称为一期丙班（也有称他们为二期学员的）。

新疆航空队来的同志，经过一段恢复健康和地面学习后，也于一九四七年八月正式编队，开始了恢复飞行的训练。

为了将来机组配套的需要，一九四七年三月，航校还从机械队学生中挑选了一部分同志组成第一期领航班。经过四、五个月的理论学习后，于一九四七年八月正式进行飞行领航训练。

一九四七年秋，我军已由战略防御逐步转入战略反攻，前方战争形势开始根本好转，后方局势比较稳定。航

校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实践，终于逐步摸索出一些头绪和路子。人员逐步增多，组织也逐步健全。特别是通过思想整顿，全校同志增强了办好航校的信心，航校各项工作，逐步走上轨道。当然困难和问题仍然很多，尚需在实践中逐步解决。

一九四七年十月，军大政委吴溉之同志奉令到航校兼任政委，马文同志和我调出航校。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清楚地看到，老航校正是在当时那些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诞生和成长起来的。一九四八年冬，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我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蒋管区进军。老航校大批同志奉调随军进关、南下，到各新解放区接收国民党的机场、装备和工厂，为建设和发展人民的航空事业，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一九四九年九月，党中央决定同时在全国新建六所航校。老航校为六所新建航校抽调了领导干部和技术骨干，留下的底子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编为第七航校。

一九五〇年党中央决定在华东地区正式组建我军第一支空军作战部队——“混成旅”，下辖三个团：一个喷气战斗机团；一个螺旋桨战斗机团；一个轰炸机团。老航校为这支部队抽调配备了部分旅团领导干部和大部分战斗员。

在抗美援朝大规模空战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首战

部队的团队指挥员和战斗员，大部分是老航校的学生。正是这些文化水平不高，飞行时间不长的年轻的空中勇士，击落了飞过几千小时的所谓美国“王牌飞行员”，打击了美帝的“空中优势”。当时最著名的志愿军空军英雄，绝大多数是经老航校培养出来的飞行员。

试航拉萨，飞越西藏天险，突破“空中禁区”的，也有老航校的学生。

今天，我们已经初步建成了比较完整的航空体系。喜看今日人民航空事业飞速发展的大好形势，我们不能不怀念那些早年曾为党的航空事业、为创办老航校、为抗美援朝空战胜利、为发展人民航空事业作出贡献而光荣牺牲了的同志们。

老航校的历史贡献，不仅在于她为人民航空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更重要的是她继承发扬了我党我军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现代化的航空事业，同样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只要我们象当年筹建老航校那样，继承党的光荣传统，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发扬革命的坚定性、创造性、科学性；坚定不移地依靠党；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群众；团结各方面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千方百计地培养人才，我国航空事业的现代化，一定能够更快地实现！

# 回忆南方局文委—文化组

张 颖

## (一)

一九三九年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后，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也由武汉迁到重庆。同年一月，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领导下的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南方局是党中央的派出机关，领导当时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各方面的工作。下设有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和青委、妇委、文委等，分别主管各方面的工作。主要是贯彻执行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具体点说，是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组织人民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以争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在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的环境和工作条件是完全不同的。南方局是在国民党和敌人的严密控制下进行工作，斗争极为复杂、尖锐和艰苦。斗争方式有公开的、半公开的和完全属于地下的秘密

斗争。

南方局是党的秘密机关，设在重庆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内，以公开合法的机构为掩护。我们的工作人员大多利用在国统区的公开身份进行工作。比如有十八集团军的参谋、秘书、副官等等，也有一些同志以《新华日报》编辑或记者的公开身份进行工作。

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间，我们公开的活动场所有化龙桥红岩村的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曾家岩五十号周恩来同志的寓所、化龙桥虎头岩《新华日报》编辑部、七星岗《新华日报》营业部，以后在观音岩又增加一处《新华日报》记者的宿舍。

我于一九三九年夏天，从延安调到重庆红岩村办事处工作，一九四〇年初到曾家岩五十号，在南方局文委作秘书、联络等工作。

南方局文委由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经常性的会议都由他主持，重大的工作由他作决定。经常参加会议的成员有徐冰同志，他协助恩来同志管全面，也兼管文艺工作；有冯乃超同志，他在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三厅工作，也可以说是党与郭沫若同志的联络员，协助郭老进行工作；有潘梓年同志，主管新闻界；有胡绳同志，主管出版界；这几位同志就是当时文委的基本成员了。这样小范围的会议，每两三周进行一次。由各成员汇报主管方面工作的情况，然后提出问题进行讨论，作出决定，又分头去执行。当时

人员不多，讨论的都是方针政策等大事。比如：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的文化宣传工作的方针、任务，统战工作的方针、任务，如何与国民党反共政策进行斗争，以及《新华日报》各个时期的编辑方针，以至社论的题目和内容。

大约在一九四〇年后，原南方局文委改称南方局统战部文化组（后文均称文化组），人员没有多大变动，周恩来同志任组长，徐冰、冯乃超同志为副组长，以后增加夏衍同志为副组长。我仍是秘书，作会议记录，办一些具体的事。以后因为徐冰同志工作很忙，就把文艺方面的一些工作交给我，并教我如何去做。我即以《新华日报》记者身份进行公开活动，了解文艺界的情况，广泛联系文艺界的朋友。

## （二）

当时重庆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多是在上海“八·一三”后逐渐转移到重庆的。上海是三十年代左翼进步作家和艺术家聚集的地方，抗日战争以后，除少数人仍留在上海坚持工作外，大多数经由广州、桂林、武汉转移到别的地方。有不少人辗转前线、敌后，到了延安或边区根据地，如张庚、吕骥、陈荒煤、蔡若虹、江丰、崔嵬等同志；一部分留在桂林，如夏衍、荃麟、田汉等同志；而相当多的人则到了重庆。

在重庆的这部分文艺家们，为了工作和生活，分别在

国民党的一些机关或群众团体里找了职业，安下身来。比较多的人集中在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三厅。郭沫若同志是三厅厅长。据说郭沫若同志是经过周恩来同志的说服，才担任这个职务的。其实这样可以利用国民政府的机构，合法地进行抗日宣传。洪深、田汉、阳翰笙、冯乃超、张光年等许多同志都曾在三厅任过职。

也有不少同志和进步文艺工作者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工作。这是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文艺界组织，只要是主张坚持抗战的都可以团结在一起。由茅盾、老舍、叶以群、葛一虹、梅林等同志领导或主持经常性工作，还出版了会刊《抗战文艺》。

上海沦陷以后，国民党在重庆建立了两个电影制片厂：一名“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厂长郑用之。著名的导演有史东山、郑君里、史凌鹤等。名演员有舒绣文、秦怡、石羽、江村、周峰等。另一个名“中央电影制片厂”（简称“中电”），有孟君谋、陈鲤庭、白杨、吴茵、魏鹤龄等。但由于条件困难，在重庆很少拍电影，于是又各自成立了话剧演出团。“中制”的名“中国万岁剧团”，“中电”的名“中电剧团”。

原在南京的中央戏剧学校迁到四川江安县，中央音乐学院迁到重庆沙坪坝。抗战中期话剧蓬勃发展，戏校的毕业学生和老师成立了“青年艺术剧社”（简称“中青”）。曹禺和张骏祥同志都曾担任过戏校校长和“中青”社

长。演员有刘厚生、耿震、沈扬等。其他还有戏校实验剧团、中央交响乐团、音乐干训班等，都有地下党员或进步人士在那里任职。

这些都是当时在重庆和国民党统治区比较有影响的文艺机构和团体，看起来是国民党的势力，但许多都为进步的文艺家所占领，在实际工作中接受我党的政治领导或影响。当然，其中的斗争也是尖锐复杂的。其他的文艺机构则都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控制之下。当时的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对于思想界、文艺界，国民党当然要极力控制，然而，南方局文化组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进行工作，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国民党的机构能为我所用。

一九四〇年，南方局文化组经常召开会议，由周恩来同志主持。会议常常是晚上十点左右开始，直开到凌晨四点。每次会议大都有比较集中的议题，而文艺方面的问题，又常常占相当大的比例。我记得关于国民政府政治部三厅的工作，就议过不少次。内容最重要的是进步人士在这一阵地上如何站稳脚跟，并利用合法的地位宣传我党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方针，同时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

当时，为许多人所熟悉的“抗日救亡演剧队”，虽是穿着国民党军衣，但在队里却有我党的基层组织——党支部在领导。而且队长等领导人还多是地下党员。他们深入各战区和国民党的军队里，利用各种形式宣传我党的各种

主张，取得了很大成绩。

一九四〇年前后，“中华全国文学界抗敌协会”的工作是很活跃的。为统一大家的一些看法，曾召开不少座谈会。例如：“文艺与抗日的关系”、“文艺的民族形式”等问题的讨论，对文艺界大多数人是很有启发教育作用的。南方局文化组总是首先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并指定《新华日报》予以配合和指导。在开这种专题研究会时，往往扩大一些同志来参加，比如当时《新华日报》总编辑章汉夫、负责文艺的戈矛（徐光霄）等。经过充分讨论、研究后，由《新华日报》指定专人撰写文章，并组织文艺界朋友写稿，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另外，很快把文化组讨论的意见和情况告诉当时负责“全国文协”经常工作的叶以群同志。周恩来同志、徐冰同志经常会见他。“全国文协”组织的各种活动，叶以群同志都和徐冰同志事先商量，事后了解反应，总结经验。叶还常常把文化组和周恩来同志的意见转达给茅盾、老舍，并征求他们的看法，以沟通思想，配合工作。实际上以群是南方局和“全国文协”的联络员。通过他的工作，联系文艺界持有各种不同见解的朋友，使之在大的方面达到一致。

当时在重庆的作家、艺术家队伍的思想状况是比较复杂的，但应该说大多数人都有强烈的民族意识，都赞成并拥护抗日主张。其中有许多人在三十年代就是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中有影响的人物，他们和党的立场基本上是一致

的。有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分歧，但经过讨论或争论可以达到一致或谅解。另有一些作家、艺术家，他们虽然赞成抗日救国，但不愿意参予政治斗争。也可以这样说，他们既不赞成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但也不大了解和相信共产党，在民族大义的前提下，还是希望能为艺术而艺术。还有大量较年轻的作家和艺术家，他们满腔热情，希望投身到民族战争的洪流中，贡献自己的一切，但他们还不够成熟，不知道正义在何方。另外有极少数人，是国民党豢养的，甚至充当国民党的文化特务。

面对着这样一支文艺队伍，南方局文化组经常进行研究讨论，如何扩大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更多的文学艺术家站到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这一营垒中来。周恩来同志要求文化组对这支队伍既要有全面的认识，又要作深入细致的具体分析。首先要团结最大多数人在坚持抗战的旗帜下工作，又要有步骤地作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逐步使更多的人能认识到：要坚持抗战就必须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文艺家必须走在广大人民群众前面，引导和教育人民群众；文艺不能脱离社会生活，为艺术而艺术，在任何时候都是行不通的。

在重庆时，许多有名望和成就的作家、艺术家都是周恩来同志、徐冰同志的好朋友。郭沫若同志在重庆期间，无论是住在郊区赖家桥或市内天官府，周恩来同志都经常去看望他，和他讨论工作或是谈论郭老的历史研究和写作问

题。茅盾、老舍同志也常被请到曾家岩五十号来，或是徐冰同志去看望他们，向他们请教，和他们讨论对某些问题的看法。至于阳翰笙、陈白尘、宋之的等同志，更是常来常往了。这种交往，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一种必要的特殊方式，这不仅是个人之间的友谊，而且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交流思想，提高认识，促进工作。周恩来同志常常提醒大家，要广交朋友，深交朋友，要从交流思想中产生影响，通过广交朋友来扩大队伍。他常常教育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我们不可能发号施令，也不可能去指挥任何人，只能依靠正确的指导思想，依靠每个共产党员的榜样起作用。

周恩来同志对戏剧、音乐、美术方面的工作也很重视。有一段时间，在重庆搞戏剧的人比较多，戏剧演出又能直接影响群众，所以南方局文化组曾多次讨论如何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周恩来同志要求我们首先要了解情况多交朋友，并指定我在这方面多做些工作，开展一些活动。

一九四〇年以后，我以《新华日报》记者的公开身份在文艺界活动。以群同志经常通知我去参加文艺界的会议或其他活动，使我比较快地了解当时文艺界的情况，并介绍我认识了不少朋友。记得当时住在张家花园“文协”里的两位名导演史东山、郑君里同志，就是我到张家花园和以群谈事情时初次遇到的，郑君里同志是一位非常热情的艺术家，长期参加进步的话剧和电影事业，抗战期间居住

重庆，精神上感到苦闷，不知应如何从艺术上贡献力量，为国效劳。当他知道我是《新华日报》记者时，十分高兴，对我倾吐了心中的许多想法和疑虑。不久，我去采访君里同志，并见到黄晨。我们一起谈了整整三个小时。在一次文化组的会议上，我汇报了君里的情况。周恩来同志非常关心，很快约见了君里和黄晨同志。在曾家岩的小会客室里，他们从三十年代电影明星的笑话谈起，一直谈到国家大事、艺术家工作的方向和前途。只见他们有时严肃地谈论，有时又哈哈大笑起来，足足谈了有两个小时。许久以后君里都忘不了这次会见和谈话。后来我们见面时，他就热心打听有关政治形势，打听边区和延安的消息，常常要把他的工作和想法转告周恩来同志，有时他们又见面倾谈。象君里这样的朋友，以后逐渐多起来了，慢慢也形成了一股力量。

大约也是一九四〇年，青年演员周峰，拿着一封信到曾家岩五十号找周恩来同志。因为周恩来同志很忙，匆匆见了面，随即对我说：你们都是年轻人，可以多谈谈。并告诉我，以后要多交些年轻朋友。原来周峰来找周恩来同志是为了要去延安。他觉得要抗日，留在重庆太没劲，要去延安，去敌后上前线。我们很谈得来，我也很同情他的要求，支持他的想法。当晚我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周峰的要求和想法，周恩来同志一面点头微笑，一面思考，然后对我说，要求坚决抗日的都到延安去，重庆难道不需要工作啦？他

让我说服周峰留在重庆，因为周峰思想进步，有活动条件，又有固定职业，不应该放弃阵地。

周恩来同志非常关心重庆的广大青年艺术家，认为他们是一支很大的积极力量，象周峰这样的大有人在，要帮助他们学习，提高觉悟。不久，一些在戏剧界的青年朋友，如江村（已故）、孙坚白（石羽）、刘郁民、张立德、凌琯如等同志，渐渐形成了不拘形式的学习小组，且不断扩大。他们讨论政治形势，抗战进展，边区文艺以及《新华日报》的重要文章。周恩来同志还曾参加过青年朋友的讨论会。记得有一次在七星岗《新华日报》营业部二楼上讨论，周恩来同志讲了话，并邀请青年朋友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使他们了解在重庆也一样可以为抗日战争作出贡献。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和这次活动，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差不多同时，在重庆有一批青年诗人，如邹狄帆、绿原、冯白鲁等同志，他们组织了诗社，出版了刊物《诗垦地》。南方局文化组也从各方面予以协助，通过地下党员冯白鲁，对他们的工作予以影响。

也是一九四〇年，音乐家李凌和版画家王琦从延安来到重庆。他们希望把延安、边区的艺术活动在国民党统治区作些交流。周恩来同志和徐冰同志都很重视，鼓励他们在国统区要先扎根，然后开展工作。那时在国民党办的音乐学院或其他音乐团体里，也有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但为数较少。美术界也如此。不久李凌和赵汎等同志组织了

“新音乐社”，并出版了《新音乐》杂志，逐渐团结了不少音乐界人士，包括专家和青年。

就这样，通过公开活动，在一些地下党员以及许多知名的老作家、老艺术家的带领、影响下，重庆文艺界的大多数人士，能够团结在党的抗战进步的旗帜下，形成了一支进步的文艺队伍。他们开展了许多工作，使抗战时期重庆的进步文艺活动，蓬勃发展起来。

### (三)

一九四一年春，国民党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围攻我在敌后坚持抗日的新四军，取消了新四军番号。国统区顿时笼罩着严重的白色恐怖，不少地方的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遭到非法逮捕。重庆进步文艺活动遭到查禁，已形成的一支进步文艺队伍也面临着危险。南方局文化组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经过慎重周密的研究分析，从各方面采取了应变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保存力量，有组织地将文艺队伍撤离重庆，这样，一方面可表示对国民党反共投降的抗议和抵制，使原来有点抗日朝气的所谓陪都变成“死城”；另一方面又可使文艺界进步人士到延安或敌后边区，以发展边区的文艺活动，也可以到别的地区开辟新的阵地。

当时，周恩来同志领导文化组开会，往往连续几晚，通宵达旦。具体研究每个人的情况和他们所处的环境。有些

很负重望的同志，如郭沫若、冯乃超、阳翰笙等，估计国民党不敢轻率逮捕他们，可以留下坚持工作。一些同志也是有名望的，但色彩太浓或久已盼望去延安的，如欧阳山、艾青、草明、罗峰、白朗等，就尽快送回延安。另一些同志则先到香港暂留，待机送往其他地区开展工作，如茅盾、以群、金山、凤子、凌瑄如等都从重庆去了香港。夏衍等同志则从桂林去香港。从重庆去昆明，后来又转到仰光的有张光年、李凌、赵沅等。这些同志和朋友所走的路线都是经过文化组研究确定的，路费由八路军办事处特别经费支出。许多同志临行前，是我亲自送去的路费，并告诉他们沿途接洽的地址和联络人员。有件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恩来同志为了要打开由重庆经过上海进入新四军驻地的途径，经过非常细致周密的考虑，选派了从事音乐工作的青年地下党员洛辛、张锐等同志，和他们一起研究路线，研究如何摆脱敌人的跟踪，如何在上海找地下党的联络点等等。这几位同志历尽辛苦和危难，经过三个多月，终于到达目的地——新四军驻地。当我们在重庆接到电报，知道他们安全到达目的地时，恩来同志非常高兴地说：路总是人走出来的！以后有不少同志就是从这条路线走进新四军驻地的。这次组织撤退十分成功，没有一个同志落入国民党手中。

一九四一年夏天以后，国民党的反共气焰稍有收敛。恩来同志在一次文化组会议上提出，重庆这个“死城”把

人民压得喘不过气来，国民党的严禁和封锁必须想办法予以冲破。留在重庆的文艺界朋友，也静极思动。为此，恩来、徐冰同志与阳翰笙、陈白尘等同志，几经商议，认为在戏剧方面有冲破的可能，而且戏剧界留在重庆的进步人士也多。剧团是国民党掌握控制了，但导演、演员不少是进步朋友，可以调动。于是由阳翰笙、陈白尘等同志筹备组织了一个民办的专业话剧团，这就是“中华剧艺社”。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都极为困难。首先是要找到合适的人出面来筹办，政治色彩浓的人不行，还得有办事能力，有各种社会关系，热心公务，还要懂得艺术。最后选定请应云卫先生来组社，辛汉文、沈硕甫协助事务，而实际上是阳翰笙和陈白尘，辛汉文等同志在其中起支柱作用。他们真是白手起家，开始时固定演员只有刘郁民、郭寿定、张立德等数人，还有部分舞台工作者。这些基本人员都没有固定收入，都是义务劳动。他们住在一间破庙里，睡着双层床，拥挤不堪。排演的第一个戏是陈白尘同志写的《大地回春》，由应云卫导演。女演员是借来的，我记得有秦怡、刘川（当年是儿童演员），还有几位基本演员，他们非常穷，我们也不能大力资助，怕国民党发觉了办不成，只是有时由我给他们送一口袋大米、白面、少许菜金和零用钱，否则他们就连大锅饭也开不出来。演出用的剧场是“国泰大戏院”。老板夏云瑚算是帮助文艺事业，答应演出以后有收入再还场租。作家陈白尘、导演应云卫完全

是义务劳动，如果他们有点钱还得拿出来让大家吃饭。

《大地回春》这个戏是写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精神的，没有多少激进思想。“中华剧艺社”但求能够通过审查，能够演出，打开“一线生路”。参加排练和舞台工作的同志，都是勒着肚子为以后的生存而奋斗的。我十分清楚地记得，首场演出时，恩来同志让我去看，并带了一筐点心、包子等食品，到后台去表示一点慰问的心意。他们都是没吃晚饭就上台的。

《大地回春》的演出虽不算很成功，但却有重要意义。人民群众在沉寂中看到了一点生机，而“中华剧艺社”的诞生，被社会承认了，以后的工作就有了希望。

在排练上演《大地回春》的同时，阳翰笙同志已在积极为“中华剧艺社”创作第二个演出剧本《天国春秋》。阳翰笙同志对太平天国的历史很有研究，曾经写过有关太平天国的作品。他写的这个新剧本，以太平天国失败的经验教训为题材，寓意强调团结，反对分裂，以古喻今，引起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搞分裂阴谋的认识。阳翰笙同志曾把剧本的构思和恩来同志谈过，恩来同志给了他极大的支持，曾和他一起谈创作计划。为了使“中华剧艺社”能站稳脚跟，必须连续演出几出好戏，阳翰笙同志夜以继日地进行创作。同时，演出组也很快筹备起来。为了使这次演出成功，为“中华剧艺社”奠定厚实的基础，在演员配备上也下了很大的力量。导演仍是应云卫，演员是从各剧团借

来的名演员，他们也是来参加义务演出的。舒绣文饰洪宣娇，白杨饰傅善祥，耿震饰李秀成，项堃饰韦昌辉。这么多名演员会萃在一个舞台上，是不多见的。这也为以后的演出创了先例。边创作边排练，在很短时间内，《天国春秋》全剧就初排出来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出入排演场、阳翰老家和“中艺”那间破庙，了解工作情况和他们的困难，及时向周恩来同志、徐冰同志汇报。大概当时国民党的审查官还没想到借古喻今吧，所以虽然经过三番五次地阻挠、删改，终于通过了。

《天国春秋》第一次连排后，我带着十分欣喜的心情向周恩来等同志汇报说，这次演出一定会成功，剧本和演员都很好，极能吸引观众。没过几天，周恩来同志到剧场去看连排。看完戏还到后台去向演员们祝贺，与绣文、白杨、项堃、耿震等所有演员亲切握手谈笑，又向应云卫、阳翰老祝贺，大家心情都很兴奋。过了两天，周恩来同志即约阳翰老到曾家岩五十号来，主要是谈阳翰老这一新的创作，我也坐在旁边听他们谈话。周恩来同志赞扬了这一创作很富于戏剧性，能吸引观众，发挥演员的才能；也揭露、触动了国民党搞分裂的阴谋，总的来说很成功。同时周恩来同志也提出一些意见供阳翰老参考，即剧中过多地渲染了洪宣娇和傅善祥之间儿女私情的纠葛，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弱对太平天国失败教训的揭示。阳翰老同意这一意见，虽感到这正是自己殊爱之处，还是尽量加以修改。

《天国春秋》演出是成功的，观众已经很久没看到这样精彩的话剧了。随着，“中华剧艺社”的经济状况也有了一点改善，剧场的租金能按时付了，大家也有了一些酬劳和收入。重庆第一个专业民间话剧团站稳了，并在观众中树立起一定的威信。

大约也是一九四一年的雾季，郭沫若同志修改了他的第一部剧作《棠棣之花》。当时，在重庆的文艺界朋友，都感到戏剧演出能直接与观众交流思想感情，对人民群众有更大的影响力。而历史剧表面上与政治关系不甚密切，国民党的压力也还不算太重。郭老就在修改《棠棣之花》剧本时，尽量抒发了自己的感情。在郭老以极大的热情修改《棠棣之花》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曾数次到郭老家，鼓励郭老，想方设法给予具体的支持，并对不少进步朋友说，郭老的戏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在这段时间，南方局文化组曾多次开会，研究如何抓紧时机发动文艺界冲破国民党的封锁，重新占领阵地，特别是戏剧阵地。“中华剧艺社”可以说是在党领导支持下建立起来的。除此之外，还要开辟并占领其他阵地。郭老《棠棣之花》的上演，就有着这样的意义。经过朋友与郑用之商议，由“中国万岁剧团”上演。周恩来同志还与郭老、阳翰老等议定，要组织最强的演员阵容，最合适的导演。舒绣文和张瑞芳（她可能不属该团）为主角，周峰、江村、孙坚白等都是“万岁剧团”的基本演员。这样也使

郑用觉之得是自己剧团演出的，并非被他人所利用。《棠棣之花》在观音岩抗建堂剧场演出，出乎意外，盛况空前。排长队买戏票，在重庆也许是从此开始的吧。

当然，那时还有不少别的演出，如曹禺创作、张骏祥导演的《蜕变》，夏衍创作、贺孟斧导演的《愁城记》等等。使得沉寂了一年的山城又活了，文艺界的朋友又走上了自己要走的路。

我记得就在那个寒冷的冬季，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恩来同志对我说，他想请文艺戏剧界的朋友们到曾家岩五十号来玩一次，吃顿晚饭，问我能否估计一下有多少人可以来参加？他见我犹疑的样子，又补充说，只要不是坏人，谁来都欢迎。我望着他一脸高兴的样子，想着是恩来同志要慰问鼓励一下朋友们吧，便谨慎地回答说，经常和我们来往的进步朋友至少有数十人，我想他们都会高兴来玩一次的。于是选定了大家都可能空闲的日子，我们便忙碌起来。演员同志们已经有一个不成文的点线联系。“中艺”的老作家、导演，“全国文协”的朋友都容易请，没想到消息传出，不径而走，已经被请的、间接请的、还没有请的，都纷纷表示很高兴到周先生的“公馆”来作客。恩来同志表示，来者不拒。约略算计一下超过百人。厨师同志和住在曾家岩五十号的所有同志一齐动手做菜、洗盘子。恩来同志还特别提出，自己下厨房做他的家乡菜“狮子头”。

天刚黑下来，我已记不清都有谁了，阳翰老、白尘、应云卫、陈鲤庭、郑君里、舒绣文、白杨、张瑞芳、秦怡、江村、坚白、周峰……这些都是老朋友，老熟人了；如果我记忆不错的话，还有与我们不太熟的张骏祥、贺孟斧、史东山等同志也都光临了。曾家岩五十号那所房子，楼下总共四间小屋，加个小天井，大家挤在一起，欢声笑语，热闹非常。吃饭的时候，碗筷、板凳都不够。恩来同志、徐冰同志分别给同志们敬酒挟菜。大家听说“狮子头”这个菜是恩来同志亲自做的，所有筷子下去，一扫而光，长期以来大家被压抑得喘不过气来，这晚尽欢，人人振奋。虽然山城既黑又窄，但这群富有朝气、不畏艰险的人们，是当年重庆文艺界的精华，他们有代表性、创造性，他们会把雾沉沉的重庆激荡起来。多少年来，我常常想起这件事，我想这正是几年来我们工作的成效，是对国统区进步文艺队伍的一次检阅啊！

我之所以不避冗繁地叙述这些小事，是因为只有这许多具体的事实，才可以说明南方局文化组对国统区文艺工作的领导是无容置疑的。这支进步的文艺队伍，是经过恩来等同志的辛勤劳动，一点一滴凝聚起来的，是循着党的正确方向前进的。

#### (四)

一九四二年“珍珠港事件”以后，国民党投降的可能

性减少了，“皖南事变”后疏散到各地的文艺界人士又纷纷回到重庆。还有香港沦陷后回来的，原留守上海的也来了。这时人才济济，特别是在戏剧界方面，有了一九四一年雾季的基础，这一年更显得活跃。郭老创作的《屈原》的演出，是这一年雾季的高潮。这个剧的演出，无论从政治上和艺术上都取得了极大成就。在创作和排演过程中，周恩来同志与郭老常常互相讨论切磋，已成为戏剧界中长远流传的一段佳话。

在这一年中还演出了不少好戏，如夏衍写的《法西斯细菌》，曹禺的《北京人》，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等等。剧本内容和形式也多样化，有历史题材的，借古讽今；有洋为中用的，讽刺国民党腐败政治的喜剧；还有歌剧。热闹非凡。当年在重庆的人，当会记忆犹新的。

在南方局文化组领导下，重庆的进步文艺活动，蓬勃发展。这当然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他们加强管制，严格审查制度，多方刁难不准演出，或是对剧本大删大砍，各种卑劣手段都用尽了。但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也已锻炼出各种应对的本领。你要删台词吗？可以。演员到台上照讲，审查老爷总不能天天坐在那里听吧？即使听了也无可奈何。什么都禁演吧，也不那样体面，于是就弄出个把御用文人，写剧本唱对台戏。大家难以忘记的是陈铨的《野玫瑰》。这个戏鼓吹国民党的“曲线救国论”，歌颂女特务、女间谍。国民党下令由“中万”上演。当这个剧本交

到剧团的时候，即引起导演、演员们的反对。剧团领导指定名导演、名演员来负责排练。消息很快传到我们这里，文化组为此还召开了会议，研究如何对付这场对台戏。当时决定，有名望的导演不导，名演员不演。（本来大家都这样想过的，但怕势单力薄，受到压力。）这样就不是一两个人，而是所有的人都拒导拒演。当时剧团找过舒绣文、白杨、张瑞芳等名演员扮演那个女特务，但谁也不接这个角色。这样斗了一个来月，陈铨毫无办法，只好凑上几个人，演了几场，草草收兵。从此，大家更感到这种无形的组织是一股力量。那段时间，真有一股好风气，演好戏一呼百应，不争角色，不争名次，两三个名演员同台演戏是常有的事。坏戏下来，一齐罢演。可以这样说，当时党的领导思想已经深入人心。

一九四二年，戏剧演出十分兴旺，许多作家都写剧本。郭沫若同志在两年间创作了六个历史题材的剧本，演出大都获得很大成功。茅盾、老舍等老作家也创作剧本。“中华剧艺社”成立以后，只短短两个雾季已经演出了十四四个新戏，很受观众欢迎，已是很有声望的民间职业剧团了。但它没有经济上的支持，完全靠演出维持团员的生活，还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从香港回来的艺术家，通过私人关系，资助一笔钱，又办了一个民间职业话剧团——“中国艺术剧社”。那时官办剧团固然也可以为我所用，但总是限制重重，自己组团则可以自由许多。所谓民办的剧

团，即是由党来领导。“中国艺术剧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筹办起来的，由金山同志出面，利用私人的社会关系得到些资助，地下党员于伶、章泯、司徒慧敏等同志具体参予领导。有关“中国艺术剧社”的大事也常在南方局文化组讨论决定。

“中国艺术剧社”成立之后，在重庆也演出不少好戏，其中有夏衍等同志创作的《戏剧春秋》，曹禺同志改编的《家》，茅盾同志的《清明前后》等。这些演出，当时在重庆也都是很有影响的。

在雾重庆的戏剧活动高潮中，应该特别提一下戏剧评论。因为那时的戏剧评论对推进整个戏剧活动起了很大的作用，成为戏剧活动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恩来同志以及南方局文化组对这一工作也是极为重视的。在雾季演出期间，《新华日报》用不少篇幅刊登戏剧评论文章。虽然那时评论文章的理论和艺术水平还不高，但已经完全丢弃了过去那种“报屁股”、“捧角”的作法，而是严肃认真地探讨有关演出的各种问题，从演出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来评价演出，在观众、读者中起到了较好的媒介和教育作用。

那时《新华日报》刊登的戏剧评论文章，不少是经过集体讨论的。有些是由《新华日报》组织文艺戏剧人士开座谈会，而后写文章或发表纪要；有的由南方局文化组邀请一些同志讨论，而后写出评论。恩来同志、徐冰同志常

常参加这种讨论，还常常和同志们一起争论，发表见解，有不少评论文章是经周恩来同志看过，修改过的。

在“皖南事变”后的一段时间，大约是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三年，重庆政治环境很恶劣，周恩来同志因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许多政治活动被迫停止了。这时，他就有较充裕的时间来注意了解和领导重庆的文艺戏剧运动，也交了许多朋友。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时领导文艺工作，从来不是通过生硬的、命令的方式，而是交流思想，潜移默化。这样做，在广大文艺界中，影响更大，根子扎得更深。就是在解放以后的许多年来，周恩来同志对文艺的领导，仍然保持并发扬了这种优良的传统。

现在不少同志关心、讨论、总结抗战期间的文艺运动。我写下自己一些具体回忆，四十年前的事了，难免会有疏漏或不准确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五日

# 我党领导的一次 大规模的营救行动

中共惠州市委党史研究办公室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仅仅十八天，香港便被日寇占领。这时留在香港的我党内外的八百多名文化人士、爱国民主人士，以及爱国抗日的国民党人、国际友人面临着被日寇围捕、杀害的危险。为了保护这一大批文化人士、爱国民主人士，为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一九四二年初，我党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营救行动。这一营救行动的成功，不仅使许多中国人看清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是真正抗日的，而且在国际上也产生了极大影响。

## 一、沦陷前的香港抗日救亡运动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军国主义掀起全面侵华战争。全国人民义愤填膺；香港很多进步青年踊跃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各种进步团体纷纷成立，如海员工会、文员协会、

中山大学迁港校友会、同乡会，基督教男青年会、女青年会等。他们在香港宣传抗日，并组织回乡服务团到内地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一九三九年宋庆龄与何宝芳（伍朝枢夫人）、陈淑子（胡汉民夫人）在港组织了妇女慰劳会，发动香港居民和海外侨胞捐款支援国内的抗日战争。

为了广泛组织抗日力量，我党先后派出了不少负责干部到香港。一九三七年底，党中央派廖承志在香港设立了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负责联系海外侨胞，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针、政策，组织香港进步力量，接收、转运海外侨胞对国内抗战的支援。

在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热潮中，国民党顽固派竟冒天下之大不韪，于一九四〇年冬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他们在军事上制造摩擦，“围剿”我党领导的抗日队伍的同时，在政治上迫害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和进步青年。在这险恶的环境中，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士纷纷离开国统区，在我党的安排下撤到香港、新加坡、马来亚一带。

这些人到香港后，党中央即指示廖承志团结在港文化人士，利用香港的特殊环境，开展抗日爱国民主宣传工作，争取海外广大侨胞的支持和国际上的同情。同时，南方局还派张友渔、范长江、夏衍、胡绳等一批党内文化骨干前往香港协助廖承志工作。在党内成立了文化委员会。

这批进步文化人士荟萃香港，在我党领导下，利用各种方式宣传抗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使香港成了对国内外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基地。当时在香港的进步报刊和通讯社有：由邓文田、邓文钊督印，范长江为社长，胡仲持为总编辑的《华商报》；以梁漱溟为社长，萨空了为总经理，俞颂华为总编辑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由范长江、夏衍、黄药眠等主办的“国际新闻社”；由乔冠华、胡一声、吴全衡、郑书祥、郑展志等主办的“香港中国通讯社”等。进步刊物有：以邹韬奋、茅盾、夏衍、金仲华、沈志远、胡绳、千家驹等人为编委的《大众生活》；宋庆龄主办的《保卫中国大同盟》英文半月刊；茅盾主编的《笔谈》半月刊；周鲸文、端木蕻良主编的《时代文艺》；俞颂华主编的《国讯》；张铁生主办的《青年知识》；马国亮办的《大地画报》；丁聪、胡考、特伟还编了一本反映新四军浴血抗战的画册《团结抗日大画史》等。文艺方面，有夏衍、于伶、金山、宋之的、王莹、司徒慧敏等组织的“旅港剧人协会”剧团，演出了《雾重庆》、《希特拉的杰作》、《北京人》、《愁城记》等话剧。电影方面，有蔡楚生执导的《孤岛天堂》；许幸之参加拍摄的《阿Q正传》。歌咏团经常演唱聂耳、冼星海、贺绿汀等人创作的抗日救亡歌曲。这些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的活动进一步鼓舞了国内人民和海外爱国人士抗日保乡的热情，香港的抗日救亡呼声也更加高涨。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皖南事变”，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人还联名给蒋介石写公开信。邹韬奋、茅盾、金仲华、恽逸群、范长江、于毅夫、沈兹九、沈志远、韩幽桐等九人还发表了《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他们列举事实，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压制和迫害抗日进步力量，驳斥其“剿共”谬论。

这些进步人士，在香港以各种形式鼓吹抗日，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给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以沉重的打击，也引起了日本侵略者、汉奸走狗以及国民党顽固派对他们的忌恨。

## 二、香港沦陷与营救计划的形成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军轰炸九龙启德机场，接着，六万多日军从深圳河越过边界，向九龙推进。由于港英当局毫无准备，港九英军一触即溃。十二日，九龙失守。十八日，日军在香港的北角登陆。十二月二十五日，港督杨慕琦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军占领香港后，大肆奸淫掳掠，港九海峡漂浮着一具具中国人的尸体。为了搜捕抗日分子，他们封锁港九交通，实行宵禁，分区分段进行搜查，还限令文化人士前往“大日本行政部”或“报导部”报到。形势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十分危险。

我党中央和南方局时刻关心这些人的安全。当日军开

始进攻九龙时，廖承志等领导人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派乔冠华、叶以群到九龙，把能找到的人迅速护送至香港；一时找不到的，立即通过交通站通知他们转移。到了港岛，大部分人集中到皇后大道中八路军办事处开办的商行里。廖承志逐个向他们询问情况，给他们落实住处，交待联系方法。对于原住在香港的文化人士和工作人员，则要他们立即搬家，除了规定的单线联系人外，断绝一切来往，并且要求所有的人一律改穿“唐装”，以小商人、店员、职员的身份隐蔽起来，等候撤离香港的通知。

在日军向港九发起进攻的当天，我党中央即急电指示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等同志，要多方设法保护这些人士撤出港九，到东江或南洋，或经过我区再到其他安全地区。南方局接此指示后，也急电我驻港各负责人及南委、东江游击队领导同志，要他们坚决执行中央指示，不惜任何代价，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营救出滞留港九的文化界精华、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一些国际友人。

由于港战，香港党组织领导人分散隐蔽，失去联系。港战一结束，他们互相派人联系。在香港一个防空洞里，刘少文的爱人罗晓红找到了廖承志，这样，廖承志首先与刘少文取得联系。接着，其他领导人也一一联系上了。廖承志即分别向党中央和南方局派驻香港的李少石、刘少文、潘汉年，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等人通报中央、南方局指示及营救文化人士的意见。并通过交通员向粤南省

委书记梁广转达了中央电报精神。为了尽快安排好沿途护送、接待工作，廖承志决定提前离开香港，把香港的组织营救任务交给了刘少文。

一九四二年元旦，廖承志即和连贯等冒着危险，星夜偷渡九龙，在上海街的一幢楼房里，和东江游击队政委林平等具体研究了营救工作的部署。大家分析当前形势，认为：营救工作要冒极大风险，但是也存在一些有利条件。首先是我们在香港有群众基础，可以协助营救。其次，在日军初占九龙时，我东江游击队即派出两支武工队进入九龙开辟了新区。一支由黄高阳、曾鸿文率领，活动于元朗、荃湾一带；一支由黄冠芳、刘黑仔、刘春祥率领，活动于九龙城以东和西贡、沙头角一带。他们不仅在当地打击敌伪、土匪，保护群众利益，还团结了爱国士绅和有民族意识的绿林好汉。现在他们已经站稳了脚跟，开辟了两条通往宝安游击区的交通线：一条是从九龙市区经荃湾、元朗进入游击区的陆上交通线；一条是从西贡到沙鱼涌的海上交通线。这就能让文化人在离开九龙市区之后，即置于我武装力量保护之下，安全到达游击区。第三，根据准确情报，敌人将大量遣散居民，以解决粮食匮乏之恐慌，这就给我们提供一个撤退的极好机会。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日，廖承志、连贯、乔冠华从九龙往西贡，坐船过沙鱼涌，前往惠阳游击区。临行前，廖承志把八路军办事处的机要干部潘静安留下来协助刘少文工

作，并把营救对象的名单和身上仅有的几百元港币和美钞交给了潘。潘静安在张友渔、徐伯昕的帮助下，首先找到了柳亚子和他女儿柳无垢。接着又在便罗臣道找到了何香凝一家和邹韬奋、茅盾、叶以群等人。在此关键时刻，粤南省委、香港市委派来了黄施民和陈文汉协同潘静安进行营救工作。他们逐个找文化人谈话，交待集中日期，商量脱险方法，把在港文化人士、民主人士一个个联系上了。

送走了廖承志，林平和张文彬立即从九龙赶回到宝安游击区。他们和司令员曾生等人迅速在东江游击队中进行了紧急动员。同时指定副司令员王作尧安排从九龙到白石龙沿途的护送工作。

廖承志到达惠阳后，沿惠州、老隆北上韶关，沿途向东江前方特委、惠阳县委、东江后方特委、粤北省委等党组织传达中央指示，安排接应工作。并把连贯留在老隆，调度惠州、老隆、兴梅一线的转送、接待工作。乔冠华留在韶关主持文化人士向省外转移。廖承志自己则准备亲赴重庆，向南方局汇报香港沦陷后的工作。

这样，一次大规模的营救行动就紧张地展开了。

### 三、一次大规模的营救行动

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派出大批特务，搜寻我党干部、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一个名叫何久田幸助的日本文化特务，在香港各个影院打出幻灯，点名“请”梅兰

芳、蔡楚生、司徒慧敏等人到半岛酒店（沦陷初期日军司令部所在地）会面。

在这紧急关头，廖承志等领导同志决定，必须让被敌人点了名的人和在香港时间长，接触面广的人立即撤走。当时东江游击队的接应工作还未准备就绪。部分撤退人员即在范长江的组织下，分四批陆续从香港坐船到澳门。然后，或经石岐、江门、台山到桂林；或经广州湾、钦州、灵山、柳州到桂林，这就是营救路线的西线。从这条线走的有：华嘉、孙晓恩、孙明心、范长江、夏衍、蔡楚生、司徒慧敏、金山、金仲华、千家驹等几十人。

何香凝和经普椿母子、柳亚子父女是我们营救的重点。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香港海陆丰会馆的地下党组织派专人护送。一月十日左右，他们秘密从香港坐小船到长洲岛，然后换乘两艘大船直达海丰的汕尾港和马鬃港。宋庆龄则是在日军轰炸启德机场前六小时，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香港赴重庆的。

大批的被营救者不可能都走水路，而是走东江游击区这条线的。走这条路线的第一步是先从香港偷渡到九龙。首先碰到的就是怎样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这些人。虽然廖承志临走时交下了滞留香港文化人士的姓名和地址，可是由于战乱及躲避敌人的搜捕，这些人大多数转移了。办事处工作人员在当地党组织的协助下，凭着道路熟悉等有利条件，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一个一个地找到了营救对象。

他们用重金雇了一条大船和几条小艇，停泊在铜锣湾避风塘中间。从一月初起，每天黄昏，籍着暮霭的掩护，一批批化装成难民的文化人，冒险绕过敌人的岗哨，被带到避风塘，用小艇接到大船上集中。第二天凌晨，乘海面有雾，能见度低，就分批乘小艇溜进大海，送到九龙的红磡上岸。然后，交通员把他们带到指定地点，交给在九龙接应的李健行。

最后一个撤离香港的是科普作家高士其。他是一九三九年从延安来港就医的，香港沦陷时，由于瘫痪，不能跟着大队撤退。一九四二年二月，党组织指派黄秋耘专程护送他回内地。在十几个回国就学的青年协助下，他们从香港坐船到广州，然后经清远、三水到韶关。在三水县城和芦苞之间，由于没有交通工具，地下工作者和青年们就轮流背着高士其，通过了四华里的“无人地带”。

由于撤退工作抓得紧，所以当敌人在报纸上以“内山完造”的名义邀请茅盾、邹韬奋去“共商大东亚共荣圈建设大计”时，他们早已到达东江游击区了。到二月底，大批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已安全撤出了香港。

被营救者到达九龙后，一般都要过一夜，然后分两路进入游击区。一路是从西贡坐船到宝安的沙渔涌、上洞，转到惠阳的坪山、淡水等地；一路是从陆路进入宝安龙华。为了使大批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迅速疏散开去，事先在九龙佐敦道、花园街、上海街、窝打老道等多处建立了

秘密集中点，供被营救者住宿。这些人在九龙停留时间虽短，但每天上百人的食用，却是一个大问题。负责九龙接应工作的同志，往往要一大早就去日寇指定的购粮点排队，常常遭受敌人的侮辱和毒打。从九龙到宝安一般要走两天，并且要翻越大雾山，许多被营救者不习惯长途步行，地下工作者便动员了很多回内地参加抗日的青年同行，以便路上照顾他们。

东江游击队派出了最有经验的交通员带路，并派出武装人员在一些险恶地段护送，使脱险者顺利通过日军岗哨和土匪出没地区。他们从九龙出市郊，经荃湾，翻越大雾山到元朗，然后渡过深圳河，穿过皇岗、赤尾到达宝安游击区的前线基地——白石龙。

白石龙地处宝安阳台山区，是东江游击队的前哨阵地，南边距敌占区不过几十华里，北面是国民党顽固派的防地。当时游击区的范围很小，敌人经常来骚扰，经济上也不充裕。大批脱险者来到游击区后，部队的经济更显拮据。当时每个战士一天的生活费仅生油五钱、菜钱一角，有时还要靠野菜过活。部队领导号召全体指战员，为了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就是自己勒紧腰带，也不能让文化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受饿。为了解决经费困难，部队派出许多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到新区去设税站，派人到二、三百里外去买米。

当惠阳方面的接应准备工作完成之后，一月十九日，

第一批脱险者开始离开白石龙。这批人有茅盾夫妇、叶以群、胡仲持、廖沫沙等。他们在游击队武装护送下，连夜通过广九铁路，穿过戒备森严的封锁线，昼伏夜行到达惠阳游击区的坪山、周田等地。就这样，一批批人在游击队的武装护送下来到了惠阳游击区。

一些受国民党通缉或注意的文化人士，在宝安游击区住了一段较长的时间，有的直到四、五月份才离开，如邹韬奋、戈宝权、沈志远、黎澍、胡绳等。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有的参加游击队的宣传教育工作，有的为战士上文化课。四月间，国民党一八七师等部队五千多人全面进攻惠（阳）东（莞）宝（安）游击区。文化人和游击战士并肩战斗，粉碎了顽军的进攻。在他们将离开游击区时，曾立了一块木碑，签名题诗，纪念这段终生难忘的日子。

离开宝安游击区，前站就是惠阳县城惠州。当时，惠州的情况很复杂，敌伪顽都插手其间，而我党组织自一九四〇年顽固派围攻惠宝人民游击队后，已全部撤出惠州。顽固派得知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已从香港撤出，便派出许多特务到东江一带侦查，并借口防止日特，限令凡从香港去内地的人都要亲自到指定的地方领取“难民证”。

为了使脱险者能顺利通过顽固派的关卡，地下党组织通过商行的关系，从国民党惠龙师管区司令部买到几百张难民证，发给被营救的人们。然而，更艰巨的是要摸清惠州敌伪顽的情况，设法建立接待站，于是，前东特委和惠

阳县委派了卢伟如以“香港业昌公司”经理的身份进入惠州。同时，连贯也派廖安祥来惠州开设源吉行，协助卢伟如。游击队又从香港运来一批煤油、棉布、汽车轮胎等热门货给他们。一时，商人和国民党军政人员趋之若鹜，卢伟如就在与这些人周旋中，站住了脚跟。此外，在廖承志安排下，第三党也利用他们在惠州开设的东和行协助营救工作。

一九四二年旧历除夕，第一批脱险者到达惠州，此后，陆续有大批人到达。从惠州到老隆，主要是走水路。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护送方法：对于未受国民党注意的人，公开坐客轮走；对于已受国民党注意或被通缉的人，则化装后通过内线乘坐国民党官员运私货的船走，或者由地下党租船，安排自己人驾驶，这样就更能保证安全。

到了老隆，有的人经兴宁、梅县、大埔等地的接待站前往闽西南，有的暂时隐蔽下来，有的则辗转到了苏北根据地。多数人则从老隆经韶关前往桂林。在老隆和韶关，我党是通过统战关系，利用商行来完成接待和转送任务的。如老隆的义孚行、侨兴行办事处，韶关的侨兴行和香港汽车材料行等，都与我地下党有关系。他们不但为疏散人员提供住宿方便，而且提供交通工具。在国民党广东省临时省会韶关，我党还通过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协助，使脱险者的安全得到了保障。

离开韶关，脱险者便可乘坐火车经衡阳到桂林。一九四二年一月至五月，除了邹韬奋外，被营救的人都安全离开了广东。邹韬奋为了避开国民党的追捕，在我党安排下，到梅县江头村隐蔽，至九月下旬才离开广东，经武汉、上海前往苏北。

在桂林，国民党当局为了争取人心，假惺惺地派人设立机构，招待从香港脱险出来的文化人士。南方局指示在桂林的李亚群以及以后脱险到来的夏衍、张友渔等人，利用这个条件顺水推舟，用国民党的经费把一些可以公开的人士送往重庆，而对一些不宜公开身份的人，则秘密转送到苏北新四军驻地。

#### 四、历史的功绩

一九四二年的营救行动，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历史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次行动，我党从香港营救出抗日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及其家属共八百多人。其中有：何香凝、柳亚子、陈汝棠、李伯球、梁漱溟、邓文田、邓文钊、邹韬奋、茅盾、沈志远、张铁牛、张友渔、韩幽桐、张明养、胡绳、吴全衡、羊枣、千家驹、黎澍、叶籁士、范长江、金仲华、杨刚、乔冠华、徐伯昕、梁若尘、夏衍、胡风、周钢鸣、戈宝权、叶以群、高士其、蔡楚生、司徒慧敏、沙蒙、金山、王苹、章泯、宋之的、于伶、许幸之、凤子、赵树泰、李枫、蓝马、盛家伦、郁

风、叶浅予、特伟、胡考、成庆生、叶方等等。还接应了二千多名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的爱国青年。

香港沦陷时，国民党也有不少官员及其家属滞留香港。我党在营救爱国民主人士、文化人士的同时，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命令党员和游击战士对爱国抗日的国民党人士，不念前嫌也给予救援。当时国民党政府驻香港代表海军少将陈策，就是由我游击队提供的脱险路线，穿过犬牙交错的敌占区，而得以安全脱险的。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夫人上官贤德，甚至电影明星胡蝶，都是我东江游击队护送下，逃出日本侵略者虎口的。

香港沦陷后，大批英国官兵和各国侨民被关进了集中营。我东江游击队和当地党组织根据中央指示，也尽力帮助，予以营救。在这次营救行动中，帮助了近百名国际友人、英军官兵及美、印、荷、比等国的侨民脱离虎口。他们之中，有赖特上校、京中校、祁德尊少校和谭臣警察司等军政人员；有渣甸公司的波吉生，上海银行的芬恩维克和摩利逊等国际友人。英国军事当局，正是从这次营救中认识到与我党领导下的游击队合作的重要性。一九四二年七月，经我党中央的同意，英国在桂林成立了一个英军服务团的组织，赖特上校任指挥官，前进总部设在惠州，由祁德尊少校负责，并派出何礼文上尉与游击队配合，深入港九腹地，继续营救集中营被囚人员和收集情报，一直到日寇投降前夕。

这次大规模的营救行动，不仅营救的人数众多，行程之远也为前所罕见。从香港到东江、韶关、桂林、重庆、上海及苏北，足迹遍及十一个省市，行程万里以上。参加营救的人员也很广泛。在党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各级地方党组织以及武装部队、统战组织都动员起来了。营救工作之出色，使得不论朋友或敌人都感到十分惊奇。

这批爱国民主人士、文化人士无一损失地脱险后，有的到了大后方，有的到了抗日根据地，在推动抗日爱国民主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抗战胜利后，他们不顾国民党的迫害，又投入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坚持和平、反对内战的斗争，为新中国的诞生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全国解放后，很多人都参加了国家或地方的领导工作，或负责文化、艺术等部门的领导工作。

在这次营救工作中，很多民主党派人士和党外朋友亲眼见到或亲身感受到，在危难的紧急时刻，中国共产党不是只顾营救自己的干部和工作人员，而是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来救援众多的共同抗日的人士，包括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家属。从而使他们看到了共产党广阔的襟怀，坚定了和共产党合作的信心和决心，真诚和我党合作共事。

我党营救国际友人的事迹，在国际上也产生了极大影响。抗战胜利后，英国方面为了感谢东江游击队，特邀请当年负责国际友人营救工作的黄作梅到英国访问并授予他勋章。赖特上校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名叫《香港抗日战争

中的英军服务团》，其中有不少篇幅记述了当年我游击队营救英军的事迹。

一九四二年这场大规模营救行动，虽然已经过去四十三年了，但我党对爱国民主人士、对知识分子爱护的态度，不惜一切代价营救“精英”的精神和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及对爱国的国民党人士的政策，是令人永远不能忘怀的，对我们当前和今后的工作仍具有指导意义。

**（谭力沛、朱生灿、陈军号、杨锦照征集整理）**

## 关于胡世合事件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工运组  
重庆市工人运动史编写组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日，在国民党政府的陪都重庆，由于特务分子田凯枪杀电力公司工人胡世合，触发了一场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反对国民党特务统治的大规模群众示威。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正确领导下，重庆工人经过十天激烈顽强的斗争，终于迫使国民党当局在群众面前屈服，枪毙了杀人凶犯，抚恤了受害者家属。

这场斗争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特务统治，推动了国统区民主运动的进一步高涨。



胡世合事件是因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违章用电，电力公司派工人前去剪线反遭特务毒打和枪杀而引起的。

抗战时期，随着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工厂倍增，人口迅速增加（由战前的四十万增加到一百万），工业用

电、照明用电均已供不应求，加之不断遭受日机轰炸，重庆电力公司损失很大，因而出现了严重的电荒。电力公司虽一再呼吁，有关当局亦明令对偷电行为“严加取缔”，但少数特权者仍然置若罔闻，特别是国民党军警宪特机关偷窃和浪费电力极为严重。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安装在大梁子的变压器因负荷过重被烧坏后，原属该变压器供电的邹容路用户——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竟私自将其电源线移接到都邮街的变压器上，致使这台变压器也负荷过重，有被烧坏的危险。重庆电力公司于二月十九日派工人前往取缔，但却遭到该饮食部的阻挠。饮食部对外经理、特务江德茂率领爪牙毒打了工人，继续强行违章用电。

中韩文化协会与亲蒋的“大韩民国”流亡政府以及韩国光复军的关系极为密切，又有吴铁城、潘公展、徐恩曾等国民党重要官员为理监事。该饮食部有此靠山，又是特务经常聚会的地方，平素横行不法，出售禁售的酒、肉，连军警也不敢过问。这次他们的不法行为，引起电力公司广大职工的不平。工人们坚决要求取缔非法用电，不向恶势力低头，得到了有正义感的工程师、直接管理此事的公司业务科用户股股长章畴叙的支持。次日（二月二十日）又派工人前去剪线。为防不测，敦请第二警察分局警察同往。该饮食部闻讯后，立即邀集武装保安队将随工人同往的第二分局警察喝退，未等电线剪除，该饮食部经理吴汉治即指使爪牙大打出手，高喊：“打死人有我经理负

责。”于是暴徒们不由分说将工人围住，或拿板凳棍棒，或拿刀枪，以七、八人打一个或五、六人打一个之绝对优势，纵情乱打。当即就有工人刘振基、张光荣、吴兴方和胡世合被打伤，并被扭送保安总队问罪。行至民国路口时，特务分子、该饮食部外交经理田凯冲上前来，开枪向胡世合射击，弹中小腹。当暴徒们将胡拖至保安总队时，胡已面无人色，坐立不稳。过了好久，始准工友将生命垂危的胡世合送往宽仁医院，终因失血过多而惨死途中。

杀人凶手田凯，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的额外稽查、警察局侦缉队员。由于他对上极尽阿谀逢迎之能事，因而深得上司的器重，当上了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的外交经理和保护人，成了重庆臭名昭著的“九妖(么)十八怪(凯)”<sup>①</sup>之一，又是流氓帮会袍哥德字孝义社的三爷。

特务的罪恶行径，早已天怒人怨，残杀胡世合的暴行，更激怒了重庆电力公司工人和广大市民。噩耗传至大溪沟电力公司第一发电厂，该厂立即开三辆卡车二百余工人到都邮街，会合用户股工人约共三百余人，前往中韩餐厅，打毁一切用具，并将胡世合的遗体安放在该饮食部的大厅里。工人们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严惩杀人凶手，表示“不枪决特务，不让死者入棺”。消息传开，全市工人和一切善良的人们都对受害者寄予深切的同情，纷纷赶往肇

---

<sup>①</sup>“九么十八凯”系指重庆九个流氓袍哥中的老么和十八个以“凯”字为名的特务。“九妖十八怪”是重庆人民对他们的贬称。

事地点，支持电力工人的正义斗争，抗议国民党的特务统治。这一天，闻讯赶来的群众约有五万人，邹容路上人山人海。“杀人偿命”、“交出凶手来”的怒吼声连连不断。

## 二

斗争形势的发展，要求党迅速作出正确的决策。当时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不在重庆，南方局的工作由王若飞同志负责。事件发生后，重庆电力公司的地下党员周力行立即向组织汇报了情况。南方局当即决定因势利导，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集中目标打击国民党的特务统治，要求惩办凶手，保障人权，促进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开展。

南方局的这一决策，是基于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和敌我力量的估计。抗战以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虽然被迫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但仍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三年六月，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在其统治区内，竭力加强法西斯特务统治，重庆尤其是国民党特务的大本营。军事上，国民党军队连连失利。豫湘桂战役大溃败，国民党军队在日军未到时，就望风而逃，以至日军从湖南进入广西，从广西又进入贵州，直至独山失守，重庆也受到威胁。与此同时，国统区物价高涨，企业倒闭，人民生活痛苦不堪，整

个国统区形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局面，各阶层人民对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已经忍无可忍，胡世合惨案发生后，重庆人民的愤懑情绪更加不可遏止。一个孕育已久的人民反抗怒潮已经兴起，极需要党组织加以正确的引导和组织。同时，国民党特务早已成为众矢之的，开展群众性的反特斗争，也会得到社会上，包括上层民主人士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尤其是，南方局和川东地下党组织，正确贯彻执行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和周恩来同志提出的“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原则，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工作，已在重庆各界人士中建立起许多与我党有密切联系的秘密组织，在工人中也积蓄了相当的力量，团结了一大批积极分子（重庆电力公司就有一个与南方局青年组联系的三人中心小组）。这一切，就为革命风暴的来临准备了条件。

为了领导这场运动，南方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王若飞同志统一指挥全局；以刘光同志为首的青年组具体负责组织行动；《新华日报》联络各报广为宣传，并通过报道传达南方局的决策，指导运动发展；其他各部门密切配合，同时也给川东地下党作了相应的布置。为了加强第一线的领导，还把原来由董必武同志直接领导的电力公司周力行同志的党的关系交给青年组联系，并在电力公司成立了地下临时指挥小组（有周力行、邓鑫丰等人参加），在

重庆二十梯张定同志的家里设立了秘密指挥部。<sup>①</sup>这样，一场以电力公司工人为中心，得到全市工人和广大市民积极响应的群众性反特斗争，便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起来。

二月二十一日，青年组召开“据点”会议，对电力公司的惨案作了全面分析和讨论，对这场斗争的性质、前途和意义作了估计。决定给电力公司全体职工提出明确的斗争口号，并立刻以全力使惨案的真象传布出去。

首先是重庆电力公司的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立即行动起来。他们利用公司的产业工会召开了职工代表紧急会议，组织了“胡世合事件伸冤后援会”，推动工会理事杨秀葵等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惨案经过，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1）立即将凶手田凯在肇事地点枪决；（2）以帮凶罪惩处伙同行凶的警察局保安队员；（3）保障电力公司职工今后工作的自由和生命的安全；（4）受害工友胡世合的善后和抚恤问题，应由中韩文协餐厅完全负责，并要求两天内给予答复。

与此同时，重庆电力公司全体职工发出了《为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非法接电，并公开聚众暴行，枪击本公司执行业务人员致死，敬向社会人士吁请主持正义启事》。受害者家属也发出了《为家主重庆电力公司工人胡世合奉命

---

<sup>①</sup>张定是燕京大学学生，“民青”成员，这时因要求工作来到重庆，在南方局青年组张黎群同志直接领导下开展活动。

执行业务时惨遭暴徒枪杀毙命殉职泣请社会人士主持正义代为伸冤启事》。青年组还帮助电力公司职工用通俗的文字写成一个向各业工友和社会各界人士求援的宣言，并进一步提出八项最低要求。

电力公司工人和受害者家属的血泪控诉和合理要求，赢得了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国民公报》、《商务日报》、《新民日报》和《大公报》等几种报纸，分别报道了有关消息。二十二日，有的报纸还刊登了电力公司职工的启示。《新华日报》更是给了电力工人以强有力的指导和声援。它除了详细报道了惨案经过和工人的要求外，还以《不能忽视的一件惨案》为题发表社论，对重庆电力公司工人表示深切的同情，对国民党特务的暴行表示极大的愤慨。社论指出，这“是一件与全市市民生命安全有关的大事件，谁也不能默尔而息。”

然而国民党当局却百般为杀人凶手开脱，一方面动员大批特务制造谣言，歪曲事实，妄图窒息群众的反抗情绪；一方面公开袒护特务田凯。重庆市警察局长唐毅二十二日发表谈话，说：“有着米色中山服者前往查询，出枪示威，失火误伤该公司工友胡世合。”并替田凯出主意，叫他去侦缉队自首，承认是“手枪走火”，以便以“过失杀人”，减轻罪责。《新华日报》当即给予驳斥，以《这场人命案》为题发表短评，指出唐毅的谈话妄图把肆意行凶的特务田凯说成是无从查考的“着米色中山服者”，把

故意射击说成是“走火误伤”，从而使“一场偷电行凶、击毙人命的大案，就此轻轻过去。”一针见血地揭露了问题的实质。

与此同时，南方局青年组等部门和川东地下党组织，通过各自联系的“据点”等多种渠道，将惨案的真象及斗争的方针策略，迅速地传播到其他工厂、机关和学校，并发动各厂工友和青年学生用行动来援助电力工人的斗争。对社会上民主党派和人士，也利用一切机会向他们说明事件的真象和工人的合理要求，动员他们以公开发表谈话、参加吊唁活动等方式，谴责国民党特务的罪行，支持工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正 义斗争。

经过南方局青年组等组织的秘密发动和《新华日报》的公开宣传，一场大规模群众性的反特斗争迅速席卷了山城。短短几天之内，胡世合惨案就变成了重庆街头巷尾谈论的中心。严惩凶手、保障人权，更成了全市人民的一致要求和共同奋斗的目标。各厂工人对电力公司的工人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和援助，仅重庆印刷厂工人就捐了五千元给胡世合的家属，民生机器厂工人则自动油印了八百份传单，南岸纺织厂工人也油印了一册《追悼胡世合工友纪念册》，一部分机械工人还组织了“援胡委员会”。青年学生更是对特务的暴行义愤填膺，沙坪坝一群大学生写了抗议书。工商界人士对胡世合惨遭杀害，也都表示愤慨，有的商店老板自动将橱窗里“不顾血本大贱卖，买一送一”

等招徕顾客的广告，换成“以血还血”等挽联或标语。

国民党当局妄图一手掩盖天下人耳目的阴谋遭到彻底粉碎后，重庆市市长贺耀祖等人又出面活动，他公开发表谈话，声称“‘过失杀人’、‘自卫走火’当属臆测，自非定案”，凶手“已押解卫戍总部交军法审讯”，并宣布“将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予以封闭”，企图以此平息众怒。同时他又胁迫工人照常工作，“静候政府处置”，还以“有碍国际观瞻”、“有碍交通”为由，迫使电力公司将胡世合的灵柩移到比较偏僻的长安寺，以便缩小事件的影响。

然而事态的发展，恰与国民党当局的预料相反。二十三日，重庆市各业职工团体，在特务肇事地点举行追悼会，到场吊客有各业工人队伍及个人凡三万余人。二十五日被迫移灵后，前往长安寺灵堂致祭的工人和市民更是络绎不绝，其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血气方刚的青年；有西装革履的商贾，也有长袍大褂的士绅。各阶层各人民团体及个人送的挽联，高悬灵堂内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词句无一不道出了人民的心声：“这是什么世界人当狗屠，且看如此社会狗把人吃。”“特务横行何处去，民主自由几时来。”……

在谈判桌上，工人们始终坚持“枪毙田凯，杀人偿命”的基本要求，并一再表示，如不枪毙田凯，就将在全市停水停电，还用“小广播”的方式透露消息，请市民储

水备用。这对国民党当局是极大威胁。

面对着势不可挡的抗议怒潮，国民党不得不以牺牲一个特务来了结这一事件。二月二十六日，作恶多端的杀人凶手田凯被押赴菜园坝刑场执行枪毙。消息传来，人心为之大快，全重庆市的工人和市民无不奔走相告，《新华日报》、《新民报》、《新蜀报》等也都发表文章，欢呼这一重大胜利。

这时，南方局估计到这一斗争将基本告一段落，于是立即把工作转移到进行扩大的追悼和隆重的送丧，以扩大战果和影响，进一步打击国民党特务的嚣张气焰。

在工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下，国民党被迫同意从二十七日开始，为胡世合举行公祭。二十八日，重庆市长贺耀祖不得不亲临“主祭”，还给胡世合家属发放了十万元抚恤金。公祭过程中，虽然有特务在灵堂内外捣乱，但前往致祭者始终川流不息。除电力公司各电厂的工人外，还有中央印制厂、申新纱厂、民生机器厂、自来水公司、重庆电信局等单位的职工。一些著名民主人士也参加了公祭。成都等地的工人代表也远道赶来吊唁。祭堂搭的松柏牌坊及席棚，长数十丈，堂内满悬工人和各界人士送来的挽联和花圈。公祭原定三天，第一天公祭就有八万人参加（前后共约二十万人），浩大的声势引起国民党的恐慌，他们便借口“时间长了有所不便”，勒令胡世合殡仪提前于三月一日举行。

公祭实际上成了抗议特务暴行的空前盛大的群众大会，出丧更成了要求保障人权的大游行。这天下午一时起灵，行列的前面由四川水泥厂的巨幅白布横旗开道，上写“义之所在”四个大字。接着是挽联和挽幛。义正辞严的挽词，有力地戳穿了国民党反动派所谓“保障人身自由”的无耻谎言，加深了人们对国民党特务的仇恨。挽联后面，除电力公司和自来水公司的职工外，是民生机器厂等工会派来的代表们。途中虽然有特务分子阻拦，但仍有市民及各业工人自动参加，送丧行列不断延长。在万人空巷的市民围观中，送丧的行列由长安寺出发，经民族路、民权路、民生路、中一路、中二路、中三路，到大溪沟，一路浩浩荡荡。在机房街、都邮街等处，都有商店公司摆设香烛、猪头、公鸡、鲤鱼等物举行路祭。灵柩抵达大溪沟时，工厂汽笛长鸣，它既是向受害者表示沉痛的哀悼，也是宣告这场反对特务暴行，争取保障人权的群众斗争取得了胜利。

### 三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陪都重庆，以打死一个工人而能迅即使凶手特务伏法，并为受害者举办如此盛大的丧事，这确实是空前的壮举。

中共中央南方局抓住有利的时机，广泛发动群众，充分运用了党对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策略原则，是这次斗争

之所以能够迅速获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回顾这次斗争的整个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南方局除了广泛发动基本群众与敌斗争外，还紧紧抓住了以下几个环节：

（一）调动电力公司职员和公司当局的积极作用，发挥统一战线的威力。

这次斗争的特点之一，是充分发挥了党的统一战线的作用。首先是职员和工人的团结一致。在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下，职员和工人一样，也深受特务的迫害，对特务的暴行非常痛恨。在这次斗争中，电力公司的中下级职员除个别特务分子外，可以说全部站在工人一面。他们比较接近工人，他们的意见比较容易为公司当局所采纳。所以，职员成了联系工人，向厂方传达工人要求的很好的桥梁。他们为这场斗争出了很多主意，送给工友胡世合的挽联特别多，对这次斗争的态度也很坚决，如用户股长章畴叙说：“工友的生死就是职员的生死，我们要为死者报仇，为生者争取安全，不得到合理解决，我们誓不终止。”

其次，是工人和电力公司当局之间的合作。重庆电力公司是一个由四川地方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合办的公用事业单位，和国民党中央势力之间存在着矛盾。在货币不断贬值，公司所需的器材、燃料等不断涨价而电价却得不到相应调整的情况下，公司蒙受巨大损失。虽一再呼吁，但特权者仍横行无忌，大量偷电，还常打骂公司执勤人员，公司也无可奈何。所以事件发生后，仅出于公司本身的利益，

他们也希望用工人的力量来打击一下特权者的气焰，反抗国民党中央势力对他们的限制，以维系其生存。南方局对此有深刻的了解。在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就通过地下党员和工人中的积极分子鼓动公司联合工会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真象，反映工人的合理要求。当国民党当局找公司代总经理浦心雅交涉，妄图“和平解决”时，浦氏回答：“我没有办法，我只有一个脑壳。”在整个斗争中，对于大批职工参加斗争，特别是用户股职工全部停工给胡世合办丧事，公司也未加阻拦，并且还为胡世合做了道场。

职工团结、劳资协作，无疑对斗争的胜利起了一定的作用。

（二）利用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的矛盾，利用国民党工会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

在这次斗争中，南方局不仅利用了国民党政府当局与电力公司当局之间的矛盾，而且利用了国民党特务内部派系之间的矛盾，即“C C”与“复兴社”的矛盾。当时重庆市总工会为“C C”派所掌握，而警察局则属“复兴社”系统，他们之间经常勾心斗角，时有摩擦。胡世合事件一开始，一方面是电力公司工会的要求，一方面“C C”也想借此机会打击一下复兴社的势力，以便在下届国民党市党部改选中与自己的竞争对手相抗衡，于是市总工会曾一度对工人的要求采取同情和协助的态度，召集了四十多个分会开会，商讨声援办法；成立了胡世合治丧委员会和

伸冤后援会；要求枪毙田凯等等。虽然后来随着斗争的发展，他们的矛盾缩小，表现出派别利益服从于阶级利益，但即使是暂时的利用矛盾，对斗争也是很有好处的。特别是电力公司工会的理事长陈铁夫和副理事长杨秀蓁，他们要掌握工人，抬高自己的威信，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条件下反映工人的情绪和要求，所以在公司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的推动下，他们敢于出面用公司和工会理事会的名义主持招待新闻界，和国民党当局谈判，并要求市总工会声援。

### （三）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

南方局在领导这一场斗争中，特别注意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的结合，尤其注重用公开合法的形式掩护秘密荫蔽的活动，以达到斗争的目的。在发动和组织群众过程中，一方面积极运用党在国统区的公开报纸——《新华日报》及时报道事件真象、发表社论、刊登电力工人的呼吁书等大造舆论，利用电力公司和公司工会等合法机构组织后援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向社会呼吁声援；另一方面又设立秘密领导机构，建立指挥系统，通过地下党员和“据点”等秘密组织的骨干，把指令下达到基本群众。在斗争形式上，一面以工会的名义和国民党当局谈判，提出基本条件，设立灵堂，举行公祭，悬挂义正辞严的挽联，公开指责国民党的特务统治；一面又用“做道场”、“超度亡灵”等封建迷信形式掩护反特斗争这鲜明的政治内容，

既打击了敌人，教育了群众，又符合一般的传统习惯。这样，既显示了力量又不暴露革命骨干，既有效地打击了敌人又免授敌以柄。既保证了斗争的胜利发展，又保存了革命力量。

#### （四）坚持贯彻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

这场大规模群众斗争发生时，抗日战争虽已胜利在望，但毕竟还是大敌当前。在这种形势下，“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仍应“以不破裂合作抗日为条件”，在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中仍然必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在国民党高唱“保障人民身体自由”和“取缔窃电”声中，特务公然行凶，枪杀奉命执行取缔违章用电的工人，工人们奋起要求枪毙凶手，抚恤受害者家属，保障人权，反对特务统治，斗争本身就是合理的。如前所述，早在这场斗争刚刚兴起的时候，南方局就对形势、对斗争双方力量的对比作了科学的分析，并且充分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集中打击民愤最大的国民党特务统治，甚至把打击目标紧紧对准田凯，而排除了把市警局（特别是局长唐毅）也列为打击对象的主张（只是在群众中散布警察局是帮凶）。这就使这场斗争，能够作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与此同时，南方局也十分注意把握斗争的分寸。一，在斗争口号上不提“建立联合政府”等更高的主张，而是在“特务横行何处去，民主政治几时来”等挽联中，揭示出斗争的鲜明的政治意义，这样，行动的口号就与宣

传口号有机地结合起来，也增加了胜利的可能性。二，主要要求（枪毙凶手）上毫不妥协，次要问题上作了适当变通（如见于国民党规定战时的罢工将以汉奸论处，故在斗争中只散布停电空气，甚至以此为条件和国民党当局谈判，但并不明确宣布罢工；在保证追悼会实际上达到预期效果的前提下，在移柩问题上则未予坚持）；三，在基本实现了主要目标（枪毙了田凯）后，就乘胜收兵。对要求抬棺游行全城等意见进行了说服，特别是当送丧行列行至七星岗，部分挽联、祭幛等已开始遭到特务撕毁时，就坚决劝阻群众，迅速收兵，从而保证了这次斗争胜利结束，而未损失一兵一卒。

#### 四

这次斗争是自从贯彻党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以来，南方局直接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它以发动快、打得准、收获大、影响深而富有自己的特色，从思想上、组织上和干部条件等方面，为抗战后期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斗争提供了有利条件，具有极大的意义和深远影响。

首先是教育了人民，揭露和打击了国民党的特务统治。这次斗争一开始就有明确的针对性和政治目的（反对特务统治，保障人权），确定了准确的打击目标（枪毙杀人犯田凯），一切活动都围绕着揭露特务的罪行和国民党

的黑暗腐朽而展开。斗争的结局，又大大鼓舞了大后方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的斗争热情，增强了胜利的信念；同时也使敌人看到了人民的力量。斗争中，尽管国民党反动派凭借权力，软硬兼施，对付赤手空拳的人民，妄图扑灭革命烈火。但是在南方局的正确领导下，广大的重庆工人和市民团结一致，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终于赢得了胜利，使反动派威风扫地，狼狈不堪，而革命人民扬眉吐气，兴高采烈。连敌人自己也不得不被迫承认人民的力量不好惹，在工人们捣毁特务为田凯设立的灵堂中，发现一幅挽联，写下了他们的自供：“昨天你对我说杀人无罪，越多越好，呜呼！田大哥；到而今才知道民愤难平，罪该万死，哀哉！凯大爷。”

其次，这次斗争的胜利推动了国统区民主运动（特别是群众运动）高潮的到来。

这场斗争是经过长期沉寂之后，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发动的，是在贯彻党的“十六字方针”，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工作之后，对革命力量的一次大检阅。它的胜利，说明党的战略思想、领导方法的正确，说明了革命势力的发展壮大，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民主运动的发展。从此后，要求“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废除特务机构，建立各民主党派联合政府”的呼声更高，就工人运动而论，不仅重庆的工人运动进入一个高潮（这次斗争之后的半年中，重庆每个月都有罢工斗争发生，一九四五年六月以后的三个半月

中，规模较大的工人斗争即达二十七次之多；从一九四五年十月到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仅向国民党政府呈报在案的工潮就多达四百三十二起，参加的职工达九万九千六百九十六人，为重庆工运史上的洪峰）。而且对国民党其它地区的民主运动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如昆明的“一二一”运动、上海的“五·二〇”运动、武汉的硃口被服厂斗争等等，都一定程度地吸收了这次斗争的经验。

再次，通过这次斗争还锻炼了党的干部，培养了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积累了斗争经验，为以后开展革命斗争和壮大革命组织，创造了条件。

这次斗争，是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的一次广泛而深入的群众斗争，一些地下党员和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一道站在了斗争前列。在与敌人激烈的搏斗中，党员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提平了思想水高和工作能力，积累了斗争经验（尤其是纠正了党内一些同志认为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不可能的错误认识）。同时也涌现出一大批群众积极分子。自此以后，党和革命群众组织都有了新的发展。从电力公司内部看，经过这次斗争，在恢复组织发展的时候（地下党曾自一九四〇年起停止了发展党员），发展了一些积极分子入党，并建立了支部。电力公司以外的一些组织也有所发展。在这次斗争的基础上还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直接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活动，把重庆的工人运动推进到更加有组织的阶段。

# 南方局领导下的青年工作

( 1939. 1~1947. 2 )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青年组

## —

一九三九年一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下设青年工作委员会（简称“青委”），由蒋南翔任书记，何礼、杨述、郑代巩、袁汝镛等为委员；一九四〇年五月，刘光由延安调来任副书记。

当时南方局领导下的各省委、特委，大多数都成立了青委。

川东特委青委：书记杨述，杨撤走后为荣高棠。

川康特委青委：书记韩天石，委员康乃尔、邓照明、张文澄。后韩、康、邓都撤走，由张文澄负责。

云南省工委青委：书记何礼，委员胡昌治、郭佩珊。一九四〇年九月青委改组，书记杨天华，委员袁永熙、劳辛、李之楠。

湖南省委青委：书记于刚、李锐。

贵州省委青委：王玉慧（谐音）。

湘鄂西特委青年部：部长罗其南、何彬。

广东省委青年部：部长吴华、陈能兴。

广西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有沈毅然专作青年工作。

南方局青委在重庆地区还直接联系了一些基层组织。迄至一九三九年底，沙磁区建立了中大、重大、炼钢厂、炼油厂等十六个党支部，约有党员一百五十人。北碚特区以复旦大学力量为最强，约有党员五、六十人。与南方局青委有联系的还有江津白沙的女师学院、重庆女师、乐山武大、宜宾同济大学、三台东北大学以及遵义等地的大、中学校。

川康特委青委直接联系了成都的华西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等大中学校的党组织。其中以四川大学的党组织为最强，党员最多时达八十余人。

云南省工委青委直接联系了昆明一些学校的党组织，其中以西南联大为最强，有党员六十余人。

南方局青委领导的报刊有：

《战时青年》半月刊，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在武汉创刊。迁重庆后曾由蒋南翔主编，后来由袁汝鏞负责。

《青年生活》月刊，一九三八年九月由川东特委青委杨述、许晓轩、许立群等在重庆创办。从第四期起改为半

月刊，先后约出十期，一九三九年夏被迫停刊。

一九四〇年三月十四日，南方局青委还在《新华日报》辟《青年生活》专页，是双周刊。

川康特委青委曾出版《战时学生》旬刊。

南方局青委成立之初，就面临着极其严重的形势。这一方面是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就集中主要力量来反对共产党，镇压爱国民主运动；另一方面，也由于在广大进步青年和青年工作干部还普遍地习惯于抗战初期的那种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不能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客观形势。如何使广大青年，首先是青年工作干部认清形势，转变作风，掌握新的工作方式方法，是当时南方局青委极其重要的任务。因此，南方局青委从一九三九年四月开始，接连办了几期短期的党员干部训练班。参加学习的都是入党不久的年轻的党员。训练内容主要是关于政治形势和党的方针任务、群众工作、秘密工作。同年夏天，青委举行了有主要大学党支部书记以上的青年干部的学习班，时间长达三个多月。学习班上除了听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博古等负责同志的报告外，还着重地总结了经验，检讨了“救亡作风”。这几期训练班和学习班，对于青年工作干部提高政治思想水平、端正工作作风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九三九年八月，中共中央青委在重庆召开了大后方青年工作会议。凯丰主持会议，会议断断续续地开了一个

月。参加会的有各省委、特委的青委负责人十多人。会上，中央青委副书记冯文彬作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中央青委委员胡乔木作关于宣传工作的报告，中央青委委员、南方局青委书记蒋南翔作关于学生运动的报告。会议主要内容是传达中央关于国统区的工作方针，研究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后，如何开展青年工作的问题。决定今后工作应当充分利用公开合法团体开展活动，对于已经暴露的党员和干部则坚决撤离。会后，韩天石、杨述、许立群、李锐等人撤回延安。这样既保存了骨干力量，也保证了青年工作能够隐蔽地继续进行。

一九四〇年六月三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目前国民党区学生工作的几个决定》，指出：“今后国民党区学生运动的根本方针，应是长期的潜伏发展，积蓄力量，争取人心，故工作中心应由校外救亡工作立即转为校内学生工作。”《决定》还对学生工作作了一些具体规定：（一）党员应首先注意功课和操行；（二）争取大多数同学，应以思想的启发为主，提倡尊重人格，研究学术，暴露社会黑暗，介绍文艺作品和不违禁的较进步刊物，但并不放弃适当的共产主义教育，可能时可组织学术性、生活性、友谊性的团体；（三）对于学生合法团体，如学生会、女同学会、系会、级会、同乡会、青年会、音乐会、球队等，应依环境可能进行组织，多注意学生福利事业及民主作风；（四）争取好教员对我们的同情，麻痹坏教员

对我们的敌视；（五）经过积极分子参加与领导学生群众的斗争，在斗争中遵守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绝对避免支部及其负责人的暴露，他们应深深埋藏在学生群众中间；（六）领导学校支部的各县区青委，尽可能入校读书，已暴露的青年干部坚决撤退。随后南方局更根据党中央的“潜伏发展，积蓄力量，争取人心”的方针和有关指示，要求所有党员都必须有公开合法的社会身份，尽可能地广交朋友；当学生的要努力学好功课，有职业的一定搞好自己的业务。这就是所谓“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以后又提出要勤于调查研究。南方局青委坚决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决定和南方局的有关指示，在青年工作中实现了一次重大转变：在组织上，由公开暴露转变为荫蔽精干；在作风上，从“救亡作风”转变为埋头实干；在思想上，由只凭革命热情转变为既有革命热情又有清醒的政治认识。正是由于实现了这一转变，国统区的青年运动，才得以在国民党反动派掀起最大一次反共高潮中，保存了骨干力量，为以后的工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二

一九四一年一月，发生“皖南事变”，国统区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南方局青委领导下的一些基层组织，于事变前后疏散转移，或移交给地方党组织。青委成员大部撤走，书记蒋南翔也于事变后撤回延安。这时青委改为青

年组，仅留下刘光担任组长。先后参加青年组工作的有杜海人、何启君、朱语今、张黎群、刘叔晏、周力行、黎智、魏克、赖卫民等人。鲁明和黄若暉兼了一个时期青年组的工作。

“皖南事变”后，青年组积极而又慎重地开展了交朋友活动。开始，只联系了二十多个非党积极分子，其中也有暂时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员。这些人当中有大学生，有职业青年，也有青年工人。

到了一九四二年年初，青年组所联系的积极分子人数逐渐增多，除介绍到新华日报工作的三人外，还有六十六名。完全采取一个个单独联系的办法越来越感觉困难。许多积极分子要求组织起来，有个名称，以便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加强同党的联系。有些进步分子已经自动组织起来，如从川北国立六中被迫流亡出来的五十多个进步学生，在重庆、成都、贵阳等地发起组织“全国读书会”后被刘光劝阻。周恩来同志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就指示青年组采取适当形式把进步青年组织起来。他说：“干脆就叫‘据点’吧！我们在敌后安插了几个‘据点’，在这里也应该安插几个‘据点’”。这样，青年组就在重庆地区开始建立起“据点”来了。

“据点”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党通过个别党员或非党干部与群众联系的一种新式的桥梁。既非党内组织，也非定型的群众组织（无章程、纲领及定期会议和名义等）。

其结合完全是建立在友谊和共同的政治见解的基础之上。在同一生产部门或地区相熟悉的朋友就可以组成一个“据点”。这里所说的政治基础，就是接受共产党领导，信仰新民主主义，在工作中遵守“坚持抗战、争取民主、加强团结、为人民服务”这四条原则。交朋友，建立私人友谊，实际上就是发展同志式的关系。“据点”这个名称，只有与青年组直接联系的少数骨干分子知道。每一“据点”的几个同志又分别联系若干个小“据点”和个别进步青年。各“据点”之间不通横的关系。“据点”成员转移到新的单位或新的地区后，或仍与原“据点”保持联系，或另外发展新“据点”，并不转移关系。这种没有正式名称，没有固定形式的组织，可使“据点”下的每个进步分子都知道自己的工作是有组织有领导进行的（虽然多数人并不知道它叫什么组织、领导人是谁），又使反动分子、特务分子抓不着。一些基层单位在没有建立共产党和共青团的情况下，“据点”把进步青年组织起来了。

“据点”都是由三、五个彼此互相了解的进步骨干分子组成的，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潜伏发展，积蓄力量，争取人心”的方针和南方局的“三勤”政策。他们首先开展了交朋友的工作，从交友当中了解朋友，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逐步扩大了自己的队伍。截至一九四二年底，青年组已建立了沙磁区（包括中央大学、重庆大学）、职业青年、复旦大学等九个“据点”，个别直接联系和通过

“据点”联系的青年共计二百五十二人。一九四三年九月，在红岩，刘光主持了一次学习会，参加者有中大吴佩纶、复旦杜栖梧（许鲁野）、育才徐荇等主要“据点”负责人。会上讨论了当前政治形势，学习了党的方针政策，研究了有关“据点”工作的问题。

“据点”能够开展工作又能隐蔽，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是：“据点”成员在学习、工作、生活上，都能成为群众的模范。“据点”的绝大多数骨干分子，在学校，是认真读书、品学兼优的学生；在机关，是克己奉公，埋头工作的职员；在工厂，是技术高超、积极劳动的工人；参加公益事务，是任劳任怨、廉洁公正的办事人。这样，他们就赢得了群众的拥护，上级的信任，就站住了脚跟，便于开展工作。

搞地下宣传，秘密散发宣传品和小广播活动，是“据点”和积极分子的一项经常工作。“皖南事变”前后，特别是后两三年，国民党封锁新闻极严。我党的宣言和文告，八路军、新四军的捷报，解放区建设的消息，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新闻和言论，绝大部分都不能公开发表，只能印成传单秘密散发。“据点”和积极分子积极参加了散发工作，并采用小广播的方式在群众中传播这些消息。

为了适应这一宣传工作的需要，青年组曾编印了《青年人的话》，刊载暴露国民党摧残青年罪行的材料。重庆进步职业青年办了《人民之声》，专门刊载不能公开发表

的文章。这两个刊物都不定期，油印秘密发行。在成都美国新闻处工作的进步青年，在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间，经常选译一些外国报刊上有关中国的评论和报道，油印散发。这些印刷品为进步分子提供了口头宣传的材料，也在一部分中间群众中流传。这对于促进一部分中间和落后群众的政治觉悟起了积极的作用。

青年组联系的“据点”和积极分子，把政治学习当作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党中央和南方局关于党的方针任务的指示，对于国内、国际政治形势的分析，青年组都尽可能及时地作传达。“据点”成员及个别联系的积极分子经常阅读党报党刊，传阅学习文件。可能时，还交谈学习心得。青年组为了帮助青年政治学习，编了一本《青年学习指南》。“皖南事变”后还办了一个不定期刊物《青年参考资料》，都是在内部秘密发行。重庆青年工人自己办了一种油印的《学习》月刊，也是秘密发行。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四年这几年当中，“据点”成员和积极分子普遍地学习了《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整风文献》等著作。

调查研究，也是“据点”的一项经常任务。大多数“据点”都对所在单位（或地区）的基本情况，重要人物的姓名、籍贯、政治态度以及学术与技术水平，公开社团和秘密团体的人物、活动及其背景，反动党团、特务分子的概况和动态等等进行了调查。对于社会上政治、经

济、军事各方面的情况，也都留心搜集。在一九四二年一年內，青年组就收到了三十九份调查报告，其中有三十六份是由本组所联系的“据点”和积极分子送来的。各个“据点”根据调查了解到的情况，经常研究自己的工作方式方法以及同反动分子、特务分子作斗争的策略。这样就锻炼了“据点”的骨干分子，提高了他们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

参加公开合法团体，是积极分子开展工作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公开合法团体中活动，可以联系群众，争取群众，了解情况，锻炼自己，隐蔽自己。一般中间性团体自然可以参加，落后的甚至反动的也设法参加。各“据点”都注意挑选参加各个团体的人选，研究在不同团体中的不同工作方针和具体方法。正是由于这样，积极分子普遍得到了锻炼，群众基础也扩大了。有的进入反动组织的积极分子（如在中大、复旦），在后来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通过上述种种活动，“据点”和积极分子不断地发展，截至一九四五年春，青年组联系的“据点”已有四十八个，直接和间接联系的进步分子九百八十九人。在重庆，以中央大学为中心的沙磁区“据点”，还联系了重庆大学、四川教育学院、中央工业专科学校、湘雅医学院等校。以复旦大学为中心的北碚区“据点”，还联系了江苏医学院、歌剧学校、乡村建设研究院、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等单

位。在重庆交通大学、璧山社会教育学院以及在重庆的青年工人和职业青年中也都建立了“据点”。在成都，则有秘密的职业青年小组。在乐山，武汉大学建立了统一的秘密核心小组。在宜宾李庄，同济大学建立了秘密的核心小组。它们都同青年组建立了联系。在三台，同东北大学的进步的读书会取得了联系。此外，在贵州浙江大学、重庆中华大学、国立音乐院和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江津白沙女子师范学院、贵州赤水大夏大学、陕西城固西北大学、兰州西北师范学院等校，都有个别的进步同学直接或间接地同青年组取得了联系。由于积极分子的队伍扩大了，锻炼提高了骨干，加强了同群众的联系，为以后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为迎接新的群众运动的高潮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 三

一九四四年秋起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时止，国统区的青年运动，经过了几年相对平静之后，开始走向高潮。这一方面，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在战场上连遭失败，政治腐败已极，经济濒于完全崩溃，造成广大人民和青年的极其愤恨和严重不满。另一方面，党和各方面爱国人士经过几年的辛勤努力，又在国统区积蓄了力量。而国际上，苏联在苏德战场上由防御、退守转入胜利反攻；国内敌后解放区捷报频传，都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大后方的民主运

动。特别是一九四四年九月，林祖涵代表我党在国民参政会上公开发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更点燃了民主运动的烈火。

“皖南事变”后，国统区的民主运动虽然遭到了残酷的镇压，但进步青年采取了新的方式仍然顽强地进行着斗争。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一九四一年三月，在蒋介石秘密逮捕了马寅初三个多月之后，重庆大学商学院全体师生为马举行的祝寿活动；一九四二年一月六日，昆明西南联大、中法大学等校举行的打倒孔祥熙的游行示威；十六日遵义浙大及湄潭、永兴场两分校分别举行的倒孔游行、集会；一九四三年二月二日，成都市东区中学生集体向省府请愿，要求查办中学毕业会考泄露试题事件；一九四三年三月初，中央大学千余学生向国民党政府主席请愿，挽留校长顾孟余，拒绝CC派掌校。此外，还有一些零星的斗争。这些斗争，除倒孔运动外，虽然都不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但对于教育群众、团结群众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从一九四四年“五四”开始，各学校有进步倾向的壁报纷纷出现，讨论时事政治、活跃学术与思想的集会经常举行。昆明西南联大、云大，重庆北碚复旦，乐山武大，成都燕京、华西、金陵等大学，都先后举行了一些座谈会、讲演会，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打破了几年来沉闷的空气。到了九月以后，这种集会更加频繁，并且开始出现多单位联合的大规模行动，其中以十月七日成都华西坝五

大学十二个学会联合举行的国是座谈会，和十月十日昆明各界联合举行的保卫大西南群众大会，规模为最大。前者有二千余人，由学生主持，请民主人士张澜、吴贻芳等参加。后者约四、五千人，由上层民主人士主持，名为各界，其实主要是学生。成都国是座谈会后，由燕京王晶尧、王文星，华大彭塞，金大赵一鹤，川大黄寿金等积极分子（其中也有党员）发起成立各校进步分子的统一组织“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这个组织成立后不久，成都就爆发了双十一运动（即“市中事件”）。在当时，成都市尚无统一的党的领导机关的情况下，“民协”在运动中起了领导和骨干的作用。

“市中事件”是由特务头子方超率领武装警察千余人包围成都市立中学，搜查、抢劫、毒打、侮辱、逮捕学生所造成的流血事件。十月三十一日，事件发生后，成都许多中学自动罢课表示声援。“民协”则组织各大学和中学统一行动，于十一月十一日举行了全市近万人的游行示威，并向四川省政府请愿，迫使省主席张群接受学生要求。最后，斗争以市长余中英、警察局长方超“引咎辞职”而宣告胜利结束。这次斗争是抗战以来大后方出现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从各校分散活动走向全市统一的行动，斗争矛头公开指向国民党法西斯统治。

在这个时期内，另一次大规模反对国民党特务迫害的斗争，是一九四五年二月在重庆发生的胡世合事件。这一

事件，是由二月二十日特务田凯杀害电力公司工人胡世合所造成的。胡世合之死，在电力公司广大职工中引起了强烈的愤怒，公司上层人物也严重不满。当时南方局领导人王若飞亲自领导了这一斗争，并由青年组刘光、张黎群和电力公司党员周力行组成工作班子，进行具体组织联络工作。在斗争中，党组织一方面利用公司（地方资本）同国民党中央势力的矛盾，推动公司当局和工会负责人公开地坚持合法斗争；另一方面，又通过报纸和秘密传单以及各学校、工厂和机关的“据点”和积极分子，发动广大群众，采取各种形式声援电力公司职工，造成二十多万群众参加公祭和送葬的强大声势，迫使市政府完全接受了公司职工的要求，蒋介石也不得不下令枪毙特务田凯。在这次斗争中，始终让公司当局站在直接同国民党政府斗争的第一线，又使斗争双方都强烈感觉到有一支强大群众力量的存在。这次斗争是统战工作同群众运动相结合，公开合法斗争同秘密非法斗争相配合的一次非常成功的范例。

这时，青年运动还出现了一种新情况，就是党的政治口号直接成为群众公开斗争的口号，运动有了鲜明的政治性。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至五月六日，昆明大中学校学生自治会和学生社团联合举办了“五四”纪念周活动，五月四日举行了万人纪念会并游行示威，示威队伍高呼“停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口号。这是“皖南事变”后，国统区群众第一次在街头公开宣传

党的政治主张。这次活动后，昆明大中学校成立了学生联合会。

青年组从一九四四年冬开始，还进行了两项重要的工作。

一是动员知识青年去中原解放区。一九四四年九月四日、十六日蒋介石两次公开讲话。十七日《中央日报》发表专论《大时代的百万雄师》，号召知识青年参加他们组织的青年军。开始，报名者寥寥无几。据中央社统计，迄至十月二十七日为止，不足五千人。其中还包括已有军籍的警官学校学生一千七百人、广东某教导团九百人在内。但十一月中旬以后，情况发生了急遽变化。由于桂林、柳州、金城江相继失守，广大沦陷区流亡出来的青年大批地报名参加。这时南方局指示青年组号召爱国青年去解放区参加战斗。十一月二十六日《青年生活》上刊出一启事，说有一篇未能刊出的专文，内容讲的是青年应当到真正抗日前线——敌后去打敌人。《新华日报》纪念“一二·九”的社论和专刊，都号召沦陷区青年“回乡抗战、就地抗战”，发动游击战争。鉴于中原解放区需要大批干部，又最靠近大后方，南方局指示青年组输送一批知识青年去中原。动员工作几乎是全党进行的，而具体组织工作则由青年组成立一个小组专司其事。从一九四五年春开始，派人探明路线，建立交通联络站，至八月日寇投降为止，陆续向中原输送了近五百人。这些青年三三两两地小批分别

行动，闯过了反动派的层层关卡，徒步跋涉数百里，通过敌人封锁线，除了最后几批因日寇投降后情况变化，交通线中断而折回重庆外，都安全到达了解放区。

一九四五年夏，青年组还曾派人去西安建立工作据点。其最初目的也是为了打通北方的交通路线，为向华北解放区输送干部作准备。日本投降后，这个工作被迫停止，但输送干部的工作却并未完全停止。一九四六年春，青年组还配合外事组动员了七十余名大学生去张家口外语学校；同时又动员了三十名左右的知识青年去延安作教育工作。

二是动员知识青年扎根农村。一九四五年一月，党中央指示南方局加强农村工作，在农村建立可靠基地，以便应付今后可能发生的日寇攻占大西南和国内形势大变化的新局势。南方局则指示青年组组织一批可靠的进步青年，去川东、川北边缘地区和反动统治薄弱的地区，以公开职业作掩护，长期扎根农村，在那里建立一个个巩固的据点，为时机到来时发动武装斗争作准备。青年组除在《青年生活》专页上发出“知识青年的岗位在农村”的号召外，还决定由张黎群具体负责这项工作。一九四五年一、二月间下去了第一批五十六人，分布在十五个点上。八月，还在北碚育才学校举办了为期一月的“农村工作干部见习班”，参加者十余人。结业后，又吸收了一些青年组成若干个农村工作组，分别派到农村。迄至这年暑假结

束时，共下去一百三十六人，分别在三十一个点上，这些青年绝大多数是大学生，他们自愿抛弃大学文凭和安逸的城市生活，毅然响应党的号召，到艰苦的农村去开辟工作。嗣后，由于形势变化，有些同志被调回城市或去解放区，但仍有一部分同志坚持到解放。其中陈以文、王兰骏等同志不幸为敌人发觉，牺牲在农村岗位上。在这同时以及以后一段时间内，昆明也有一批大中学生响应党的号召，到滇南、滇西一些偏僻地区开展工作，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了云南游击队的骨干，有的在战斗中献出了生命。

这个时期，在组织工作方面，革命低潮时所采取的“据点”形式，越来越不能满足广大进步青年的要求，越来越不能适应日益开展的群众斗争的需要。事实上，在重庆、成都、昆明、乐山、三台等地，许多进步青年（也包括一些党员），早已自动组织了一些秘密小团体，如成都的“蓉社”、重庆复旦的“十月同盟”、重庆的“民主青年联盟”（UDY）、“中国青年民主社”、乐山武大的“社会主义研究会”等等。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三日，中央大学一部分同我们“据点”没有联系的进步同学和个别党员，自动起来公开组织“中央大学学生抗日救亡会”（简称“救亡会”），反对蒋介石的青年军运动。后来，他们遭到了特务的捣乱和殴打，三位进步同学也被学校开除了。从这一事件中，青年组和中大“据点”看到，一个单位只建立组织比较松散

的“据点”、一些互相不发生联系的平行组织，实行多头领导，仅适宜于潜伏积蓄力量的平静时期，而不能应付情况瞬息万变的群众斗争局面。因此，一九四五年春在中大、复旦两校首先各自建立了统一的“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简称“新青”）。接着刘实、邓祥等人在重庆青年工人中成立了“工人民主工作队”，随后祝公健等人在职业青年中又成立了半公开的“陪都青年联谊会”、“中国职业青年社”等组织。在昆明，在云南省工委直接领导下，洪季凯（洪德铭）、肖松、齐亮等人于一九四五年一月成立了“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参加的人有学生、职业青年和工人。后来工人单独成立了“民主工人同盟”（简称“工盟”），职业青年建立了“新民主主义联盟”（简称“新联”）。此外，各地一些进步的学生和青年职工也建立了各种类似的组织。统一的秘密进步组织的建立，有利于夺取公开合法组织的领导权。一些大学学生自治会，如西南联大、重庆中大等校的自治会，长期以来为三青团所把持，“民青”、“新青”建立不久，就一个个地夺取了领导权。

在宣传工作方面，随着民主运动的发展，也有了一个新的发展，开始建立了新的公开宣传阵地。一九四四年夏，复旦学生杜子才、戴文葆等筹办《中国学生导报》（简称“导报”），在青年组的支持下，请民主人士甘祠森帮助取得合法地位，于十二月创刊。同时还建立了“中

国学生导报社”（后改为“中国学生社”）。通过刊物的通讯联络和发行，团结了一批大中学校的进步同学。同年十一月《大学新同》创刊，这是一个由三青团骨干分子挂名，而又由中大进步同学刘晴波、童式一等掌握编辑发行实权的刊物。同年十一月，刘明章在成都接办了《青年园地》。一九四五年春，青年组还派刘文范去成都，创办了《学生报》。一九四六年二月，昆明市学联也出版了《学生报》。一直到一九四六年上半年，各地出现了不少进步刊物同青年组直接联系的，还有蔡仪主编的《青年知识》。浙大毕业同学发起的“科学时代社”，团结了一部分进步的青年科学工作者，出版了《科学时代》杂志。这个刊物起初是经过吴作和，以后又经过潘寰而同青年组建立了联系。当时，这些刊物在国民党统治区，在不同范围的青年中起了传播革命思想的作用。但是，在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以后，除《科学时代》外，都一个个地被迫停刊了。

为了加强大后方的青年宣教工作，一九四五年三月，青年组成立了以刘光为首的五人写作小组，定期讨论宣传方针和宣传要点，检查有关的青年刊物，并为进步报刊组织和撰写稿件。

#### 四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蒋介石立即准备大规模内战，同时对爱国民主运动变本加厉地进行迫害和镇压。

国统区的青年和人民起来进行了坚决的反击。“一二一”运动就是这个时期第一次重大的战役。

当时，西南联大团结着昆明大中学校，成为大后方的一个坚强的民主堡垒，反动派处心积虑地想摧毁它。十月，蒋介石首先采取武装政变方式，把同民主派友好的龙云撵下台。十一月二十五日，联大、云大等校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遭到军警特务的武装包围、威胁和破坏。十二月一日，大批武装特务冲进联大、云大等校进行镇压，杀害学生三人，青年教师一人，打伤数十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惨案发生后，昆明全市学生罢课，大中学校教授、教师罢教。在烈士灵柩前公祭多日，参加者达十五万人。重庆、成都、上海、延安等城市都集会表示哀悼和抗议。成都、上海两地学生还举行了游行示威，重庆各界人士设灵堂公祭三日，并捐款支持昆明学生的斗争。遵义浙大、乐山武大等校也采取了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示抗议和声援。这是“一二·九”以来最深入持久、规模最大的一次青年运动，获得了各阶层人士的广泛支持和同情。在云南党组织的领导下，在全国广大人民和青年的支持声援下，“民青”和昆明学生多次粉碎敌人的破坏活动，并且排除了主张无限期罢课的“左”的干扰，坚持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死者、伤者得到抚恤，祸首被撤职、免职的巨大胜利。

接着是一九四六年一月旧政协开幕。全国人民特别是

广大青年，渴望政协会议成功，中国出现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新局面。国民党反动派这时却想利用英国在九龙屏山修建机场和法国轮船载走法奸两件事，发动一次反英、法的游行示威，以转移人民群众对国内问题的关注。他们首先在中央大学发动。中大“新青”和其他进步同学识破了这个奸计，发动群众要求改变游行的主题。经过三天的宣传战和系科代表大会上的激烈斗争，终于决定举行以国内问题为主题的游行示威。进步同学和中间同学还联合取得了运动的领导权。二十五日，由中大带头，有重大、中央工校、国立艺专、川教院等十余所大中学校万余人参加的游行示威队伍，高呼“政协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永远停止内战”、“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实现蒋主席四项诺言，保障人权”等口号走上街头。这次斗争是在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在反动派严密控制的条件下开展起来的。中大三千多学生几乎百分之百地参加了游行，中大校长吴有训、教授金善宝，重大教授马寅初等百余名教授、教师也参加了。中大进步同学在大会激烈辩论过程中，对于个别政治模糊的口号（“国共双方释放政治犯”）作了让步，保留了下来，因而争取了大多数同学。这就不仅保证了斗争的顺利进行，也保证了这次斗争后的学生自治会竞选的胜利。中大的进步力量，就是从这次斗争后才从三青团手里夺取了自治会的领导权。

“一·二五”运动后，反动派疯狂进行反扑。二月十

日，特务暴徒袭击了在重庆校场口举行的庆祝政协的群众大会，打伤郭沫若、李公朴及群众多人。接着又在报刊上渲染所谓东北问题和张莘夫被杀事件，煽动反苏反共。二月二十二日，他们在国统区的许多城市制造了反苏反共的示威游行，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二·二二”事件。在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这次进攻中，由于我们缺乏斗争经验，对形势估计有误，使重庆地区以及一些中小城市的青年工作受到了一些挫折。当时重庆地区高等院校的形势是：“一·二五”后，学生自治会大多数为进步分子所掌握。中央大学进步力量最强，掌握了整个学生自治会和系科代表大会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席位。而中大在重庆又是重要学府，人数最多，在重庆学运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长期以来，反动派对它控制很严。反动派从二月十五日开始，在中大发动宣传攻势，煽动群众反苏反共，并要求自治会公开表态。当时“新青”社员和进步同学对于东北情况不了解，感到不好公开向群众做工作；同时又自恃掌握自治会权力和有代表大会多数票，以为有把握否决反动派的提案，只要中大不参加反苏游行，重大、中工等校也就可以借口不参加，反苏游行就会冷落不堪，或者根本搞不起来。所以我们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系科代表大会斗争上面，却没有去深入开展中间、落后群众的工作。当两次大会都否决了游行的提案以后，反动派却利用群众狭隘的爱国主义情绪，发动中间、落后同学撤换了大多数进步代表。结

果，第三次大会通过了游行提案。

这次斗争使我们认清了两点，一是在青年运动中必须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一是如果脱离了广大中间、落后群众，任何权力和多数票都是靠不住的。

在这次斗争中，反动派也并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有的学校由于进步组织在群众中做了大量的说服争取工作和采取了有效的斗争策略，抵制了反苏游行。如在复旦，反动派提议参加反苏游行，在自治会和各系会上都遭到了否决。他们只得以东北同乡会的名义参加，人数也不过全体同学的十分之一。事后《谷风》壁报揭露了反动派拉拢同学参加游行的一些内幕，壁报主持人庄明三竟遭到了特务的侮辱和毒打，连主持正义的洪深教授也遭到了殴打。进步同学发动群众及社会舆论进行了反击，迫使学校当局开除了特务学生。成都燕京大学学生集会辩论东北问题，沈体兰教授在会上作了正确解释，燕大就决定不参加反苏游行。昆明学生联合会发表了宣言，要求：一，苏军和美军都立即撤出中国，保障国家主权；二，政府立即公布中苏谈判的详细经过及东北地方实况；三，中苏双方组织调查团，彻底查清并公布张莘夫事件真象……。这就把这次运动的实际斗争矛头指向国民党政府了。在陕西城固西北大学，学校当局下令要学生举行反苏游行，进步同学立即成立自治会（过去是禁止的）领导游行。游行过程中高

呼“一切外国军撤出中国！”“外国人不许干涉中国内政！”“执行政协决议！”“严惩校场口凶手！”等口号，把反动派计划的一个反苏反共游行示威，变成了反对卖国外交，争取民主的示威游行了。

这个时期，南方局领导下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对于青年运动是一支不可缺少的巨大的支持力量。在一些重大斗争中，青年运动和统一战线可以说是已经紧密地结合成一个整体了。郭沫诺、沈钧儒、张澜、茅盾、黄炎培、陶行知、邓初民、许德珩、李公朴等知名人士，闻一多、张奚若、吴晗、马寅初、张志让、陈望道、洪深、梁希、金善宝、杨晦、竺可桢、费巩、沈体兰等民主教授，包括西南联大和成都华西坝上各大学的一些外籍民主教授，吴耀宗、江文汉等进步宗教界人士，他们都是青年的良师益友，都给了青年运动热情的帮助和支持。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以及它们办的各地学生公社，为当年进步学生的活动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当年感受到蒋介石压迫的西南地方当局，对于民主运动也采取了暗中赞助或保护的态度。

一九四六年三月，青年组在红岩召开工作会议，参加者除青年组成员外，还有一部分重庆地区青年工作负责人和“新青”领导成员。中央青委副书记冯文彬出席指导。会议总结了过去几年国统区青年工作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一·二五”、“二·二二”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今后的工作方针和任务。

五月，南方局迁南京，决定青年组刘光等人去上海，南京则由组织部李晨负责青年工作。

六月，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支持下发动了全面内战。二十三日，上海各界人民十万人举行了反内战游行示威，并组成“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请愿代表在下关遭到了特务暴徒的围殴。

七月十六日，青年组组长刘光积劳成疾，不幸逝世。他在病重住院期间，还经常向一些学校的同志们询问工作情况并给予指示。他的逝世是中国青年运动的一大损失！

在这一个时期里，许多战时迁往大后方的大学、工厂企业和机关，都忙于复员。蒋管区各地的进步力量也需要进行调整和补充。而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后所造成的险恶政治形势，更需要我们静观以待时机，迎接新的斗争。新的斗争终于到来了，这就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七年一月的抗议美军暴行的运动。

抗暴运动是“一二·九”以来的最大的一次爱国民主运动，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对美帝的群众运动。一九四六年圣诞节前夕，美军奸污北平女大学生是这一运动的导火线。北平、天津学生首先于十二月三十日举行游行示威，抗议美军暴行。上海于一九四七年元旦及一月四日举行了两次游行示威。接着，杭州、南京、武汉、昆明、重庆、成都、广州以及其它许多中小城市的学生也都先后举行了游行或罢课。有些城市，如平、津、沪、宁、

渝都分别成立了全市的“学生抗议驻华美军暴行联合会”（简称“抗暴联”）。全国学生参加这次运动的近五十万人，学生们高呼“美军滚出去！”不仅抗议美军在华的暴行，也反对美帝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各地党组织及时领导了这场斗争。广大群众在斗争中认清了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也认清了引狼入室的蒋介石的真面目。这就为后来的五月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等一系列运动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蒋介石可以迫使中共代表团撤走，南方局机关撤走，但千千万万的群众却是赶不走的。群众运动的烈火，一直燃烧到反动政权在中国大陆上遭到彻底的毁灭。

一九八四年七月初稿

# 屈武谈周恩来敦促张治中 释放被关押在新疆的一 批共产党员的情况

欧阳如华

**按：**一九八四年三月，我们访问了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屈武同志。关于中共中央营救关押在新疆的共产党员一事，屈武同志和张治中先生的秘书余湛邦先生公开发表的文章提到过。本文仅记叙他们公开文章中未谈到的史料。

## 协助张文伯（即张治中）释放政治犯

一九四五年九月初，我从西安到重庆，向国民党中央述职和请求拨款，住在于右任先生家里。那时，我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做地下工作。我以国民党军委会高级参议兼顾问事务处处长、立法院立委、中苏文协秘书长、陆军大学教授的身份活动。蒋介石发现我不可靠，把我调出重庆，到陕西任建设厅厅长。这次来重庆述职，实际上是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工作。

张治中先生提议我随他去新疆工作，我立即向周恩来同志口头报告了此事。周恩来同志说：“如果老蒋同意你去新疆，那是一件好事。张文伯到新疆处理三区革命问题，一定很忙，顾不上释放我党在新疆被关押的一批同志。你去新疆，首先要帮助张文伯办好这件事，要经常提醒他释放政治犯。”

## 六次提醒张治中先生释放 在押的共产党员

### 第一次提醒张治中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下旬，国民党中央和谈代表团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同以阿合买提江为团长、赛福鼎为副团长的三区代表团谈判。这次谈判非常复杂，张治中先生果然顾不上毛主席、周副主席托他办好释放关押在新疆的共产党员的事。

我提醒他说：“释放在押的共产党员，恐怕要快办。要放便赶快放，以表示我们的诚意。”张治中说：“别忙别忙。”这是我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第一次提醒张治中先生。

### 第二次提醒张治中

过了半个月，我第二次又催他，“释放那批人的事，

不能再拖了吧！”

张治中说：“你先去监狱了解情况。这批人里面有我师母杨之华和她的女儿杜伊。你去监狱找她们，表示慰问，把准备释放他们的消息透露给她母女，并带一笔钱去改善他们的生活，也看看监狱里的情况。”

我去找监狱长，他无权处理。实权掌握在新疆省政府警务处处长胡国振手里，他是军统特务。我把张治中的意见向胡国振传达了，胡国振说：“他们都是共产党，有什么好了解的呀？他们的情况我都知道，要了解向我了解好啦。”胡国振不同意我去监狱。

那时，张治中先生不是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主席，我也不是迪化市市长。张治中只是中央和谈代表团团长，是个工作班子。胡国振拒绝我探监，我如实向张治中汇报。张治中火了，找胡国振来训斥：“你斗胆哩，违抗我的命令。”胡国振也以“无权批准探监，要报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为由来搪塞，但又说“可以折中，你不去监狱，叫她俩到你这里来。”第一次叫杜伊来。为什么不叫杜宁（杨之华的化名）来？还是胡国振捣的鬼。我向杜伊谈了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周恩来同志受中央的委托，敦促国民党释放他们，周恩来同志关心他们母女等等情况。杜伊开始不相信。我把一笔钱交她带回去改善生活。

我把同杜伊见面的情况向张治中汇报了，张治中又批

评了胡国振：“为什么叫孩子来，不让同杜宁见面？”胡国振第二次才让杜宁同我见面。这次谈话更深了一点，她把狱中的情况向我谈了。

我把同杜宁见面的情况报告了张治中，张治中说：“好，我心里有个底了。”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初，张治中继续忙于和谈，又把这事放下了。和谈中一些重大问题要请示蒋介石，张治中要我同他一起回重庆汇报。在重庆，只谈处理三区“暴动”的事，有关释放新疆在押的共产党员问题，张治中根本未向蒋介石谈过。现在看来，他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蒋介石给张治中的任务是同三区代表和平谈判，以便稳定西北后方，放手打内战。如果两个问题一起谈，必然引起蒋介石的不快。

### 第三次提醒张治中

一九四六年二月中旬，张治中回新疆继续和谈。三月，蒋介石任命张治中为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主席，我为迪化市市长。张治中忙于和谈，又忘了这事。我又提醒他，他要我到监狱去，把这批共产党员集合起来，由我向他们讲一次话。

我讲话的内容是，告诉他们当时国内形势，特别是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中共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同张治中主任面谈了，嘱咐张先生释放他们，请他们告诉我有

什么要求、委屈、冤枉。他们一五一十地告诉我，牢房恶劣，伙食如同鸡狗食。女监同志要求男女合监，因为男女分监，互相不能见面。大家要求看报，要求自由。我把情况报告了张治中，他要新疆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党必刚照办。后来，狱中生活改善了，可以看报，但还未释放。

#### 第四次提醒张治中

我提请张治中快把这批人放了，张治中说：“我哪有这么大权？把一批共产党放了，我还要请示委员长。”

这时，张治中第一次正式报告蒋介石。电报说盛世才关押了一批共产党员，为了贯彻双十协定精神，取信于民，应当释放这批人。蒋介石根本不回电，张治中碰了钉子。

#### 第五次提醒张治中

过了一段时间，我提议再向蒋介石请示释放这批共产党员的事。第二次电报请示后，蒋介石复电问有无重要的共产党头子？张治中回电说重要的共产党员都被盛世才杀了，如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剩下的只是无关紧要的共产党员和他们的家属。这次发报后，蒋又无回电。

#### 第六次提醒张治中

一九四六年五月，蒋介石公开发动反革命内战的风声

很紧，国共两党的战争不可避免了。我催促张治中，“这批人该放，就赶快放了吧。”张治中第三次电告蒋介石，电报说：这批共产党员不放，新疆和谈不会成功。三区代表已经向我表示，你们不是要释放政治犯吗？为什么关着一批共产党不放？伊犁代表进一步说，你们同我们签订的释放政治犯（当时除关了一批共产党员外，还关了一批非党员）和其他协定，同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比较，当然是双十协定在国内的影响大。如果影响很大的国共两党双十协定都不能执行，你们同三区代表签订的协定，更是一纸空文。

张治中拿新疆三区人民作压力，迫使蒋介石同意释放这批共产党员。一九四六年五月十日左右，蒋介石复电同意释放。张治中便邀狱中一部分人吃饭，一方面表示慰问，一方面表示送行。记得有杨之华（杜宁）、吉国兴（吉合）、朱家农（朱旦华）、张奋音（沈谷南）、李志梁（李云扬）、杜伊（瞿独伊）。开始，狱中同志不信任我们。张治中说：现在可以放你们了，你们还有什么怀疑呢？他们表示要回去开会，研究研究，再来答复。

几天后，狱中同志提出：第一，要先出狱，在迪化住一个时期。第二，要登报。还有一条什么记不清了。

张治中同狱中派出的代表们说：这几条都不能同意。为什么呢？我老实告诉你们，新疆的局势我自己都不能控制，有另外一个特务系统控制局面。你们要先出狱还要在

报上发表释放你们的消息，你们的安全我不能担保。还是在监狱住着，从监狱直接上车回延安，我派得力的人护送，最为保险，迪化的特务不能加害于你们。你们不要在迪化休息了，车辆、护送人员准备好了就赶快走。住下去，恐怕有变。

## 张治中电报训斥胡宗南

护送负责人是新疆警备司令部的交通处长刘亚哲，这个人是在党必刚推荐的，说很能干很可靠。

车队到咸阳出了一点问题，幸亏刘亚哲机智，他又带了一个警卫班，冲过了咸阳胡宗南的关卡，进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刘亚哲处长从西安来电，说胡宗南不准车队离西安去延安。实际上是胡要把这批人扣留在西安。

张治中接到电报后，立即给蒋介石去电，说胡宗南违背释放政治犯的协定，委座应去电训斥胡，以昭天下。

张治中又给胡宗南去电训斥：我奉委座令行事，你为何违令，应立即放行。

胡宗南是在张治中的管辖之下，接电后，只好放行。

## 周总理对这批干部关怀到底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一批一批造反派找张治

中，硬说是张治中同蒋介石合谋，诱降在新疆狱中的一批共产党员，然后放回延安，日后为国民党效劳。张治中受不了，去找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把张治中保护起来。张治中被保护后，造反派就向我逼供。他们说：“你同张治中勾结，受蒋介石指派，去迪化诱降了一批共产党员，给他们为国民党服务的任务，送回延安。这批人都是叛徒。”

张治中先生的秘书余湛邦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是自由的，他到处去看大字报。一次他看到一张大字报，说红卫兵为新疆关押的共产党员一事去纠缠周总理。周总理说：告诉你们，这批人是我经手办的。我受中央委托，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们放出来。他们回到延安后，受到了毛主席的重用。至于哪一个人有问题，你们拿材料审查这一个人，但是这一批人是没问题的。这件事中央知道，毛主席知道，你们不要纠缠了。

余湛邦把这张大字报抄下送给张治中，张治中又叫人抄了送给我。后来红卫兵来找我，我就把这张大字报给他们看。

(本文原载空军《党史资料通讯》第72期，本刊转载时，又请作者对个别史实进行了订正)

## 来 函 摘 登

廖志高同志来函，谈到本刊第五辑刊登的《聂荣臻回忆录》一文时说：“第151页第12行有‘原西康省两座小县城’（指天全、芦山）一句。天全、芦山两县当时还属四川省，不属西康省。西康省是一九三九年初蒋介石为了拉拢刘文辉，才确定建立的。所辖范围，除大渡河以西之康定、昌都等原西康地区外，还将四川所辖的西昌、雅安两个专区划归该省。此后，天全、芦山才属西康省。建议将‘原西康省’四字删去，以符合历史事实。”

（编者：廖志高同志的意见是对的。由于我们缺乏地理、历史知识，出现了上述错误。现摘登廖志高同志来函予以纠正，并向廖志高同志致以谢意。）

陆定一同志来函，谈到本刊第九辑刊登的《陆定一同志向共青团中央报告广州暴动的经过及广州共产青年团在暴动中的工作》一文时说：“广暴时在广州的共产国际代

表叫Neumann，不是Newmann，特此更正。”又说：“LY是汪精卫派甘乃光组织的。只在广州有这个组织，别处大概没有（例如上海，就无此组织）。广暴以后就‘寿终’了。”

## 本刊征稿启事

一、《中共党史资料》是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辑出版的资料性内部刊物。

本刊的宗旨是：本着实事求是、存真求实的原则，尽力为学习、研究和编写党史以及对广大党史爱好者提供有价值的新资料，为社会主义建设总任务服务。

二、《中共党史资料》的主要内容是：新发现或没有公开发表过的重要档案、文献资料，党史专题资料，党史专题座谈纪要，专人专题访问记，革命回忆录，人物介绍或传记，重大党史事件的大事记，重要人物的年谱，史实考证，综合整理的重要资料，译文和港台报刊资料，以及转载报刊上发表过的一些重要党史资料等。欢迎全国各党史资料征集单位、各党史研究单位、各大专院校和军事院校的党史教研室；广大党史资料征集工作者、党史研究工作者、党史教学工作者和党政军部门的老同志踊跃投稿。

三、来稿请用横格稿纸缮写清楚，注明作者的真实姓名（发表时署名自便），工作单位和通讯地点。

四、请勿一稿两投。来稿一般不退，如需退还，请注

明。稿件一经采用，即付稿酬。

五、来稿请寄：北京一九二九信箱《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

《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中共党史资料 第十三辑

作者 =

页数 = 1 0 0 0

SS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